



毛泽东同志论哲学

MAO ZHE DONG TONG ZHI LUN ZHE XUE

目 錄

代序 毛澤东同志对馬克思列宁主义 哲学的偉大貢獻.....	1—38
一 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階級革命和建設的 武器	39—52
1.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馬克思列宁主义傳入中国,从此中国人 民获得了革命和建設的武器,中国革命面目也就为之一新了。.....	39
2. 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切資产階級唯心論、形而上学的宇宙觀 根本不同,它是最正确最科学的革命理論。.....	42
3. 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階級性和实践性。	
4. 馬克思主义哲学是資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无产階級阶 級斗爭发展的产物。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認識史上 的一个空前大革命。.....	45
5. 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斗爭中发展起来的。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 斗爭和两种世界觀的斗爭是过渡时期階級斗爭的一个組成 部分。这个斗爭的結果必然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代替資本主 义思想体系。.....	47
6. 学习馬克思主义哲学必須树立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学习的目 的应该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問題,而不是为了單純地学习 理論;学习的方法应该是理論联系实际,而不是理論脱离实 际。.....	49

二 辯証唯物論中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致性53—61

1. 世界觀是关于自然知識和社会知識的概括和總結。辯証唯物論和历史唯物論是无产階級的世界觀，同时又是无产階級認識周圍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致体，.....53
2. 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和唯物論是統一的，把辯証法同唯物論割裂开来，或从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割去了它的辯証法，就要陷入唯心論或机械論。.....56
3. 馬克思主义辯証唯物論和历史唯物論是統一的。唯物辯証法的根本規律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們思想中存在的普遍規律。.....57
4. 辯証法、認識論和邏輯学三者的一致。.....58

三 世界的物質統一原理和普遍发展原理相結合 是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世界觀 62—74

1. 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运动的，除了运动的物質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沒有。.....62
2. 不可否認事物的运动发展，也不可否認事物的靜止平衡。运动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对的，否認事物的运动发展就是机械主义，否認事物的相对固定性就是相对主义。.....62
3. 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要从主观願望出发；要根据客观情况和群众需要制訂方針政策，不要憑想象和热情办事。.....65
4. 了解情况的唯一方法就是向下作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要作好調查，首先必須放下架子，眼睛向下，虛心向群众学习，甘心当群众的小学生。.....69
5. 不从实际出发，不作調查研究，而是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观察問題和处理問題，就不能完成革命任务，不能作好工作。.....71

四 主客观的統一，主观能动性75—92

1. 存在决定意識，观念形态、科学規律是客观实际对于我們头腦的反映。.....75
2. 客观实际是異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但它总是可以認識的。.....76

3. 重要的問題不在於解釋世界，而在於能動地改造世界。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我們一方面不可以超越客觀物質條件，勉強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另一方面也不可以否認在既定的客觀物質條件下主觀能動性的決定作用。……77
4. 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存在決定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82
5. 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不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他們一定要犯而且已經犯了很多思想上和行動上的錯誤。革命者如果不加強思想改造，不去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而只是主觀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事物，那也很容易犯錯誤。我們必須同時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是我們目前的迫切任務。……83
6. 主客觀的統一是一個充滿矛盾和鬥爭的發展過程，只有堅持唯物論，堅持辯證法，在實踐中使主觀認識跟著客觀過程推移轉變，在實踐中不斷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於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才能變主觀的東西為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90

五 實踐和認識 …………… 93—118

1. 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只有實踐才是人們認識的來源、認識的目的、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一切否認和忽視實踐作用，把認識和實踐割裂開來的理論都是錯誤的。尊重實踐、尊重群眾就是尊重唯物論、尊重辯證法。……93
2. 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99
3. 人類對世界認識的總過程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的過程。……106

4. 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黨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與實踐統一原則的具體運用。……196
5. 真理是客觀的，真理是相對的又是絕對的，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真理觀。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們必須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真理總是在同錯誤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我們要為真理衝鋒陷陣。……110
6. 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無產階級不僅要改造客觀世界，而且要改造主觀世界。改造主觀世界是改造客觀世界的重要條件；改造主觀世界必須在改造客觀世界的群眾的實踐鬥爭中進行。……113

六 對立統一規律 …………… 119—187

(一) 兩種宇宙觀 …………… 119

1. 在人類認識史中，從來就有關於宇宙發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種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一種是辯證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對立的兩種宇宙觀。所謂形而上學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與此相反，辯證法的宇宙觀教導人們要善於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119
2. 事物的矛盾規律，即對立統一的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規律。……121

(二) 矛盾的普遍性 …………… 122

1. 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中，矛盾貫串於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沒有什麼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122
2. 矛盾分析方法是研究任何事物發展過程所必須應用的方法。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並推斷革命的將來。……125

(三) 矛盾的特殊性 127

1. 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 127
2. 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 129
3. 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是每一个事物内部所包含的两个方面。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就一定会陷入教条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 131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141

1.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141
2. 无论什么矛盾，总有主要的和次要的两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事物的性质总是随着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转化而变化。..... 145
3. 在各种矛盾的复杂过程中，全力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是革命政党正确地迅速地解决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 147

(五)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151

1. 矛盾双方互为前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双方依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同一性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 151
2. 事物内部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这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就必须用“两点论”的观点全面地观察事物。反对“一点论”，反对片面性。..... 152

- 3.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165
 - 4.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因而必须有意識地树立对立面,促进事物的发展。…… 167
 - 5.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这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論基础。誰不認識这一真理,誰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169
- (六)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 182
- 1.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兩类性質完全不同的矛盾,不容混淆。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轉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也可能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182
 - 2.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須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則。……183
- (七)研究矛盾法則的簡單的結論 ……………186

七 量变質变規律 ……………188—213

- 1.任何事物都是質与量的統一体,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須既注意量,又注意質,也就是要善于把握事物的“度”。党的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就是馬克思主义关于質量統一观的具体运用。……188
- 2.無論什么事物的运动,都以两种状态——質变和量变。事物的发展总是不断地由量变过渡到質变,并通过質变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195
- 3.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許多部分質变;……199
- 4.沒有質变就沒有发展,任何質变都必須由量变做准备。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革命者必須善于抓住时机,促成事物的轉化,达到革命的目的。……201
- 5.任何質变都是飞跃。飞跃的形式是多样的,最基本的形式是:爆发式飞跃和漸进式飞跃。……205
- 6.社会的发展也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是一个不断由量变到質变的无穷的发展过程。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認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在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沒有隔着、也不允許隔着万里長城；我們又是馬克思列寧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論者，我們認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207

7. 树立不断革命的思想，永远做促进派。……………212

八 肯定否定規律 ……………214—238

1.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发展就是新陳代謝，新东西对旧东西否定的过程。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規律。……………214

2. 我們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們不应当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外国，而且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而且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于我国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事情，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不要一概排斥，也不要盲目搬用，而应当棄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地加以繼承和总结。絕不可以无批判地兼收并蓄。……………216

3. 事物的发展不是簡單的反复，而是曲折的波浪式的前进。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建設也是如此。……………222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生事物一定要胜利，旧的、腐朽的事物一定要死亡。……………227

5. 新生事物，只能在斗争中发展。在新生事物的成長过程中，部分的缺点和錯誤是难免的。馬克思主义者对于新生事物应当采取热情支持，坚决保护的态度，而絕不应当采取冷淡、譏諷、指責以至打击的态度。……………232

九 唯物辯証法的范疇 ……………239—282

(一) 本質和現象。主流和支流 ……………293

1. 現象是事物片面的外部的联系，本質是事物全体的內部的联系。我們看事情要看它的实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导，一进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实質，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239

2. 通过现象抓住本质，这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观察问题应抓住它的本质，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它们外强中干，貌似强大，实则虚弱。一切反动派必将死亡，革命事业必将胜利。……241
3. 必须善于区分事物发展的主流和支流，不应把支流看成主流。应该看到我们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样才不致于迷失方向。……243

(二) 全局和局部 ……………244

1. 凡属带有要照顾事物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事物的全局。局部是全局的一部分，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处理任何事情，都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对全局的关照上。要赢得全局的胜利，必须争取每一局部的胜利。……244
2. 全局统率局部，局部隶属全局。必须树立全局观点，照顾全局，以局部服从全局，反对一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观点，反对一切强调局部不顾全局的本位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247

(三) 形式和内容 ……………252

1. 形式和内容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有时形式上是重复的，内容却是发展了；形式上是被动的，内容却是主动的。然而形式不能离开内容单独存在，一定的内容也必有一定的形式。……252
2. 必须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选择适当的形式。在同一内容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中，存在着一种主要的形式，其他的形式必须与这种主要的形式很好地配合起来。……254
3. 我们看待任何事物，必须首先着重于它的内容，它的内部联系，反对一切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256

(四) 规律性 ……………258

1. 规律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要想做好某件事，就必须认识这件事的发展规律，并且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258
2. 规律由于起作用的范围不同可分为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我们既要认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认识事物的特殊规律，否则就会陷入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错误。……260

(五)目的性263

1. 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活动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然而目的性之能否实现是受客观规律所制约的。革命的符合规律的目的一定能实现，反动的违反规律的目的必然要失败。.....263
2. 辩证唯物论者强调动机与效果二者不可分割，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因此辩证唯物论者认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266

(六)因果性267

- 客观事物的因果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有时是一果多因，有时是一因多果：就是原因也有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内因和外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等等。.....267

(七)必然和偶然、必然和自由.....271

1. 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只能预见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而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必然性是客观规律的强制的倾向。.....271
2. 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只有认识了必然，才能得到自由，才能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274

(八)可能和现实275

1. 可能性必须依据一定的条件，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275
2. 事物发展的方向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有好的可能性，也有坏的可能性。我们应当阻止和准备对付最坏的可能性，争取和加速实现最好的可能性。.....277
3. 在可能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人的主观活动起决定作用。客观条件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但可能并不等于现实，只有经过人的努力，才能使可能变为现实。.....281

十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283—303

1. 历史唯物论与历史唯心论是根本对立的。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观察和研究社会生活唯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没有或者不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必定要犯错误。.....288

2. 物質資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地理环境和人口虽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它們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辽阔的領土、丰富的資源和六亿五千万**勤劳勇敢的人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起着巨大的作用。……285
3.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社会意識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人們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思想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288
4. 社会意識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反动的、落后的思想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革命的、进步的思想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革命思想是革命阶级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292
5. 兴无灭资，积极树立共产主义思想，批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斗争。目前共产主义精神已經在我国蓬勃发展起来了，但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还是长期的、艰巨的。……297

十一 社会基本矛盾 ……………304—329

1. 社会的变化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間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間的矛盾。……304
2.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須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質和狀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質时，对生产力发展起促进作用，不适应时起阻碍作用。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307
3. 对中国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312
4.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国家、政党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316
5.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319
6. 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統帅，沒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沒有灵

魂。科学、文艺等一定要为政治服务，一切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論調，都是资产阶级的荒謬理論。……323

7. 自觉的調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量之間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間的矛盾，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发展。…320

十二 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 ……………330—373

(一) 阶级斗争，革命 ……………330

1.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阶级斗争有多种形式，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330

2. 革命不是绣花，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333

3. 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335

(二) 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 ……………342

1. 国家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是指政权的构成形式。我们国家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国家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349

2. 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专政的作用就是压迫国内反动阶级和防御国外敌人可能的侵略。……347

3. 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始终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必须进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反对修正主义是目前国内外迫切的任务。……351

4. 階級、政黨、國家將來是要逐步衰亡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由於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所以我們現在不但不能消滅國家權力，相反必須鞏固和加強我們的國家權力，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這正是為將來消滅階級、政黨、國家，實現共產主義創設條件。……355

(三) 戰爭與和平 …………… 356

1. 戰爭是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階級和階級、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互相鬥爭的最高形式。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行動；自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356
2. 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而且積極地參加正義戰爭。……358
3. 正義的戰爭必然勝利，非正義的戰爭必然失敗。戰爭的勝負取決於戰爭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唯武器論”的觀點是錯誤的。……361
4. 戰爭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要消滅戰爭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美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363
5. 消滅戰爭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對帝國主義不應當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應當依靠各國人民的堅決鬥爭。……366
6. 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保衛世界和平的堡壘。為了戰勝帝國主義的統治必須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綫。……369
7. 目前形勢的特点是東風壓倒西風。只要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我們和全世界人民就一定要將它們從地球上消滅乾淨。……371

十三 人民內部矛盾 …………… 374—404

1. 分清敵我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一切混淆這兩類矛盾的看法，都是完全錯誤的。……374
2. 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

- 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376
3. 人民内部矛盾是推动我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正确地認識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証。……378
4.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决。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必須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法。……380
5. “团結——批評——团結”，即从团結的愿望出发，經過批評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唯一正确的原則。……385
6. 整风运动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有效的方法。……390
7. 正确处理各个不同領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調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設而奋斗。……392

十四 群众、阶级、政党和領袖 ……405—467

(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405

1.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05
2.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掌握了自己命运的、觉悟了的、团結起来和組織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創造力，得到了充分發揮。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精神振奋，斗志昂揚，意气风发，以从来没有的革命干劲，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向前跃进。……409
3. 树立群众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能够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411
4. 一切工作都要大搞群众运动。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运动必須采取热忱欢迎、积极领导的态度。指手划脚地批評群众运动或者反对群众运动都是錯誤的。……422

(二)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427

1.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內容。……427

2. 工人階級和全体劳动人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以工人階級为领导的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力量。是否与工农相结合，是划分革命、不革命或是反革命的唯一标准。……428
 3. 階級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階級观点和群众观点，階級路綫和群众路綫是一致的。……433
 4. 对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社会各階級的分析。……437
- (三) 无产階級政党和領袖 ……457
1. 政党是階級斗争的工具。中国工人階級在革命斗争中創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457
 2. 中国共产党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为基础的党，是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核心力量。……458
 3. 无产階級革命需要自己最好的領袖，无产階級的領袖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467

十五 唯物辯証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468—488

1. 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問題。不解决方法問題，任务只是講說一頓。……468
2. 我們共产党人無論进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是我們党的根本工作方法。……469
3. 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风。……473
4. 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已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报；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相结合；深入重点，取得經驗，推动全般；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苦战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前冬；有节奏的生产；等等。这些都是在新形势下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的重要形式。……483

代 序

毛澤东同志对馬克思列宁主义 哲学的偉大貢獻

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馬克思主义一样，是不断发展的科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对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远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宁主义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断地开辟認識真理的道路。”^①一百多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實踐的发展，馬克思主义哲学也空前地发展了和丰富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世界觀方面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亲身参加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實踐中，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經驗，批判地繼承了人类文化的优秀遺產，創立了馬克思主义哲学——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給予了人类，特别是給予了工人阶级一个偉大的認識工具，使工人阶级認識到自己的历史使命。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他們所創立的嶄新的世界觀，指导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實踐，并在他們战斗的一生中，繼續不断地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的

^① 毛泽东：“實踐論”，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4頁。

偉大學說。

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坚决地保卫了和发展了馬克思主义。他不但全部地复活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閹割的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內容，所磨滅的馬克思主义的革命鋒芒，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历史經驗，进一步地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內容，发揚了馬克思主义的革命鋒芒。列宁根据革命实践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把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在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以及其他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斗争中保卫了和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的战斗唯物主义，特别是它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論。列宁把唯物辯証法应用于認識論，天才地論証了認識的辯証过程，提出了認識論、辯証法、邏輯学三者一致的馬克思主义的原理。列宁特别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极端尖銳的阶级矛盾，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在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了革命的唯物辯証法，特别是它的核心——对立統一規律。他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質，科学地論証了帝国主义是壟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專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完整的学說。他根据帝国主义政治經濟发展不平衡的規律，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并波浪式地向全世界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在列宁主义指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矛盾最集中、力量最脆弱的俄国，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实现了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十月革命以来，人类历史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馬克思列宁

主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是引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偉大旗手。他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地 and 生动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我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领导我国人民成功地建设着社会主义，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向着共产主义的偉大目标前进。

毛泽东同志充分地发揚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我們的条件下，保卫了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个部分，保卫了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論，保卫了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專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部完整的学說，坚决地揭露和打击了以鉄托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篡改、閹割和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实质的罪惡阴谋。学习和宣傳毛泽东思想，更高地举起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对于我們加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有着巨大的意义。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就是在巩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宇宙观和方法論的基础上，批判地繼承了中国这个偉大民族优秀的文化傳統，总结了近代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丰富的經驗，在和国内外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創造性地发展了的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反对教条主义、特别是反对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战斗旗帜。

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武器，毛泽东同志說：“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辯証唯物論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辯証唯物論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

性，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① 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特點的最好的概括，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性的最好的說明，也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最顯著的特點。毛澤東同志一貫堅持並且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党性原則，堅持和發展了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性的原理。他一再強調哲學理論與政治實踐的密切聯繫，強調哲學應當適應時代的要求，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作打擊各種敵人的武器，不斷地打擊阻礙革命發展的各种資產階級反動思潮；他致力於把唯物辯證法運用于革命的實際工作中，使之成為革命幹部和廣大群眾改造社會、改造自然、改造思想的戰鬥工具。

毛澤東同志根據無產階級和廣大群眾的革命實踐經驗，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它的革命辯證法。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不僅集中地表現在“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哲學著作中，而且貫串在他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一切著作中，他的一切著作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邏輯的結晶。他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論政策”、“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人民民主專政”、“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以及其他重要著作，都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革命的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因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徹底地批判的和革命的，它不向任何舊的、反動的和

^① 毛澤東：“實踐論”，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8頁。

保守的势力低头，不和任何资产阶级关系的“常态”妥协。除了不断革命以外，它根本不承认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它引起了一切资产阶级及其奴仆们的真正恐惧和仇恨。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到以铁托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无不极力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革命灵魂，妄图以掩盖矛盾、调和矛盾的折衷主义诡辩论和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因此，要保卫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即保卫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从哲学上来说，首先就是要求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要求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各种本质矛盾进行深入的揭露，揭示社会革命的必然性；打击和粉碎修正主义者掩盖矛盾、调和矛盾和对革命的背叛行为。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根据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深入地研究了唯物辩证法，作出了许多伟大的贡献，特别是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和党内各种错误路线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尤其是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中，继续了列宁的工作，突出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他在“矛盾论”一书及其他著作和讲演中，发展了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其中特别发展了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提出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卓越命题；发展了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发展了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阐发了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发展了关于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

^①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0页。

他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对唯物辩证法的各个规律和范畴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及其他论著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并且总结了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广泛运用的新经验，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在他与各种论敌的战斗中，在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中，都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红线，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不了解毛泽东同志革命辩证法的思想，就不会懂得他的全部哲学思想，也就不会懂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毛泽东同志在发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时，特别阐发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揭示了矛盾规律的实质。他在党的历史上进行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打击了各种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的片面性；在当前，严重地打击了和打击着现代修正主义，从而坚持了革命辩证法和正确路线；同样，不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思想，就不会了解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不会了解整个的革命辩证法。

形而上学者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理解是僵死的、片面的。他们把同一性了解为绝对的、没有差异的、没有矛盾的等同。他们把认识局限在僵死的公式里面：那里有统一的东西，那里就没有矛盾和斗争；那里有矛盾的东西，那里就没有统一。这样，他们就完全抛弃了辩证法。他们就既不能了解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和规律性，又不能了解事物的转化。把这种观点运用在政治上，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为了正确地指导革命实践，努力从事唯物辩证法实质的研究，特别研究了列宁的关于对立面的同一的思想。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同一，是怎样（怎样成

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①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列宁的这个思想，第一次表述了矛盾同一性的两种意义：其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一切矛盾着的双方都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其二，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就是说，对任何事物，既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又要看到它们的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看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把这种思想运用在政治上，就能够发现社会生活中的本质联系即事物间的矛盾关系。在一切机会主义者只看到同一的地方，毛泽东同志能够看出这种同一是矛盾的同一、对立面的同一，是包含着斗争性的同一；在一切机会主义者只看到矛盾和对立的地方，毛泽东同志能够看出这种对立之中存在着相互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和互相转化。毛泽东同志依据这种理论，制定了著名的统一战线政策。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②。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仅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极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国际范围内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具有极大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持着对于矛盾同一性问题的形而上学的机械的理解，认为建设中的多快与好省，既

①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1页。

② 毛泽东：“论政策”，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60页。

然是对立的,就不能是同一的;認為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輕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等既然是对立的、矛盾的,就不能是同一的,或者既然是同一的,就不应当有矛盾和对立。因此,按照他們的意見,要多快就不能好省,要高速度发展工业就不能迅速发展农业,實質上也就是說,社会主义建設不可能多快好省,只能是少慢差費。毛泽东同志根据对立統一規律,特别是关于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理論,駁斥了这种認為多快与好省之間沒有同一性的錯誤观点,正确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問題,制定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和一整套“兩条腿走路”的方針,指出工业与农业之間,重工业与輕工业之間,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間,洋法与土法之間既是互相矛盾、互相对立,又是互相依賴、互相滲透的,它們之間可以互相促进、互相轉化。这是在新的条件下对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运用和发展,它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飞跃前进。

关于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轉化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对于对立統一規律的理論的重大发展,也是革命辯証法中最具有革命性的部分。馬克思說,辯証法在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种既成形式都是从它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过渡性去考察;它不向任何东西低头,它在本質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轉化的思想,把这个革命辯証法的最本質的精神具体化了,并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說:“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来的辯証法,促成事物的轉化,达到革命的目的。”^② 他無論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根据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頁。

② 毛泽东:“矛盾論”,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8頁。

这种思想,清醒地分析形势,为革命指出方向。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根据国际国内新的经验,根据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教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好事能够变成坏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引出坏的结果。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他在矛盾转化的问题上,特别强调了条件的重要性。他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①他并且根据这个理论,分析了我国一穷二白的状况,指出,“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帋,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②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这种转化的条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找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法宝,正在引导中国人民实现这个由贫穷变富强的伟大转化。毛泽东同志根据人民群众的实践斗争经验所提出来的利用反面教员,有意识地树立对立面,以及抓两头带中间,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现场会议,参观评比等思想方法、斗争方法、工作方法,都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矛盾转化规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关于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世界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同志运用矛盾转化的理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最善于创造条件,“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最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革命事业服务。因而在他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处处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他用辩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5页。

②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载“红旗”1958年第1期,第3页。

証法为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场所。使革命的队伍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和蓬勃的战斗精神。相反地，一切机会主义者由于他们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坚持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都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或者看不到矛盾双方存在着的相互转化的这种同一性，或者看不到实现这种转化所需要的条件，不敢为促进事物的转化而进行革命的斗争，找不到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因而他们总是处处碰壁、悲观失望，结果都被革命的历史抛在后面。

毛泽东同志在对立统一问题上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关系的思想。指出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性则是绝对的。他说：“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①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的表现之一，就是对同一的机械理解，不承认同一性中存在矛盾和斗争，不承认通过斗争才能完成对立面的转化。这种片面性是右倾机会主义或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现代修正主义者总是企图把矛盾的同一性解释为抽象的绝对的同一性，而抹杀其中的斗争性，或者抹杀斗争的绝对性，以达到否认矛盾、调和矛盾、否认斗争、反对革命的目的。他们宣扬阶级调和、阶级和平，反对阶级斗争，强调所谓“人类的共性”、“人性”，否认阶级性和党性；宣扬和平主义，反对革命战争；抹杀两大阵营的本质区别，看不到和平共处仍有斗争；强调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等等。总之，他们把同一看成没有斗争的同一，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

① 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21页。

从根本上背叛了辯証法。毛泽东同志說：“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沒有斗争性就沒有同一性。”^① 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关系的理論是打击現代修正主义、揭露其形而上学实質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同志抓住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問題进行了充分的闡述，不仅为整个革命事业的战略战术問題制定了堅实的理論基础，而且以这个問題为中心，闡发了对立統一規律的各个方面；透过一层一层的分析，从各个方面打击了危害革命事业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学、經驗主义和教条主义，尤其是打击了当前危害最大的現代修正主义。

② 毛泽东同志彻底坚持并发展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他認為对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这个規律，不論在自然、人类社会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沒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生命，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他第一次提出了矛盾普遍性或絕對性的兩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另一方面，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終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对矛盾普遍性的全面闡述有着重大意义，因为是否承認矛盾的普遍性，能否在一切事物一切过程中都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看到矛盾的存在是推动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的問題，是能否坚持彻底的辯証法，能否坚持彻底的革命精神、进行不断革命的問題。有些人往往在某些問題上承認矛盾，承認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在另一些問題上則又否認矛盾，否認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种人往往不能坚持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不能坚持不断革命，甚至要走向背叛辯証法，反对革命、背叛革命。

① 同上。

現代修正主義者就是這樣的人，他們在當前最根本的政治問題上背叛了辯證法，背叛了革命。他們借口時代發展了，抓住時代發展中一些非本質的特點，妄圖一筆勾銷我們時代的最本質的矛盾，勾銷列寧主義所揭露的我們這個大時代中工人階級與壟斷資本的矛盾，帝國主義各國相互間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與帝國主義的矛盾，無產階級獲得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而宣揚什麼抽象的“合作”、階級的“合作”。因此，在現代修正主義者的所謂“新時代”里，上述這種種矛盾沒有了，無產階級革命不見了，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政策當然也不見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根據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具體分析了我們時代的各種本質矛盾，有力地證明了我們的時代仍然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勝利的時代，為列寧所揭示的那些根本性質的矛盾，不但沒有消失，而且激化了。正是這些矛盾，決定着當代最重大的政治問題，決定着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戰爭與和平等重大問題，推動着革命的發展。這就沉重地打擊了現代修正主義者的反動謬論，保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由此可見，毛澤東同志關於矛盾普遍性的理論，是揭露現代修正主義的有力武器。

在歷史上，右傾機會主義者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他們在和資產階級聯合的時候，往往忘掉了其間的矛盾，因而喪失警惕，直至走向投降主義，背叛無產階級事業。布哈林認為在蘇聯條件下富農和一般農民之間只有差異，並無矛盾，陳獨秀也抹殺共產黨和國民黨，馬克思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矛盾，他們都可恥地由機會主義滾到反革命方面去了。毛澤東同志徹底批駁了這些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指出“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着矛盾，差異就是矛盾”^①；至於這種矛盾是否激化，成為對抗，則是“矛盾的差別性的問題，不是矛盾的有無的問題”^②。毛澤東同志的這一思想，為我們在分

析各种具体問題时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原理提供了主要的理論根据。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地发展了矛盾普遍性的原理，把辯証法貫徹到底。他提出了关于兩类矛盾的学說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論，指出不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条件下还有矛盾，而且只有这些矛盾的統一和斗争，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由于矛盾斗争的結果，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也还将有許多发展阶段，还将有量变到質变的关系，还将有革命，不过革命的性質和过去不同罢了。毛泽东同志特別強調指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有些人沒有彻底坚持这个原則，諱言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矛盾。他們認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經濟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間完全适合，沒有矛盾，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并不是矛盾，而是互相适合和互相一致。这些观点当然都是錯誤的，是和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証法背道而馳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論，粉碎了一切否認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防止了思想僵化和凝固化，充分体现了唯物辯証法的彻底性和革命性。

④ 毛泽东同志还突出地发展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曾經給革命帶來重大的危害。而教条主义特別不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不了解具体地分析具体問題这一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論”里用了較多的篇幅，論述了矛盾特殊性，对馬克思主义辯証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通过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得出了具体問題具体分析、反对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一系列的分析矛盾的方法論結論。如科学研究的区分，認識运动

① 毛泽东：“矛盾論”，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5頁。

② 同上。

的辯証性，用不同方法解決不同的矛盾，注意事物發展的階段性，注意矛盾各个方面等等。這樣就在方法論上打擊了在民主革命中對革命危害極大時間最長的教條主義，為分析中國革命中各種複雜的矛盾及其特點制定了理論基礎。毛澤東同志說：“我們從事中國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個矛盾的總體上，即矛盾的相互聯結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從矛盾的各个方面著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總體。所謂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們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種具體形式和對方發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關係，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後，又各用何種具體的方法和對方作鬥爭。”^① 這種分析是我們黨制定政策，進行革命鬥爭的理論根據。毛澤東同志在1940年所寫的“論政策”一文，反復強調了在實際鬥爭中把不同性質、不同特點的矛盾加以區別，並且在這些區別的基礎上建立我們的政策的重要性。毛澤東同志正是由於分析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各種矛盾的特殊性，才出色地解決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根據中國的民族特點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總結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規律性，指導革命和建設不斷地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②在矛盾特殊性的研究中，毛澤東同志提出了關於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揭示了各種矛盾的不平衡性和每一矛盾中對立的兩個方面的不平衡性，進一步揭示了对立面互相轉化的原理，這是对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又一重大發展。毛澤東同志說：“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② “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着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

① 毛澤東：“矛盾論”，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0頁。

② 同上，第308頁。

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①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他总是通过各种特殊矛盾的分析，用全力捕捉时代的主要矛盾，使人们在纷乱的摸索中，得以识别风向。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矛盾的分析，制定了民主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从而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而机会主义者既然不去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当然更谈不到捉住主要矛盾。往往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他们还觉察不到，因而就不能不老是落在形势的后头。“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抓不住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总是不能恰当地掌握人民大众和三大敌人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看不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升降和转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总是看不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因而他们在政治上不能不犯严重的错误。同样，在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掌握不定，也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所以左右摇摆、以致可以互相调换位置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② 这种分析异常重要，因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而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也正是由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斗争和转化。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更进一步发展了矛盾转化的理论，指出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陷入了机械的平衡论的泥坑，既不能辨别事物的性质，又不能促进事物的转化，因而也就不可能成功地解决

^① 同上，第310页。

^② 同上。

任何問題。這種觀點表現在經濟建設問題上，就是機械平衡論，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觀點。因為右傾機會主義者看不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區別和轉化，堅持一種消極的機械的平衡論，企圖用限制先進、遷就落後的辦法維持國民經濟的“平衡”。他們並且用這種理論作為限制和束縛人們手脚的借口，以反對大躍進，攻擊大躍進“造成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毛澤東同志關於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論，是駁斥這種種錯誤觀點的有力武器。他說：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沒有絕對地平衡發展的東西，我們必須反對平衡論，或均衡論。”^①平衡論的錯誤是把矛盾看成處於絕對平衡狀態，否認矛盾新舊方面的鬥爭是推動事物發展的動力，否認社會革命，否認事物的发展。毛澤東同志指出，任何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許多矛盾和矛盾的不同方面都是不平衡的，平衡只是相對的，不平衡才是絕對的。從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循環往復，都是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不斷推移和轉化的結果，這是唯物辯證法的一個普遍規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能例外。修正主義者所散布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共同發展”，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反動觀點，右傾機會主義者在國民經濟建設問題上的機械平衡論，都是以平衡論為其理論基礎的。毛澤東同志關於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分析，關於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思想，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理論基礎。是從方法論上徹底粉碎形而上學的均衡論和折衷主義、詭辯論的銳利的武器。

① 毛澤東同志深刻地論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關係，指

① 毛澤東：“矛盾論”，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4頁。

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精髓问题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卓越贡献。它不仅是反对教条主义而且特别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教条主义者不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不能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政策，因此妨碍革命事业的发展。现代修正主义者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由于他们企图维护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他们就借口矛盾的特殊性而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否认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他们这种做法是根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背叛了革命的辩证法。因为矛盾的特殊性是和矛盾的普遍性相联系而存在的。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斗争性和同一性分割开来、孤立起来的做法。他认为“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②。修正主义者抛弃了这个辩证法的精髓，否认矛盾特殊性之中就已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因而也就根本否认了矛盾，整个地滚进了形而上学诡辩论和折衷主义的泥坑。毛泽东同志对于事物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的论述，使我们在思想上和修正主义明确地划清了界限。

毛泽东同志以对立统一规律为一条红线，贯穿和提挈了全部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他的“矛盾论”一书及其他论述对立统一规律的著作，不仅是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阐发，而且是对于整个辩证法规律和范畴的阐发。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基础上，发展了

① 同上，第308页。

② 同上，第306页。

关于量变质变规律的理論。他通过矛盾特殊性的分析，指出事物之間質的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內部矛盾的特殊性，而事物本身的性質，又决定于事物內部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他通过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关系、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相互轉化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由量变到質变过程的本質，揭示了質变的革命性質，进一步发揚了辯証法的彻底性和革命性，打击了修正主义者否認質变否認革命的庸俗进化論的观点；他根据矛盾发展中阶段性的分析，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十年来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过程中，还特別发展了关于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質变的理論，关于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相結合的理論，并以这些理論为武器，极成功地领导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他的关于共产主义还有質变、飞跃，还有革命的思想，更是对于量变质变规律的彻底发挥。同时，毛泽东同志根据矛盾轉化问题的分析，还发展了关于肯定否定规律的理論，深入揭示了辯証否定的实質，提出了关于发展的波浪式前进的規律，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理論；并以此作为制定革命的战略战术的理論基础，指出新生事物的偉大前途，指出社会发展中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两种相反的邏輯；指出了对待新生事物应有的态度；指出了革命人民爭取胜利的道路和“战略上藐視敌人、战术上重視敌人”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武装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我国革命和建設中发挥了无比巨大的威力。其他如一般和特殊、本質和現象、主流和支流、全局和局部、可能和现实等辯証法范畴，毛泽东同志都以对立統一規律为核心赋予了丰富的內容。

所有这些都說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設的斗争中，最善于根据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去掌握客观事物的辯証法运动，不断地給这种历史事变的客观辯証法以科学的总结，从而对馬克思主义辯

証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毛澤東同志在他創造性的理論活動和實踐活動中，總是把革命辯証法提到極其突出的地位。毛澤東同志關於革命辯証法的偉大理論，是在中國革命鬥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鍛煉出來的無產階級智慧的最完美的結晶，是整个毛澤東思想的革命靈魂。它的實際運用，在我們國家，充分發動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創精神，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了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多數居民甚至全體居民參加的真正群眾性的運動，开辟了不斷革命、持續躍進的動人局面；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對於動員和團結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加強他們的革命鬥志，反對現代修正主義，促進全世界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爭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勝利的革命風暴更大的興起，具有極其偉大的意義。

二

唯物主義的革命辯証法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完全一致的，列寧說：“現實的各個環節的全部總和的展開（注意）＝辯証認識的本質。”^① 毛澤東同志在當前矛盾縱橫交錯和激烈變化的歷史時代里，在生動活潑的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環境中，用對立統一規律做中心，真正展開了對現實生活各個環節全部總和的分析，因而也就必然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毛澤東同志一向是把辯証法作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他說：“這個辯証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於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②

— 毛澤東同志把唯物辯証法特別是對立統一規律運用於唯物主義

① 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6頁。

② 毛澤東：“矛盾論”，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2頁。

認識論，從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發展了關於認識與實踐的關係的原理；關於在實踐基礎上主客觀的辯證統一原理；特別是發展了關於尊重實際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辯證關係，關於人民群眾主觀能動性的偉大作用，革命理論在改造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中的偉大作用等原理。在思想戰線上大破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極大地加強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戰鬥意義。

毛澤東同志在哲學戰線的鬥爭上，總是從兩個方面和他的論敵作戰。一方面堅持哲學上的唯物主義原則，反對唯心主義及其各種表現；另一方面又堅決反對機械唯物論，隨時注意劃清辯證唯物主義和形而上學機械唯物主義的原則界限。在毛澤東同志看來，革命隊伍中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都是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都是無產階級的大敵，是党性不純的表現。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才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只有馬克思主義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才是唯一正確的認識論。

在與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這些錯誤思想的鬥爭中，在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靈魂——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的工作中，毛澤東同志首先抓住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的最重要的基礎，即實踐問題，闡明了實踐在認識中的作用，認識與實踐的辯證關係。他說：“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和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① 這樣，毛澤東同志就在唯物主義基礎上，極其明顯地和舊唯物主義劃清了界限，指出了他們的致命弱點。實踐問題，是馬克思改造舊唯物主義、創立新世界觀時首先提出的中心問題

^① 毛澤東：“實踐論”，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1頁。

題。正是由于把實踐观点引入認識論，馬克思主義才把直觀的、消極的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主義根本改造為積極的能動的辯證唯物主義，所以毛澤東同志把實踐性看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毛澤東同志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做的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制定了全面的、科學的、發展的實踐原理，強調生產實踐是一切實踐活動中最基本的活動，強調階級鬥爭實踐的重大意義；強調社會實踐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這樣，把人民群眾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實踐作為社會實踐的主體，就把實踐观点和群眾观点溶為一體，大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這就一方面排除對實踐的舊的形而上學的理解，另一方面和實用主義的實踐觀更進一步地劃清了界限，揭露和打擊了現代修正主義者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混淆馬克思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本質區別的卑鄙手法。

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一書中展開了對於認識與實踐這個對立統一關係的全面分析，把實踐的观点貫徹於整個認識過程的始終。他說：“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①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和實踐關係的最好的概括，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的偉大貢獻。

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观点的基礎上，發展了關於認識的辯證過程；主客觀的辯證統一的理論，揭露了主觀主義的認識根源。在中國歷史上，機會主義的主觀主義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教條主義，一是經驗主義。他們由於把認識與實踐相脫離，因而都不能了解主觀和客

^① 同上，第285頁。

觀的辯證關係，不了解認識運動的辯證過程。教條主義從書本出發，忽視對實際情況的具體分析；經驗主義局限於一時一地的感性認識，忽視理論的指導作用，因而他們對認識過程的理解是片面的、機械的，是錯誤的。他們用這種思想去指導革命，不能不使革命遭致失敗。為此，毛澤東同志特別詳盡地分析了人類認識的辯證過程，闡明了主觀和客觀的辯證的統一。

列寧曾經提出過這樣一個思想：“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維，**幷從抽象的思維到實踐**，這就是認識真理、認識客觀實在的辯證的途徑。”^①毛澤東同志豐富和發展了列寧的這個思想。他論證了認識過程中感性認識和理論認識的辯證關係：“認識過程中兩個階段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為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為論理的，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②“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③這裡，毛澤東同志把列寧的關於“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維”這個思想發展了、具體化了。他不僅在認識論問題上劃清了馬克思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界限，而且劃清了馬克思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舊唯物主義的界限；不僅批判了哲學史上“唯理論”和“經驗論”的兩種片面性，而且徹底批駁了實際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毛澤東同志還進一步指出，認識過程幷沒到此結束，他又分析了“從抽象的思維到實踐”這一過程，提出了在認識過程中認識的兩個能動的飛躍的天才思想。他說：“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

① 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1頁。

② 毛澤東：“實踐論”，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6頁。

③ 同上，第280頁。

須表現于从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① 并且把這種實踐看作是“檢驗理論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②。

毛澤東同志把關於認識運動的辯證過程的理論應用於實際工作，制定了完整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即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工作方法。他認為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過程，就是概念、判斷形成的過程，推理的過程，也就是從群眾中來的過程；從理性認識到實踐的過程，就是把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傳達給別人，向群眾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在群眾中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的過程，也就是到群眾中去的過程。他說：“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③ 將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主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④。在1958年以來的大躍進中，他又總結了種試驗田、參觀評比等一系列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毛澤東同志關於認識過程的兩個階段即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辯證關係的分析，不僅成功地揭露了和糾正了歷史上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片面性，而且在當前最為重要的，是給予了我們揭露和打擊現代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認識論基礎——機械唯物主義的經驗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經驗主義一個有力的武器。現代修正主義者或右傾機會主義者，為了進行詭辯，為了抹殺社會生活的本質和歪曲事實的真象，為了散布其修正主義謬論以欺騙世人，在認識論上，他們就借助於經驗主義特別是唯心主義的經驗主義，隨便從複雜的社會生

① 同上，第281頁。

② 同上。

③ 毛澤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版，第901頁。

④ 同上。

活現象中抽取某些表面的、片面的感性經驗，加以夸大和絕對化，用以掩蓋和歪曲事物的本質。例如，他們抓住技術進步這個事實，加以歪曲，妄圖證明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分析已經“過時”，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妄圖抹殺和歪曲帝國主義的本質，而達到其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我們在揭露和打倒現代修正主義謬論的同時，必須運用毛澤東同志關於認識過程辯證法的理論，揭露其認識論根源，揭露其反動的唯心主義的經驗主義。在毛澤東同志的關於認識過程辯證法的理論指導下，我們就一定能夠將修正主義的種種詭辯徹底揭露，徹底粉碎。

在分析了認識過程的辯證性的基礎上，毛澤東同志從人類實踐發展和認識發展的長遠的過程，論證了主觀和客觀、主觀辯證法和客觀辯證法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他說：“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着矛盾和鬥爭的發展，人的認識運動的發展也是充滿着矛盾和鬥爭的發展。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後地能夠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①毛澤東同志在論述主客觀的辯證統一時，特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論，指出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辯證關係。他說：“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每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②這是對真理問題的唯物的而且是辯證的說明。後來，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中，

① 毛澤東：“實踐論”，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4頁。

② 同上。

他又进一步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指出真理是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的，并且指出错误产生的原因和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指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和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于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问题的深刻的发挥。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称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他运用辩证法去分析认识运动的时候，特别发挥了关于认识的能动作用，关于主观能动性的理论。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①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精确地表述了主观能动性的含义，他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②毛泽东同志根据对立面相互转化的理论，彻底解决了尊重客观事实，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客观决定主观，“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③。“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④在分析抗

① 同上，第280—281页。

② 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7页。

③ 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813—814页。

④ 同上，第314页。

日战争的变化时，他进一步指明：当客观因素具备着变化的可能性，而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他认为在战争中武器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今天，当科学技术获得极大进步，战争武器发展为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时代，在帝国主义以这类武器恐吓人民，进行讹诈，在修正主义者极力为帝国主义帮腔，而在一部分人中发生迷惑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又坚决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坚定地指出，无论在过去、当前或将来，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决定人类命运、决定战争胜负的，都不是技术和武器，而是人，是人民群众。只要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觉悟的人民总会找出新的办法去抵制反动派的武装优势，从而取得自己的胜利。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和按语及其他论著中，同样强调人的作用，指出建设中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指出人是生产力的最积极的因素，人的干劲是决定性的条件等等。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同志特别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是极其艰巨的事业，在革命中，敌我力量异常悬殊，斗争极其残酷；在建设中，我们的底子差，“一穷二白”。这种情况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的能动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高度发挥，要迅速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国革命事业的辉煌胜利和建设事业的巨大跃进，正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启发和动员了广大群众的结果。历史上的和当前的一切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这个道理，

他們在戰爭中是“唯武器論”，在建設中是“唯條件論”，他們死抱着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機械唯物論的消極反映論不放，無視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這也就是他們之所以遭到失敗，之所以跌入右傾機會主義泥坑的重要原因。

毛澤東同志不僅論證了主觀能動性的偉大作用，而且通過對革命和建設中客觀規律的分析，指出了如何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途徑。他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和按語、“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介紹一個合作社”、“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等論著，是根據客觀的歷史辯證法，啟發和引導正確發揮人民群眾主觀能動性的偉大篇章，是對人民群眾主觀能動性的偉大頌歌。在任何情況下，毛澤東同志總是善於根據對於歷史發展的辯證規律的分析，尋找出革命人民由失敗到勝利，由弱小到強大、由被動到主動、由貧窮到富強的具體道路，指出矛盾轉化的必然性，指出促成這種轉化的條件，並且制定出黨的路線、政策和戰略戰術，引導人民群眾去實現這些條件，促成這種轉化。在當前，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他所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的偉大號召，以及進行政治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加強黨的領導，政治掛帥，加強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大搞群眾運動等一系列的方針和措施，都是建立在分析客觀規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理論基礎之上的。正是由於這些路線、方針的實施，由於人民群眾主觀能動性的高度發揮，才出現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局面，迅速地改變着我國的面貌。右傾機會主義者看不到這一切，卻把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污蔑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這除了說明他們的資產階級立場以外，還說明了他們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

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論和唯心論。

現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他們为了替資本帝国主义效劳，不能不极力貶低和抹杀人民群众的主觀能动性，貶低和抹杀馬克思主义理論的指导作用。他們散布自发論，力图降低革命水准，降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水准，使革命人民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和接受資本主义的影响。他們力图使群众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日常的、暫时的、局部的利益上面，而忘記長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力图把政治斗争降低到純粹科学技术的斗争，把革命的斗争降低到仅仅局限于議会的斗争；力图証明没有一个真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政党的领导，也可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他們侈談和平，宣揚什么意識形态的斗争已經不需要了，力图把共产党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降低到資产階級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水平；等等。总之，他們的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貶低人民群众的革命的主觀能动性，使他們失去先进理論和先进政党的指导，失却革命斗志，甘受帝国主义的剝削和奴役。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觀能动性的理論就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全部理論活动和实践活动都是为提高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的主觀能动性而斗争，他的理論啓发和动员了极为广泛的群众，大長人民群众的志气，大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威风，給予修正主义以迎头痛击。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觀能动性的理論是革命辯証法的革命性、批判性的最高体现，是战斗唯物主义最具战斗意义的部分，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最为突出的表现。

三

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辯証法是彻底的革命的辯証法。他把唯物辯

証法特別是对立統一規律彻底运用于历史領域，在战斗中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他根据矛盾規律，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和当前国际国内的階級斗争中，大大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階級分析的方法，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階級斗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專政的学說；他在当前时代，在人类历史的新的轉折时期，用革命的辯証法揭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辯証規律性，創立了关于兩类矛盾的学說，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人民群众在改造世界中的偉大作用的理論；发展了关于不断革命論的理論。毛泽东同志这些貢獻，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理論基础。它对于反对修正主义以及一切資产階級思潮，对于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对于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以及今后亿万斯年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都有不可估量的偉大意义。

把唯物辯証法特別是对立統一規律运用于历史領域，首先就要求采取階級分析的方法，运用階級斗争的观点观察社会生活。毛泽东同志正是无限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辯証法，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階級斗争的理論，忠实于階級分析的方法，因而無論在革命时期与反动时期，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都能对形势作出高度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各种复杂混乱的状态中向我们指出社会发展的規律性，并且对于階級分析的方法和階級斗争的理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毛泽东同志一投入革命活动，就对中国社会各階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且指出“誰是我們的敌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这个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①，从而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了明确的道路。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一贯把分析社会各階級状况、分清敌我，放在革命的首要地位，坚决批判

^①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版，第3頁。

了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抹杀阶级斗争的反动谬论。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革命斗争和批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时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

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基本观点，特别分析了当前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状况，进一步地、大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論，保卫和发展了列宁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阉割、歪曲列宁主义，說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的观点“过时了”，“列宁主义过时了”，他们完全歪曲了当前时代的阶级本质，抹杀帝国主义时代各种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闭口不谈帝国主义，空谈一般的“合作”。毛泽东同志对修正主义这种背叛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論，经常提醒我们，在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世界人民力量之间的对立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从帝国主义时代各种根本的阶级矛盾出发。他并且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对国际形势作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指出了斗争方向。他一貫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貫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运动，一貫坚持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所有这些，都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在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也根据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战争与和平的阶级性质，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可以互相转化；他还经常教导我们，对待帝国主义不应该存

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新华社社论），载1949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有迷信和幻想，應該和它們進行堅決的鬥爭；帝國主義玩弄假和平、真備戰的兩面政策，我們也應該以革命的兩面政策對付他們，一方面揭露它們的“和平”陰謀，一方面隨時準備粉碎它們的戰爭計劃，用革命的正義的戰爭消滅帝國主義者所發動的非正義戰爭。他說：“我們是堅持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也不要害怕。我們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同對待一切‘亂子’的態度一樣，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蘇聯，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九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全部崩潰。”^①

毛澤東同志還在新的條件下發展了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關於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即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階級鬥爭的學說。列寧說：“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可能還沒有走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的圈子。……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②現代修正主義者就是一些“沒有走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的圈子”的資產階級奴仆，他們閹割和歪曲馬克思主義，力圖把它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东西。他們宣揚資本主義可以“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使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僅僅局限於經濟鬥爭和議會鬥爭，而反對暴力革命；他們猖狂地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用什麼“人道主義”，“自由、平等、博愛”，“民主化”等等一堆腐爛透頂的資產階級政治口號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毛

①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頁。

② 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頁。

澤东同志坚决地捍卫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專政的革命原則，論証了暴力革命和爭取革命的和平发展、武裝斗爭和合法斗爭的辯証关系，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問題。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对的，不論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①他还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說，創造了人民民主專政这一无产階級專政的具体形式，充分論証了无产階級專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辯証关系。他特別根据我国过渡时期階級斗爭的經驗，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关于过渡时期即无产階級專政时期階級斗爭的学說。他提出了不仅根据經濟关系，而且要根据政治态度、立場、思想来考查和分析各階級，并在我国經濟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依据这个原則把我国現存階級区分为两个剝削階級和两个劳动階級，并且在这种区别上建立党的各种政策。他还提出了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开展兩条道路斗爭的理論，总結了整个过渡时期階級斗爭的規律，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階級同資产階級的斗爭，社会主义道路同資本主义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种斗爭的規律既不是愈来愈尖銳化，也不是階級斗爭熄灭論，而是波浪起伏，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表現尖銳，有时候表現緩和；这种斗爭，要到資产階級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才会熄灭。毛澤东同志这些巨大的理論貢獻，都有力地捍卫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原則，反对了現代修正主义的种种謬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澤东同志根据馬克思主义唯物辯証法，創立了兩类矛盾的学說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說。从而在根本理論上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① 毛澤东：“战争和战略問題”，載“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9頁。

在我們的时代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系列的國家里建立起来，已經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形成尖銳的对立。在世界範圍內存在着严重的階級斗争。而在已經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國家里，除了敌我之間的斗争以外，人民內部的矛盾則又大量存在。人民內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并且可以互相轉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有兩種錯誤理解。有些人否認这种矛盾的存在，他們諱言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諱言人民內部矛盾，因而在社会矛盾面前縮手縮脚，处于被动地位；他們甚至把人民內部矛盾当着敌我矛盾处理，以致造成混乱。現代修正主义者則从右的方面否認这种矛盾，他們一方面抹杀真正的敌我矛盾，一方面則竭力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內部矛盾夸大为敌我矛盾，竭力混淆人民內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把人民內部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阻碍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和破坏人民內部的团结。社会实践向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及其領袖提出了一个严重的历史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馬克思主义唯物辯証法貫徹到底，正确分析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发现和利用社会发展的規律性，丰富和发展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否則，就无法推动社会前进，就会給革命帶來損失。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就曾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問題。他說：“对抗和矛盾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消失了，矛盾还会存在。”^①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未能系統地全面地考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在当前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划时代的哲学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書里，正确地回答了时代所提出的問題，系統地提出了兩类矛盾的学說。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列宁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書的評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頁。

矛盾的思想，使之形成了完備的理論。他根據對立統一規律，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區分了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指出不同性質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指出了兩類矛盾相互轉化的可能性，以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和方法。毛澤東同志這個理論貢獻，給全世界共產黨人和革命的人民一個有力的武器，嚴重地打擊了現代修正主義者混淆兩類矛盾的陰謀，同時也有助於防止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產生和發展。

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進一步加強了我國人民群眾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進一步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促進了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毛澤東同志一貫重視人民群眾在改造社會、改造自然中的偉大作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又提出無論在革命和建設的一切工作中，都必須大搞群眾運動，都必須把最廣大的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發動起來，而反對少數人冷冷清清地搞建設的做法。為此，他分析了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提出了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提出了“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公式。在後來，他又總結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形式以及一系列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這樣，毛澤東同志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調動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性，極大地推動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

毛澤東同志根據對立統一規律，進一步探討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各種矛盾的根源，提出了關於社會基本矛盾的新觀念。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①毛澤東同志把生產關係和生產

力之間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間的矛盾确定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对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它把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規律的学說普遍化、具体化了，它不仅是几千年階級社会发展历史規律的总结，而且明确指出这也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規律。这个理論产生在人类历史从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大轉折的时期，它有力地粉碎了一切把社会主义社会凝固化、停滯不前的旧观念，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开辟了广闊的天地。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粉碎了現代修正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的歪曲。因为現代修正主义者曾經利用人們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矛盾的認識不足，故意混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况，他們一方面为資本主义粉飾，說資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国家資本主义”等办法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社会主义国家是官僚机构。为了駁斥这种修正主义观点，毛泽东同志在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时就同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階級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①

毛泽东同志根据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說，领导我国人民順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在我国实现三大改造以前，社会基本矛盾突出地表现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根据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1頁。

② 同上，第10頁。

这种情况，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实现了三大改造，集中力量解决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三大改造以后的一个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为此，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进行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提出了改变上层建筑中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的许多措施，以解决这种矛盾，从而又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接着，他又提出了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和根据这个理论制定的各种路线政策，为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蓬勃发展开辟了生动的局面，使我们能够主动地自觉地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运动，采取正确的办法，促使矛盾向有利的方向转化，推动社会的发展；使我们真正做到了从必然向自由的飞跃，从而真正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者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用形而上学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或者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或者不能分辨这种矛盾的性质，因而不能不在社会矛盾激烈变化面前头昏目眩，惊慌失措。

毛泽东同志根据对立统一的规律，彻底贯彻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马克思第一次提出的不断革命口号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制定了完备的革命转变论。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不断革命的理论推广运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科学地论证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发展成为完整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理论。为毛泽东同志所发展的这个理论，不仅指导了我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指导着我国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毛泽东同志根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即使在共产主义时代，还一定会有

很多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还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同时，这个理论不仅适用于各个大的革命过程之间的转变，而且适用于一个大的革命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例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战线上的革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不仅如此，而且它还适用于各革命阶段内的各种革命任务之间的推移过程，成为指导一切革命工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

毛泽东同志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理论，是把唯物辩证法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观察社会生活、推动历史发展的杰出的典范。它的出现，横扫了一切对于社会发展的绝对化、凝固化的形而上学观点，横扫了甘居下游、保守不前的右倾保守观点，武装了革命的人民群众，成为他们不断跃进的思想武器。列宁说：“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①毛泽东同志关于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就是非常沉重地打击了列宁所指出的这种虚伪的资产阶级观点，从而指导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不断革命、不断跃进的场面，引起了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迅速前进。同时，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理论也防止了某些企图超越一定发展阶段的急躁冒进的思想，使我们能够根据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8—89页。

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稳步地前进。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之所以能在关于革命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斗争中，总是比别人站得更高与看得更远更深，总是能够保持自己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战胜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一貫强调哲学和政治、哲学和生活、哲学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毛泽东同志一貫坚持把哲学根植于政治斗争和生活实践之中，不断地从生活实践中发展和丰富哲学。他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斗争中，始終和群众在一起，最善于发现群众的创造，总结群众的经验，把群众的愿望、要求，经验、智慧集中起来，作出哲学的概括，再用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指导群众的行动。因此，他的哲学思想最易于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成为他们的战斗武器。总之，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把哲学运用于广大群众的实践斗争，是毛泽东哲学的重大特色之一。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整风运动，就是把哲学和政治、哲学和生活、哲学和群众紧密联系起来，使哲学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战斗武器的最有效的形式。

* * *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就必须学习他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伟大思想；就必须学习他在实践中把哲学作为工人阶级革命和建设武器的光辉榜样。我们必须这样反复深入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他的全部著作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刻苦钻研，领会其精神实质，逐步地学会运用这个锐利的武器，把革命的辩证法贯彻到底，破除一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树立和巩固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从而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一 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 革命和建設的武器

1.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馬克思列宁主义傳入中国，从此中国人民获得了革命和建設的武器，中国革命面目也就为之一新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問題。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結論。

毛泽东：“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頁。

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沒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后一阶段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79頁。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結合的二十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則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

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5页。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90—691页。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4页。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

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

同上，第1095頁。

……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文化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御列強，內建民國。但是和封建主義文化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陣下來，宣告破產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六評白皮書”(1949年9月16日新華社社論)，
1949年9月17日“人民日報”。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列主義即科學的社會革命論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繼續復興着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

同上。

這個觀念形態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觀念形態，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前的外國侵入者所未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列主義文化，即科學的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社會革命新文化，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第二仗打敗

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長征路上的攔阻，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結果了美国 and 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統治及其走狗蔣介石等一切反动派。

同上。

我国的革命和建設的胜利，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們党的一貫的思想原則。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詞”
(1956年9月15日)，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頁。

2. 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切資产階級唯心論、形而上学的 宇宙觀根本不同，它是最正确最科学的革命理論。

在人类的認識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見解，一种是辯証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兩種宇宙觀。……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無論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長的历史時間內，是屬於唯心論的宇宙觀，并在人們的思想中占了統治的地位。在欧洲，資产階級初期的唯物論，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許多国家的社会經濟情况进到了資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階級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偉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証法的宇宙觀。于是，在資产階級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論之外，还出現了庸俗的进化論，出来对抗唯物辯証法。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8頁。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实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資产階級的唯物論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統一战綫；但

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論建立統一战綫。共产党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战綫，但是决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义。

毛澤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00頁。

我們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結晶。

毛澤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4頁。

附 录

胡风又說：“文艺問題也实在以机械論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論”是辯証唯物論的反話，“最省力”是他的瞎說。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檢查的。唯物論和辯証法則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檢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論和形而上学方面去。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人民日报”編者按語(1955年5月24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頁。

3. 馬克思主义哲学有兩個最显著的特点——阶级性和实践性。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辯証唯物論有兩個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辯証唯物論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強調理論对于实践的依賴关系，理論的基础是实践，又轉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

的觀點。

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頁。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

同上。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

同上，第280—281頁。

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

同上，第284頁。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說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對於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刮臉皮。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卻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9頁。

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甚至一個階級的各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現在封建階級有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有資本主義，佛教徒有佛教主義，基督徒有基督主義，農民有多神主義，近年還有人提倡什麼基馬爾主義，法西斯主義，唯生主義，“按勞分配主義”，為什麼無產階級不可以有一個共產主義呢？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80頁。

我們說的馬克思主義，是要在群眾生活群眾鬥爭里實際發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0頁。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59頁。

4.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產物，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發展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是人類認識史上的一個空前大革命。

在很長的历史時期內，大家對於社會的历史只能限於片面的了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历史，另一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夠對於社會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2頁。

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為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還未到來，還無這種實踐，只有列寧和斯大林才能擔當此項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的

實踐，沒有這后一個條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同上，第275—276頁。

由於歐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經濟情況進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生產力、階級鬥爭和科學均發展到了歷史上未有過的水平，工業無產階級成為歷史發展的最偉大的動力，因而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8頁。

馬克思不但參加了革命的實際運動，而且進行了革命的理論創造。他從資本主義最單純的因素——商品開始，周密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商品這個東西，千百萬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科學地研究了它，他從商品的實際發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從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學的理論來。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歷史，研究了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9頁。

辯證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古代就產生了。但是古代的辯證法帶着自發的朴素的性質，根據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還不可能有完備的理論，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宇宙，後來就被形而上學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對於辯證法曾經給了很重要的貢獻，但是他的辯證法卻是唯心的辯證法。直到無產階級運動的偉大的活動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綜合了人類認識史的積極的成果，特別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合理的部分，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偉大的理論，才在人類認識史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大革命。後來，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又發展了這個偉大的理論。這個理論一經傳到中國來，就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極大的變化。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1—292頁。

5. 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斗争的结果必然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代替资本主义思想体系。

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認為是毒草。現在它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还在繼續受打击，还被認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来，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剛剛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結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長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馬克思主义仍然必須在斗争中发展。馬克思主义必須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現在是这样，將來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錯誤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东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錯誤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拋棄，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結。这是真理发展的規律，当然也是馬克思主义发展的規律。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7頁。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同上，第29—30页。

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同上，第28页。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79页。

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

之勢已成，則是確定無疑的了。

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
“紅旗”1958年第1期，第3頁。

6. 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樹立正確的態度和方法。學習的目的應該為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了單純地學習理論；學習的方法應該是理論聯繫實際，而不是理論脫離實際。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

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0—281頁。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於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1頁。

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

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偉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談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义。因此，使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須解决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头必須少唱，教条主义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聞乐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紧密的結合起来。

同上，第522—523頁。

許多同志的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單純的学习。所以虽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詞句，而不会运用他們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現狀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問題和解决中国革命問題。这种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級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毛泽东：“改造我們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7頁。

第一种：主觀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場，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單純地学理論而去学理論。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这就是我們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导革命，則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觀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純的一种表現。大敌当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們应当說，沒

有科学的态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态度，就叫做沒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

第二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結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从它找立場，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我們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实际統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同上，第799—802頁。

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来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則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連声贊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願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講明白，我們党的理論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毛泽东：“整頓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21—822頁。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学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領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現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書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現成的灵丹聖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費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們对这些人應該作启蒙

运动。那些將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說,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經反复地講,我們的学說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記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話。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們善于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說,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实际相联系。

同上,第822頁。

对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說明一个两个实际問題,那就要受到称贊,就算有了几分成績。被你說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

同上,第817頁。

我們讀了許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書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論家呢?不能这样說。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們根据实际創造出来的理論,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結論。我們如果仅仅讀了他們的著作,但是沒有进一步地根据他們的理論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沒有企图在理論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們就不能妄称为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家。……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論家,他們能够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釋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問題,能够在中国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种种問題上給予科学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这样的理論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領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質,真正領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真正領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說,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問題,找出它的发展規律,这样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同上,第816頁。

二 辯証唯物論中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致性

1. 世界觀是关于自然知識和社会知識的概括和总结。辯証唯物論和历史唯物論是无产階級的世界觀，同时又是无产階級認識周圍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致体。

自从有階級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产斗争知識，一門叫做階級斗争知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学則是关于自然知識和社会知識的概括和总结。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7—818頁。

共产主义的宇宙觀是辯証唯物論和历史唯物論……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81頁。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够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毛泽东：“实践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0—281頁。

这个辯証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导人們要善于去觀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運動，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則，对于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2頁。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論。不应当把他們的理論當做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於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1頁。

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並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藝術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5頁。

我們的軍事原則是：（1）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強大之敵。（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及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3）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及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及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須要反復多次才能最後地保守或奪取之。（4）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採用給敵以殲滅性打擊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之目的，以便我軍能夠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軍。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這樣，在全体上，我們是劣勢（就數量來說），但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的優勢，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在全体上轉變為優勢，直到殲滅一切敵人。（5）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之

把握：(6)发揚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与連續作战(即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陣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及城市。(8)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及城市則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备、而又为环境所許可之据点及城市，則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則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及大部人員，补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綫。(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間の間隙休息与整訓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長，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时间。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軍打敗蔣介石的主要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軍在和内外敌人長期作战中鍛煉出来，并完全适合我們目前的情况的。蔣介石匪帮及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軍事人員，熟知我們的这些軍事方法。蔣介石曾經多次召集他的將校受訓，將我們的軍事書籍及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給他們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軍事人員則向蔣介石建議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軍的战略战术；并替蔣介石直接訓練軍队，接济軍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蔣介石匪帮的失敗。这是因为我們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队都不能利用我們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解放社編“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20—22頁。

2. 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和唯物論是統一的。把辯証法同唯物論割裂开来，或从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割去了它的辯証法，就要陷入唯心論或机械論。

辯証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辯証法帶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質，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論，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辯証法曾經給了很重要的貢獻，但是他的辯証法却是唯心的辯

証法。直到无产階級运动的偉大的活动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綜合了人类認識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別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辯証法的合理的部分，創造了辯証唯物論和历史唯物論这个偉大的理論，才在人类認識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毛澤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1—292頁。

有人觉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經濟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經濟基础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并不互相轉化。这是机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証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产力、实践、經濟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誰不承認这一点，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論、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轉过来表現其为主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須承認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經濟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們这样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为我們承認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質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識；但是同时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識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經濟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証唯物論。

同上，第313—314頁。

……一切客觀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觀

主义的。

同上，第301—302頁。

“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同上，第318頁。

3.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统一的。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想中存在的普遍规律。

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3頁。

按照唯物辯証法的观点,自然界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內部矛盾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0頁。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對立面又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對於任何一個具體的事物說來，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因而是相對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這個規律，列寧講得很清楚。這個規律，在我國，懂得的人逐漸多起來了。但是，對於許多人說來，承認這個規律是一回事，應用這個規律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又是一回事。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着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着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這樣，就有必要在我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幹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並且懂得採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10頁。

4. 辯証法、認識論和邏輯學三者的一致。

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着矛盾和鬥爭的發展，人的認識運動的發展也是充滿着矛盾和鬥爭的發展。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証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後地能夠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也是

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对于客观现实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統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毛泽东：“实践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4頁。

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对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觀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認識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辯証唯物論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觀思維的过程中，矛盾貫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終，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側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統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轉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則是不断的，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当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則就要犯錯誤。如果我们經過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們就能够击破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們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經驗的同志們整理自己的經驗，使之帶上原則性，而避免重复經驗主义的錯誤。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24—325頁。

就人类認識运动的秩序說来，总是由認識个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总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当着人們已經認識了这种共同的本質以后，就以

这种共同的認識为指导，繼續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認識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認識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認識不断地深化。

同上，第298頁。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異，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觀矛盾的反映。客觀矛盾反映入主觀的思想，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們的思想問題。

同上，第294頁。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內容。拿我国的情况來說，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屬於人民的范圍，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这些階級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階級、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屬於人民的范圍。在現阶段，在建設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贊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階級、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屬於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視、破坏社会主义建設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頁。

附 录

如同我們經常在估計国际国内階級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經常估計这种形势。但我們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們是注定要灭亡的，他們不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他們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觀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們的估計总是錯

誤的。他們的階級本能引導他們老是在想：他們自己怎樣了不起，而革命勢力总是不行的。他們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們的力量。我們亲眼看到了許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軍閥，日本軍國主義，莫索里尼，希特勒，蔣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們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動的錯誤。現在的一切帝國主義也是一定要犯這種錯誤的。難道這不好笑嗎？照胡風分子說來，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嗚呼完蛋”的，這種力量不過是“枯黃的葉子”和“腐朽的屍體”。而胡風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雖然“有些脆弱的芽子會被壓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沖開”甚么東西而要“茁壯地生長起來”。如果說，法國資產階級的國民議會里至今還有保皇黨的代表人物的話，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剝削階級徹底滅亡之後多少年內，很可能還會有蔣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動着。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遠不會承認他們的失敗的。這是因為他們不但需要欺騙別人，也需要欺騙他們自己，不然他們就不能過日子。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中“人民日報”編者按語（1955年6月10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122頁。

三 世界的物質統一原理和普遍發展 原理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 完整的世界觀

1. 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除了運動的物質以外，世界上什麼也沒有。

……除了我們的頭腦以外，一切都是客觀實際的東西。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5頁。

人的認識物質，就是認識物質的運動形式，因為除了運動的物質以外，世界上什麼也沒有……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6頁。

**2. 不可否認事物的運動發展，也不可否認事物的靜止平衡。
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否認事物的運動發展就是機械主義，否認事物的相對固定性就是相對主義。**

由此看來，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着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從時間的條件說，戰爭和戰爭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点，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於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和反革命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從地域的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特別是大

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6—167页。

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4页。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同上，第320—321页。

有些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

針之相对的固定性，說這樣的計劃或方針是“機械的”東西。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如上條所述，我們完全承認：由於戰爭情況之只有相對的確實性和戰爭是迅速地向前流動的（或運動的，推移的），戰爭的計劃或方針，也只應給以相對的固定性，必須根據情況的變化和戰爭的流動而適時地加以更換或修改，不這樣做，我們就變成機械主義者。然而決不能否認一定時間內的相對地固定的戰爭計劃或方針；否認了這點，就否認了一切，連戰爭本身，連說話的人，都否認了。由於戰爭的情況和行動都有其相對的固定性，因而應之而生的戰爭計劃或方針，也就必須拿相對的固定性賦予它。例如，由於華北戰爭的情況和八路軍分散作戰的行動有其在一定階段內的固定性，因而在這一定階段內賦予相對的固定性於八路軍的“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種戰略的作戰方針，是完全必要的。戰役方針，較之上述戰略方針適用的時間要短促些，戰術方針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時間的固定性。否認了這點，戰爭就無從着手，成為毫無定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這也是、那也是的戰爭相對主義了。沒有人否認，就是在某一一定時間內適用的方針，它也是在流動的，沒有這種流動，就不會有這一方針的廢止和另一方針的採用。然而這種流動是有限制的，即流動於執行這一方針的各種不同的戰爭行動的範圍中，而不是這一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流動，即是說，是數的流動，不是質的流動。這種根本性質，在一定時間內是決不流動的，我們所謂一定時間內的相對的固定性，就是指的這一點。在絕對流動的整個戰爭長河中有其各個特定階段上的相對的固定性——這就是我們對於戰爭計劃或戰爭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意見。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85—486頁。

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鬥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

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3頁。

3. 要從客觀實際出發，不要從主觀願望出發；要根據客觀情況和群眾需要制訂方針政策，不要憑想象和熱情辦事。

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

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頁。

我們也不是不喜歡速勝，誰也贊成明天一個早上就把“鬼子”趕出去。但是我們指出，沒有一定的條件，速勝只存在於頭腦之中，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們客觀地並全面地估計到一切敵我情況，指出只有戰略的持久戰才是爭取最後勝利的唯一途徑，而排斥毫無根據的速勝論。我們主張為着爭取最後勝利所必要的一切條件而努力，條件多具備一分，早具備一日，勝利的把握就多一分，勝利的時間就早一日。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縮短戰爭的過程，而排斥貪便宜尚空談的速勝論。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49頁。

俗話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又說：“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看情形辦理……

毛澤東：“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35頁。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們說：应当从客觀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規律，作为我們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

毛泽东：“改造我們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9—800頁。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我們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联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內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变的內部联系，作为我們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須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書本，而凭客觀存在的事实，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結論。

同上，第801頁。

我們討論問題，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們是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主义叫我們看問題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觀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針、政策、办法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4—855頁。

延安县同志們的精神完全是布尔塞維克的精神。……他們对于他們所領導的延安全县人民群眾的情緒、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們完全和群眾打成一片，他們有很好的調查研究工作，因而他們就学会了馬克思主义的領導群眾的艺术，他們完全沒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問題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象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調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載、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豈不又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么！我們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

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調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們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

毛泽东：“經濟問題与財政問題”(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書店1948年版，第767—768頁。

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願望出发。有許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覺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願实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經過我們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覺悟，有了决心，自願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則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願，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敗。“欲速則不达”，这不是說不要速，而是說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敗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兩条原則：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願，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們代替群众下决心。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战綫”(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1010—1011頁。

有一个問題必須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們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們所处的环境。我們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这一点好象并没有什么問題，誰不知道我們是处在农村中呢？其实不然。我們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們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們不从建立在个体經濟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們就在政治問題上，軍事問題上，經濟問題上，文化問題上，党务問題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項的問題上，常常处理得不适当，或不大适当。他們帶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

作出許多不适当的計劃，強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几年来，由于整风；由于在工作中碰了釘子，我們的同志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須注意使我們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們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們的工作样样見效，并迅速見效。如果我們真正了解了我們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經濟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如果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看起来收效很慢，并不轟轟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比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发，例如說，从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为，如果我們从后一点出发，脱离今天的实际情况，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問題，而是老碰釘子，根本没有效果的問題。

毛泽东：“必須学会做經濟工作”（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4—1015頁。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針，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們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針。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訓。

毛泽东：“在晉綏干部会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解放社編“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82頁。

我們作計劃、办事、想問題，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記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問題，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們，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將消极因素轉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設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偉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認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們的本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頁。

4. 了解情况的唯一方法就是向下作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要作好調查，首先必須放下架子，眼睛向下，虛心向群眾學習，甘心當群眾的小學生。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动情況。對於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

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個人即够。必須給予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一般地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於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

仍然坚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发言权的。

毛泽东：“‘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89—791頁。

第二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对周圍环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不是單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說的那樣：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結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單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泽东：“改造我們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頁。

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結論。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們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調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产党領導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夸夸其談地乱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傳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个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同上，第802頁。

什么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沒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总得贊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来。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对于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么，这就是发现問題的过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发现問題，提出問題，但是还不能解决問題。要解决問題，还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

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40页。

5. 不从实际出发,不作调查研究,而是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就不能完成革命任务,不能作好工作。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94页。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

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確地發展黨內的思想鬥爭的。孫子論軍事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他說的是作戰的雙方。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列寧說：“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面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我們應該記得他的話。表面性，是對矛盾總體和矛盾各方的特點都不去看，否認深入事物里面精細地研究矛盾特點的必要，僅僅站在那裡遠遠地望一望，粗枝大葉地看到一點矛盾的形相，就想動手去解決矛盾（答復問題、解決糾紛、處理工作、指揮戰爭）。這樣的做法，沒有不出亂子的。中國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觀性，因為一切客觀事物本來是互相聯系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實地反映這些情況，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聯系，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所以這種方法是主觀主義的。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0—302頁。

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認識論上的根源。他們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無根據地純主觀地說一頓；或者是只根據問題的一側面、一時候的表現，也同樣主觀地把它夸大起來，當作全體看。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36—437頁。

我們反对主觀地看問題，說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觀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敗，故須反对它。

同上，第467頁。

現在我們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負指导工作，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階級的实际情況，沒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会有有的。

毛泽东：“‘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89頁。

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議論，提意見，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敗。因为这种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过是无知妄說。

同上，第791頁。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則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还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統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实际狀況的濃厚空气。“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叶，夸夸其談，滿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們認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觀的真實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觀的願望出发；我們的許多同志却直接違反这一真理。

毛泽东：“改造我們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6—797頁。

发展經濟的路綫是正确的路綫；但发展不是冒險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顧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曠发展，例如要求建設重

工业,提出大鹽业計劃、大軍工計劃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綫是正确的发展路綫,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計劃。这就是党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的兩条战綫上的斗争。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95頁。

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書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毛泽东:“兴国調查”(1931年1月26日),“毛泽东选集”,东北書店1948年版,第51頁。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針,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們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觀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針。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訓。

毛泽东:“在晉綏干部会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解放社編“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82頁。

四 主客觀的統一,主觀能动性

存在决定意識;觀念形态、科学規律是客观实际对于我們頭腦的反映。

軍事的規律;和其他事物的規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們頭腦的反映,除了我們的頭腦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認識的对象,包括敌我兩方面,這兩方面都應該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們的頭腦(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

毛澤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5頁。

在階級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毛澤东:“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2頁。

中国自从发生了資本主义經濟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漸改变了性質,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經濟还是占优势。这种資本主义經濟,对于封建經濟說来,它是新經濟。同这种資本主义新經濟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的政治力量。而在觀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經濟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們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沒有資本主义經濟,沒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沒有这些階級的政治力量,所謂新的觀念形态,所謂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毛澤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88頁。

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識，就是階級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們的思想感情。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3—854頁。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同上，第862頁。

想要阻擋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擋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絆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社会就是这样地每天在前进，人們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別在革命高漲的时候是这样。

毛泽东：“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屬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8頁。

2. 客观实际是異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但它总是可以認識的。

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將是屬於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設想，这种持久战，將具体地表現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預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將是異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給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輪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將來的事实，而將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見，描画輪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毛泽东：“論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52—453頁。

我們承認战争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会現象更难捉摸，更少确

实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規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錯誤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

同上，第480頁。

3. 重要的問題不在于解釋世界，而在于能动地改造世界。自覺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我們一方面不可以超越客觀物質条件，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另一方面也不可以否認在既定的客觀物質条件下主观能动性的决定作用。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够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毛泽东：“實踐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0—281頁。

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觀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見之于客觀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觀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們必須发揚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須发揚这种自覺的能动性。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須动員全中国人民，統統发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沒有持久战；也沒有最后胜利。

毛泽东：“論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7頁。

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点。人類在戰爭中強烈地表現出这样的特点。戰爭的勝負，固然決定於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僅決定於這些；僅有這些，還只是有了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的能動性。

同上，第467—468頁。

戰爭的勝負，主要地決定於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於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內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家活動的舞台建築在客觀物質條件的上面，然而軍事家憑着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因此，我們紅軍的指導者，在既定的客觀物質基礎即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之上，就必須發揮我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階級的敵人，改變這個不好的世界。這裡就用得着而且必須用我們的主觀指導的能力。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5—176頁。

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態。在這裡，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客觀因素具備着這種變化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就需要正確的方針和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作用是決定的了。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76頁。

……主動性，說的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是用以區別於被迫處於不自由狀態的。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失了這種自由，軍隊就接近於被打敗或被消滅。一個士兵被繳械，是這個士兵失了行動自由被

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

同上，第477页。

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03页。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

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8页。

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

同上，第479—480页。

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同上，第483页。

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同上，第484页。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固然正规战争的计划性更大些，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但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须知同敌人斗争是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05—406页。

上述三个阶段（指抗日战争的防御、相持、反攻——本书编者）的看法，是依据敌我既存的与将来可能发生的双方相反对比之具体条件，而作出的一种对于整个战争过程的估计，现在并不是事实，而是一种可能的趋势。要依我之主观努力，创造出为这种可能趋势所必要的条件，才能使可能趋势变为事实。然而依据既存条件，加上正确指导与全民族广大而坚持的努力，是能够使这种可能趋势变为事实的。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21页。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千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

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書記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頁。

不要以为只有老解放区才能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的运动，晚解放区则不能够，这样想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晚解放区同样可以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就若干的县、区、乡来说，晚解放区可能和老解放区同时完成、甚至先期完成合作化，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事例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完全要看党的领导工作是否适当，是否少犯错误来决定的。

毛泽东：“‘我当大社主任的經驗’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51頁。

4. 承認总的历史发展中是存在决定意識；但是同时又承認意識对存在的反作用。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論，坚持了辯証唯物論。

誠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誰不承認这一点，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論、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轉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須承認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們这样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为我們承認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質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識；但是同时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識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論，坚持了

辯証唯物論。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3—314頁。

所謂“唯武器論”，是戰爭問題中的機械論，是主觀地和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我們的意見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毛泽东：“論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59頁。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經濟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付奴隶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現在真正开始統治这块地方了。

毛泽东：“介紹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紅旗”1958年第1期，第3—4頁。

5.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規律，他們一定要犯而且已經犯了很多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錯誤。革命者如果不加强思想改造，不去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部的規律性，而只是主觀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事物，那也很容易犯錯誤。我們必須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是我們目前的迫切任务。

頑固派，他們总有一套計劃，其計劃是如何損人利己以及如何裝

兩面派之類。但是從來的頑固派，所得的結果，總是和他們的願望相反。他們總是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我們曾說張伯倫“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現在已經應驗了。張伯倫過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這塊石頭，去打蘇聯人民的腳，但是，從去年九月德國和英法的戰爭爆發的一天起，張伯倫手上的石頭卻打到張伯倫自己的腳上了。一直到現在，這塊石頭，還是繼續在打張伯倫哩。中國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凱想打老百姓的腳，結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幾個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等，他們都想鎮壓人民，但是結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損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結果都不妙。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年2月20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31頁。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據這種分裂方針所準備採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並且讓它永遠也解不開，這條繩索的名稱就叫做“國民大會”。他們的原意是想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寶，祭起來，一則抵制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可是，歷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69頁。

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於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頁。

為什麼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因為戰爭或戰鬥的部署和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在情況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人辦一切事情都難

免这种情形，有比較地会办和比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較地会办，軍事上就要求比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說，要求比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關鍵，就在于把主觀和客觀二者之間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來說。攻击点选在敌人陣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觀和客觀相符合，也就是指揮員的偵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結果正碰在敌人的釘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預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觀指揮和客觀情况統統相符合。統統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緣故，这和处置靜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揮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2—173頁。

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后，也就从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变失敗为胜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實踐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頁。

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主觀性，就是不知道客觀地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問題。……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認深入事物里面精細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問題、解决糾紛、处理工作、指揮战

爭)。这样的做法，沒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觀性，因為一切客觀事物本來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觀主义的。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0—302頁。

我們黨內的主觀主义有兩種：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經驗主义。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21頁。

主觀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階級所需要的，而是剝削階級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們黨內，是小資产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資产階級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們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数量的黨員是出身于这个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資产階級的尾巴进党来。小資产階級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觀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現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34頁。

为了爭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謂放下包袱，就是說，我們精神上的許多負擔應該加以解除。有許多的东西，只要我們對它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就可能成为我們的包袱，成为我們的負擔。例如：犯过錯誤，可以使人覺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錯誤的，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錯誤，也可以使人覺得自己是未犯过錯誤的，从此驕傲起来。工作无成績，可以使人悲觀喪

气；工作有成績，又可以使人趾高气揚。斗争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負責任；斗争历史長的，可以因其長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識傲視工农分子。各种业务專長，都可以成为高傲自大輕視旁人的資本。甚至年齡也可以成为驕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聰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經驗而看不起青年人。对于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没有自覺性，那它們就会成为負担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錯誤，措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檢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錯誤的必要前提之一。我党历史上曾經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軍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驕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記了国民党將要襲击我們。結果犯了陈独秀路綫的錯誤，使这次革命归于失敗。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紅軍利用蔣馮閻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結果犯了李立三路綫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轟轟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結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綫錯誤，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統一战綫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綫有某些相似的錯誤。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驕傲，几次錯誤，都要引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为鑒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驕傲的錯誤。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51—952頁。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錯誤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覺悟程

度，違反了群眾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了解了的東西，廣大群眾也和自己一樣都了解了。群眾是否已經了解並且是否願意行動起來，要到群眾中去考察才會知道。如果我們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後於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還不了解的東西，群眾也一概不了解。許多時候，廣大群眾跑到我們的前頭去了，迫切地需要前進一步了，我們的同志不能做廣大群眾的領導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後分子的意見，並且將這種落後分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群眾的意見，做了落後分子的尾巴。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6—1097頁。

事情很明顯，在十月革命以後，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如果忽視或者不認真研究俄國革命的經驗，不認真研究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並且按照本國的具体條件，有分析地、創造性地利用這些經驗，那末，他就不能通曉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新階段的列寧主義，就不能正確地解決本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問題。那末，他就會或者陷入教條主義的錯誤，或者陷入修正主義的錯誤。我們需要同時反對這兩種錯誤傾向，而在目前，反對修正主義的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務。

毛澤東：“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6日），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頁。

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挂着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

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复資本主义制度，他們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階級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0頁。

附 录

如同我們經常在估計国际国内階級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經常估計这种形势。但我們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們是注定要灭亡的，他們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規律，他們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們的估計总是錯誤的。他們的階級本能引导他們老是在想：他們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們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們的力量。我們亲眼看到了許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軍閥，日本軍国主义，莫索里尼，希特勒，蔣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們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錯誤。現在的一切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錯誤的。难道这不好笑嗎？照胡风分子說来，共产党領導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嗚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甚么东西而要“茁壯地生長起来”。如果說，法国資產階級的国民議會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話，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剝削階級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蔣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認他們的失敗的。这是因为他們不但需要欺騙別人，也需要欺騙他們自己，不然他們就不能过日子。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人民日报”編者按語(1955年6月10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122頁。

階級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

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
“人民日报”社论）。

6. 主客观的统一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发展过程，只有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在实践中使主观认识跟着客观过程推移转变，在实践中不断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订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2—283页。

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

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同上，第283页。

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同上，第284页。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45页。

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

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3頁。

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因為才進行七年，還需要積累經驗。對於革命我們開始也沒有經驗，翻過筋斗，取得了經驗，然後才有全國的勝利。我們要求在取得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比較取得革命經驗的時間要縮短一些，同時不要花費那麼高的代價。代價總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時期所付的代價那麼高。必須懂得，在這個問題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這需要在實踐中去解決。這個矛盾，也將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的任務在於尽可能正確地反映它和解決它。

同上，第37—38頁。

五 實踐和認識

1. 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只有實踐才是人們認識的來源、認識的目的、認識的真理標準。一切否認和忽視實踐作用，把認識和實踐割裂開來的理論都是錯誤的。尊重實踐、尊重群眾就是尊重唯物論、尊重辯證法。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和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

首先，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每個人以社會一員的資格，同其他社會成員協力，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在各種階級的社會中，各階級的社會成員，則又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

人的社會實踐，不僅限於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各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因此，人的認識，在物質生活以外，還從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與物質生活密切聯繫），在各種不同程度

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1—272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同上,第272页。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了“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

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办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大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可是不可能的。

同上，第275--277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

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列寧這樣說過：“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同上，第273頁。

許多自然科學理論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不但在於自然科學家們創立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的科學實踐所証實的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証實的時候。辯證唯物論之所以為普遍真理，在於經過無論什麼人的實踐都不能逃出它的範圍。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並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所謂實踐是真理的標準，所謂“生活、實踐底觀點，應該是認識論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觀點”，理由就在這個地方。

同上，第281—282頁。

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5—656頁。

我們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說明一个两个实际問題，那就要受到称贊，就算有了几分成績。被你說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817頁。

除了对于“理論家”和“知識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和实际联系”，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們天天講“联系”，实际上却是講“隔离”，因为他們并不去联系。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来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則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連声贊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願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問題不講明白，我們党的理論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同上，第821—822頁。

讀書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4頁。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書本知識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們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

使从事理論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問題。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8頁。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須到群众中去，必須長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創作过程。否則你的劳动就沒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里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2—863頁。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論行动，必須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應該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創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們，而只会被我們所压倒。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7頁。

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經驗中將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長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須由上面派出大批經過短期訓練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訓練班，听到教員講了几十条，还不一定会做工作。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頁。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場新的革命。过去我們只有资产階級民主革命的經驗，沒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經驗。但是怎样去取得这种經驗呢？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

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五年计划中就有农业合作化的部分，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显然，所谓现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一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同上，第20頁。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鬩”。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925年12月），

“政治周报”1925年第1期，第2頁。

2. 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認識；認識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現于从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动的飛躍，更重要的还須表現于从理性認識到革命的實踐这一个飛躍，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

指揮員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对于各种偵察材料的联貫起来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將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構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認識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軍事家，不去这样做，把軍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願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魯莽的專凭热情的軍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騙，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

情况的引誘，受自己部下不負責任的無真知灼見的建議的鼓動，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任何軍事計劃，是應該建立于必要的偵察和敵我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周密思索的基礎之上的緣故。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3頁。

原來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繫。例如有些外面的人們到延安來考察，頭一二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加了宴會、晚會和群眾大會，聽到了各種說話，看到了各種文件，這些就是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各個片面以及這些事物的外部聯繫。這叫做認識的感性階段，就是感覺和印象的階段。也就是延安這些各別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團先生們的感官，引起了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腦子中生起了許多的印象，以及這些印象間的大概的外部的聯繫，這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

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于是在人們的腦子里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續，使用判斷和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來。“三國演義”上所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們普通說話所謂“讓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腦子中運用概念以作判斷和推理的工夫。這是認識的第二個階段。外來的考察團先生們在他們集合了各種材料，加上他們“想了一想”之後，他們就能夠作出“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徹底的、誠懇的和真實的”這樣一個判斷了。在他們作出這個判斷之後，如果他們對於團結救國也是真實的話，那末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

纔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們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認識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認識的阶段。

毛泽东：“实践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275頁。

認識的真正任务在于經過感觉而到达于思維，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了解它的規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間的內部联系，即到达于論理的認識。重复地說，論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論理的認識則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質的、內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圍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淺入深的辯証唯物論的关于認識发展过程的理論，在馬克思主义以前，是沒有一個人这样解决过的。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論，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問題，唯物地而且辯証地指出了認識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們的生产和階級斗争的复杂的、經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認識到論理認識的推移的运动。……馬克思列宁主义認為：認識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級阶段，認識表現为感性的，在高級阶段，認識表現为論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統一的認識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們在实践的基础上統一起来了。我們的实践証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現象問題，理論才解决本質問題。

同上，第275頁。

認識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屬於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錯覺)，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論理来。

同上，第279頁。

如果以为理性認識可以不从感性認識得来，他就是一個唯心論者。哲學史上有所謂“唯理論”一派；就是只承認理性的實在性，不承認經驗的實在性，以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覺的經驗是靠不住的，這一派的錯誤在於顛倒了事實。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於它來源於感性，否則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從認識過程的秩序說來，感覺經驗是第一的東西，我們強調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意義，就在於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人的認識開始發生，開始從客觀外界得到感覺經驗。一個閉目塞聽、同客觀外界根本絕緣的人，是無所謂認識的。認識開始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

同上。

認識有待於深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證法。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只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復了歷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我這裡不來說經驗只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它們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了的認識，相反，只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於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庸俗的事務主義家不是這樣，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体，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同上，279—280頁。

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

就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哲學上的“唯理論”和“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歷史性或辯証性，雖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對於唯物的唯理論和經驗論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論和經驗論），但在認識論的全体上則都是錯誤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辯証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對於一個小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認識）是如此，對於一個大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社會或一個革命的認識）也是如此。

同上，第280頁。

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這樣的人往往經驗很多，這是很可寶貴的；但是如果他們就以自己的經驗為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和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業做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20頁。

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為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

同上，第820—821頁。

所謂開動機器，就是說，要善於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雖然沒有包袱，有聯繫群眾的長處，但是不善於思索，不願用腦筋多想苦想，結果仍然做不成事業。再有一些人則因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腦筋，他們的聰明被包袱壓縮了。列寧斯大林經常勸人要善於思索，我們也要這樣勸人。腦筋這個機器的作用，是專門思想的。孟子說：“心之官則思。”他對腦筋的作用下了正確的定義。凡事應該用腦筋好好想一想。俗話說：“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是說

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這種習慣，在我們黨內是太不夠了。如果我們既放下了包袱，又開動了機器，既是輕裝，又會思索，那我們就會勝利。

毛澤東：“學習和時局”（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52頁。

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後。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是又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於實況，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劃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新的情況。部分地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只是一味盲干，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3—174頁。

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着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檢驗理論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理論的東西之是否符合於客觀真理性這個問題，在前面說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認識運動中是沒有完全解決的，也不能完全解決的。要完全地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應用理論於實踐，看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

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1頁。

3. 人类对世界認識的总过程是“实践、認識、再实践、再認識”，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

社会的人們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內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論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們的認識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該客观过程的法則性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于該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預想的目的,即將預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在該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認識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計劃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証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斗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計劃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預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說来,不論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論、計劃、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时候須反复失敗过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預想的結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們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內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認識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們的認識运动是沒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論是屬於自然界的和屬於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

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運動也應跟着推移和發展。依社會運動來說，真正的革命的指導者，不但在於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於改正，如同上面已經說到的，而且在於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

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2—283頁。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証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同上，第285頁。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毛澤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年6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01頁。

4. 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黨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與實踐統一原則的具體運用。

指导一个偉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論，没有历史知識，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1頁。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够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义看来，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說过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馬克思主义看重理論，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义的。

毛泽东：“實踐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0—281頁。

我們讀了許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書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論家呢？不能这样說。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們根据实际創造出来的理論，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結論。我們如果仅仅讀了他們的著作，但是沒有进一步地根据他們的理論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沒有企图在理論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們就不能妄称为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家。

毛泽东：“整頓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6頁。

如果我們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問題熟視无睹，只能記誦馬克思主义書本上的个别的結論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們在理論战綫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誦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論家，他們能够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釋历史中

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問題，能够在中国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种种問題上給予科学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真正領會列寧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學說，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問題，找出它的发展規律，这样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觀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觀实际中得到了証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东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說过，脱离实际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确的，應該拋棄的。对于好談这种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臉皮。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从客觀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觀实际中获得了証明的最正确 最科学 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学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論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同上，第816、819頁。

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們的狀況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讀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有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識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門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識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两个阶段構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发展阶段。学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么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經驗写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識。他們接受这种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須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說来，这种知識对于他們还是片面性的，

这种知識是人家証明了，而在他們則还没有証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將这些知識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經驗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將自己的态度放謙虛一些。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8頁。

我国的革命和建設的胜利，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們党的一貫的思想原則。許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們在加强党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現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們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經提高了一步。但是我們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着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觀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組織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脫离群众、脫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內和党外的团結的，是阻碍我們事业进步、阻碍我們同志进步的。必須用加强党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詞”(1956年9月15日)，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頁。

苏維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針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毛泽东：“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苏維埃中国”，中国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员会1957年翻印版，第285頁。

我們的教育方針，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覺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頁。

毛主席十分高兴地对張国藩校長說：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主席又說：要講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是講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講書本上的道理怎么成？……毛主席笑着說，河南省的長葛县已經有了証明，那里的学校有的搞了勤工儉学，学生学习成績好，升学的很多；有的沒有搞勤工儉学，学生学的不好，升学的少。毛主席还指示，不仅学生要搞勤工儉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屬工厂，不然光講空的，脫离实际。

“毛主席在天津視察的时候提出建立地方独立工业体系”，1958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八月十三日，毛主席在天津大学視察的时候指示說：“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毛主席并指示說：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綫；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結合起来。

“把領袖的关怀变成巨大的力量”，1958年8月19日
“光明日报”。

5. 真理是客觀的，真理是相对的又是絕对的，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真理觀。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們必須坚持真理，修正錯誤。真理总是在同錯誤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們要为真理冲鋒陷陣。

馬克思主义者承認，在絕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絕对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的。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絕对的真理。客觀过程的发展是充滿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認識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滿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

客觀世界的辯証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後地能夠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根據于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于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4頁。

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作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98頁。

馬克思主義也是在鬥爭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在開始的時候受過種種打擊，被認為是毒草。現在它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還在繼續受打擊，還被認為是毒草。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馬克思主義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有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存在。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

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義者仍然是少數。因此，馬克思主義仍然必須在鬥爭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鬥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當着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鬥爭。這種鬥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7頁。

科學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為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表現在黨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里面，却生怕人家駁，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裝樣子吓人；以為這一吓，人家就會閉口，自己就可以“得勝回朝”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

毛澤東：“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
第2版，第836頁。

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吓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至於以裝腔作勢來達到名譽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頭，不待說的了。總之，任何機關做決定，發指示，任何同志寫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這個才能爭取革命勝利，其他都是無益的。

同上，第836—837頁。

共产党人必須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須随时准备修正錯誤，因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6頁。

6.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历史地落在无产階級及其政党的肩上。无产階級不仅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要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条件，改造主观世界必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群众的实践斗争中进行。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历史地落在无产階級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認識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轉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經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們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將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謂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們，他們的被改造，須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毛泽东：“实践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4—285頁。

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

毛泽东：“改造我們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2頁。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会词”（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3页。

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識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識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36页。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經驗。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較，就觉得知識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

个变化,沒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3頁。

对于工农兵群众,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們;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們的感情,不爱他們的姿态,不爱他們的萌芽状态的文艺(牆报、壁画、民歌、民間故事等)。他們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棄它們,而偏爱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的乃至資产階級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方面,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問題他們就还是沒有解决,或者沒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講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軍、新四軍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許多是沒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样長,我們却必須解决它,必須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們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階級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們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階級的文艺。

同上,第858—859頁。

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誰說工人階級不要改造?当然,剝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質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談。工人階級要在階級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階級必須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們这些人來說,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說,每

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馬克思主义的思想，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書本上学了一点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長期階級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繼續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則就要落后了。难道資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嗎？

有人說，中国資產階級現在已經沒有兩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資產階級分子已經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員，正处在由剝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轉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們現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說，他們的剝削根子还没有脫离。他們同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說已經沒有了兩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資產階級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繼續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認為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了兩面性，那末資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沒有了。

應該說，这种意見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願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願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須是在工作中間，他們应当在企业內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經過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願为基础。許多工商业者在講習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語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們从亲身的經驗懂得，繼續学习，繼續改造自己，对于他們是有益的。剛才所說的那种認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見，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見，只是少数人的意見。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21頁。

广大的知識分子虽然已經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滿。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树立无产階級的、共

产主义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變是一个根本的轉變，現在多数知識分子还不能說已經完成了这个轉變。我們希望我国的知識分子繼續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觀，逐步地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經起了变化，資产階級思想的經濟基础已經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觀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長的时间，我們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終不願意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不願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們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們就应当給他們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頁。

对于反动階級和反动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坏，不搗乱，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們如果不願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們劳动。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对俘虏軍官們已經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說是“施仁政”罢，但这是我們对于原来是敌对階級的人們所强迫施行的，和我們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論。

这种对于反动階級的改造工作，只有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产階級即壟断資产階級，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個民族資产階級，在現阶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們进行許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人企业國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對他們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資产階級造反。

毛澤东：“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12頁。

过去的剝削階級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們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願意帶着花岡岩头腦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識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上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時間；这些东西崩潰之势已成，則是确定无疑的了。

毛泽东：“介紹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
“紅旗”1958年第1期，第3頁。

六 对立統一規律

(一) 兩種宇宙觀

1. 在人类的認識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見解，一种是辯証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兩種宇宙觀。所謂形而上学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与此相反，辯証法的宇宙觀教导人們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運動，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在人类的認識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見解，一种是辯証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兩種宇宙觀。列宁說：“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兩種基本的(或兩種可能的？或兩種在历史上常見的？)观点是：(一)認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認為发展是对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为兩個互相排斥的对立，而兩個对立又互相关联着)。”列宁說的就是這兩種不同的宇宙觀。

毛澤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8頁。

所謂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說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減和場所的变更。而这种增減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內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認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們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

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

同上，第289頁。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同上，第289—291頁。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

类認識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辯証法的合理的一部分，創造了辯証唯物論和历史唯物論这个偉大的理論，才在人类認識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經過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偉大的理論。这个理論一經傳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辯証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們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運動，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則，对于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同上，第291—292頁。

附 录

胡风又說：“文艺問題也实在以机械論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論”是辯証唯物論的反話，“最省力”是他的瞎說。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檢查的。唯物論和辯証法則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檢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論和形而上学方面去。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人民日报”編者按語(1955年5月24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頁。

2. 事物的矛盾規律，即对立統一的規律，是唯物辯証法的最根本的規律。

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对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証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列宁說：“就本来的意义講，辯証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則为辯証法的本質，又称之为辯証法的核心。因此，我們在研究这个法則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学問題。如果我們將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証法。这些問題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7頁。

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对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認識史是一个大革命。

同上，第324頁。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認為，对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这个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說来，对立的統一是有条件的、暫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則是絕对的。这个規律，列宁講得很清楚。这个規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許多人說来，承認这个規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規律去观察問題和处理問題又是一回事。許多人不敢公开承認我国人民內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們的社会向前发展。許多人不承認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会矛盾面前縮手縮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 and 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內部的統一和团結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釋，引导人們認識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10頁。

(二) 矛盾的普遍性

1.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貫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終，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对性。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說，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終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說：“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列宁对于对立統一法則所下的定义，說它就是“承認(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兩者也在內)的一切現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这些意見是对的嗎？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沒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矛盾是簡單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

.....不論是簡單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論是客觀現象，或思想現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經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終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見解，他們認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現，須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現。那末，在那一時間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論和机械論去了。拿这种見解去分析具体的問題，他們就看見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間只有差異，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見。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們就認為在革命前，工农資產階級合組的第三等級中，也只有差異，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見解是反馬克思主义的。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着矛盾，差異就是矛盾。劳資之間，从兩階級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間，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異，它們的差異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階級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資間的矛盾；它們在社会主义建

設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問題，不是矛盾的有无的問題。矛盾是普遍的、絕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貫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終。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对立成份讓位于新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对立成份，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結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3—295頁。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對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們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帶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單純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則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間，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們的思想，并推使它們发生运动。

同上，第315—316頁。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貫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終，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对性……

同上，第296頁。

按照辯証唯物論的觀點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維的过程中，矛盾貫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終，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对性。

同上，第324頁。

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滿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認識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滿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辯証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認識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認識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

毛泽东：“實踐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4頁。

我們的國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迅速地改變了舊中國的面貌。祖國的更加美好的將來，正擺在我們的面前。人民所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國的六億人民正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地進行着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但是，這並不是說在我們的社會里已經沒有任何的矛盾了。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頁。

附 錄

一種矛盾克服了，又會產生新矛盾，又是這樣去競賽。這樣，社會就會不斷地前進。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暫時歸于一律了；但不久又會產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須要克服。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材料”中“人民日報”編者按語（1955年5月24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頁。

2. 矛盾分析方法是研究任何事物發展過程所必須應用的方法。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並推斷革命的將來。

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的創造者和繼承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發現了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已經把唯物辯證法應用在人類歷史的分析和自然歷史的分析的許多方面，應用在社會的變革和自然的變革（例如在蘇聯）的許多方面，獲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經被很多人所承認……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2頁。

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終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須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貫徹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

中国共产党人必須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現狀，并推断革命的將來。

同上，第295—296頁。

什么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沒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总得贊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来。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对于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么，这就是发现問題的过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发现問題，提出問題，但是还不能解决問題。要解决問題，还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講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經過这种系統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問題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問題。

毛澤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840頁。

許多人不敢公开承認我国人民內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們的社会向前发展。許多人不承認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会矛盾面前縮手縮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 and 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內部的統一和团結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釋，引导人們認識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

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页。

我們要求在取得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比較取得革命經驗的時間要縮短一些，同時不要花費那麼高的代價。……必須懂得，在這個問題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這需要在實踐中去解決。……一切矛盾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的任務在於儘可能正確地反映它和解決它。

同上，第37—38頁。

（三）矛盾的特別性

1. 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其特點，這是矛盾的特別性和相對性。這些特點是事實上存在的，不是虛造騙人的。

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的矛盾，都帶特別性。……任何運動形式，其內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這種特殊的矛盾，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這就是世界上諸種事物所以有千差萬別的內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據。自然界存在着許多的運動形式，機械運動、發聲、發光、發熱、電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這些物質的運動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質上互相區別的。每一物質的運動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質，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規定。這種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會現象和思想現象中也是同樣地存在着。每一種社會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6—297頁。

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

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內，都是不同質的。我們的研究工作必須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須从这一点开始。

同上，第298—299頁。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結上的特殊性，就是說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質，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則暴露过程的本質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們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同上，第299頁。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結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們必須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同上，第302頁。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須在其联結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須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同上，第303頁。

这样看来，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規定了和規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战略战术，規定了和規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將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虛造騙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殘缺不全的片段；是貫彻于双方一切大小問題和一切作战

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毛泽东：“論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39—440頁。

2. 馬克思主义的最本質的东西，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

人的認識物質，就是認識物質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質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沒有，而物質的运动則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質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說，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質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6—297頁。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学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領域。

同上，第297頁。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須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則。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則，他們不了解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

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

同上，第299頁。

一個大的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着許多的矛盾。……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兩方面，又各各有其特點，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們從事中國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個矛盾的總體上，即矛盾的相互聯結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從矛盾的各個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總體。所謂了解矛盾的各個方面，就是了解它們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種具體形式和對方發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關係，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後，又各用何種具體的方法和對方作鬥爭。研究這些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就是說的這個意思。我們的教條主義者違背列寧的指示，從來不用腦筋具體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說來，總是空洞無物的八股調，在我們黨內造成了一種極壞的作風。

同上，第299—300頁。

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採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並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

同上，第302頁。

例如國共兩黨。國民黨方面，在第一次統一戰綫時期，因為它實行了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氣的，它是各階級的民主革命的聯盟。一九二七年以後，國民黨變到了與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反動集團。一九三

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同上，第303—305页。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同上，第305页。

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

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从時間的条件說，战争和战争指导規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規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質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規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規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們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規律，應該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問題上的机械論。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6頁。

对于任何問題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會議时期中央的領導路綫問題，应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領導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对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斗争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問題上，当时的錯誤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沒收地主土地分給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則是和我們一致的。列宁說，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本質的东西、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腦，对于复杂事物，不願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我們報紙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應該改善这种狀況。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42—943頁。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权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权的区域長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沒有的事。这种奇事的

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①，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

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属于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方许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占领；那里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组织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广泛统一战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已开始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治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美、英、法、荷各帝国主义企图继续原来的殖民地统治，但各殖民地人民已在抗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种相当有力的武装力量，他们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而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除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或被推翻或被削弱，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阵线在中国被突破，因而使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已在世界上发生很大的动摇。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八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问题上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是沒有找出这种紅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釋的緣故。我們只須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繼續不断的，則紅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紅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經過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貴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兩年資产階級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經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組織，有过工农階級对地主豪紳階級和資产階級的許多經濟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贛边界、湖北的黃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紅軍，也是由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軍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軍隊，例如閻錫山、張作霖的軍隊，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紅軍的成份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長期地存在，則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則小塊紅色区域的長期存在，不但沒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許多力量中間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繼續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較長期的停頓，則小塊紅色区域的長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現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紳階級和国际資产階級的繼續的分裂和战争，而繼續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塊紅色区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义，而且这些紅色区域將繼續发展，日漸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質的赤卫队而沒有正式的紅軍，則只能对付挨戶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軍隊。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沒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裝，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長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裝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須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紅色政权的長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須有一个要紧的

条件,就是共产党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

毛泽东：“中国的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版，第50—52頁。

3. 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是每一个事物內部所包含的兩個方面。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証法，就一定会陷入教条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錯誤。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无产階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貫主張。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場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变为普遍性。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版，第306頁。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結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們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結，发现一事物內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兩方面及其互相联結，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許多事物的互相联結。

同上，第306頁。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貫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終，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認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絕對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

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同上，第307—308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們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們不要帶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須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們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們必須以教条主义的失敗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沒有第二种研究法。

同上，第307頁。

就人类認識运动的秩序說来，总是由認識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总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当着人們已經認識了这种共同的本質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認識为指导，繼續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認識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認識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認識不断地深化。我們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后，还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們的教条主义者是懶汉，他們拒絕對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

凭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同上，第298頁。

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度里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

革命戰爭——革命的階級戰爭和革命的民族戰爭，在一般戰爭的情形和性質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質。因此，在一般的戰爭規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不懂得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質，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規律，就不能指導革命戰爭，就不能在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中國革命戰爭——不論是國內戰爭或民族戰爭，是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內進行的，比較一般的戰爭，一般的革命戰爭，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質。因此，在一般戰爭和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如果不懂得這些，就不能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所以，我們應該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也應該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最後，我們還應該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3—165頁。

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之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523頁。

中國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現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那末，这个历史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一百年来就有了的，还是后来才发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知道这个历史特点，并不是从鴉片战争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后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

……………

在这以前，中国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是屬於旧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疇之內的，是屬於旧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疇，而在革命的陣綫上說來，則屬於世界无產階級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許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階級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階級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現在則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偉大的同盟軍。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階級为首領的中国各个革命階級联合專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9—660、664—665頁。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階級实践斗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階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們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違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脫离具体的实践,經驗主义把局部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違背馬克思主义的。我們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錯誤思想,使得我們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5頁。

同志們知道,我党規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綫和总政策,又規定了各項具体的工作路綫和各項具体的政策。但是,許多同志往往記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別的工作路綫和政策,忘記了我党的总路綫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記了我党的总路綫和总政策,我們就將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們执行具体工作路綫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发生左右搖摆,就会遺誤我們的工作。

毛泽东:“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解放社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91頁。

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頁。

世界各国人民从苏联人民所获得的成就中，一天比一天明显地看到自己的將來。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說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計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論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我們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經驗。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許多錯誤，可以比較順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視或者不認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經驗，不認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專政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創造性地利用这些經驗，那末，他就不能通曉作为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設的問題。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錯誤，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錯誤。我們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錯誤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6日），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頁。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1.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規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規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殘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壟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間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規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間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間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則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統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結成

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8—310页。

（一）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一九二七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的局面。

（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的

形势，使这些矛盾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甲、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乙、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丙、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共产党发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党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十二月决议，一九三六年五月放弃“反蒋”口号，八月致国民党书，九月民主共和国决议，十二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等步骤之所由来。

丁、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政策和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状况而来的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内战，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赞助这种割据和内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若干其他帝国主

义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暂时地贊助中国的統一与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則以极大的努力反对內战与分裂，爭取和平与統一。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間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們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間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調整国内国际在現时可能和必須調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統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談判种种方針之所由来。

(四)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开始的中國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會时，告一段落。此阶段內的重大事变，是学生界、文化界、輿論界的救亡运动，紅軍的进入西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政策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上海和青島的反日罢工，英国对日政策之趋向比較强硬，兩广事变，綏远战争和綏远运动，南京在中日談判中的比較强硬的态度，西安事变，最后是南京国民党的三中全會。这些事变，統統都是圍繞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圍繞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这个历史要求的。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爭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內提出了“停止內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现了，这就构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实际組成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毛澤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
“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43—246頁。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矛盾，反动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銳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偉大的近代和現

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5—626页。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指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国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国内的主要矛盾则将由中国人民同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让位给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转摘自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1959年9月14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

2. 无论什么矛盾，总有主要的和次要的两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事物的性质总是随着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转化而变化。

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

一事物轉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着起變化。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版，第310—311頁。

有人覺得有些矛盾並不是這樣。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並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着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着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當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築阻礙着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於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

同上，第313—314頁。

3. 在各种矛盾的复杂过程中，全力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是革命政党正确地迅速地解决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0页。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同上，第314—315页。

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

現在所不應有的，為將來的環境所許可而現在的环境不許可的那些經濟建設工作，只是一種瞎想。當前的工作是戰爭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這些工作每件都是為着戰爭，而不是離開戰爭的和平事業。如果同志們中間有離開戰爭進行經濟建設的想法，那就應立刻改正。

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933年8月20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17頁。

任何一級的首長，應當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對於他所指揮的全局說來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而不應當放在其他的問題或動作上。

說重要，說有決定意義，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況去規定，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去規定。作戰時選擇突擊方向和突擊點，要按照當前的敵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況去規定。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9—170頁。

前一階段一切直接間接的抗日行動（從“一二九”起到國民黨三中全會止）都圍繞着爭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階段的中心一環，是抗日運動在前一階段中的最本質的東西。

對於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為條件一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條件。

新階段中，我們希望有、也將會有一些直接的間接的反日鬥爭，這些將推動對日抗戰，也大有助於民主運動。然而歷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

毛澤東：“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1937年5月7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64—265頁。

(一)在中國兩大矛盾中間，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依然處在從屬的地位。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着決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繼續尖銳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全部地叛變投降，也決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勢，

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計为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計为四一二事变和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証明了这种估計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錯誤,在于忘記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

(五)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錯誤的估計,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这些同志在皖南事变后,从共“四一二”和馬日变变的估計出发,似乎感觉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的原則指示,已不适用,或不大适用了。他們認為現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張抗日和民主的人們的政权,而只是所謂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統一战綫的政策,而是像过去十年內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党的正确的政策,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暂时地模糊起来了。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81—784頁。

我們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一种地区以深耕为主,另一种地区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時間上也要有分別:在有荒可开时,以獎勵开荒为主;在荒地开尽时,就要轉为以獎勵深耕为主了。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間要有分別,就是在一县、一区、有时甚至在一乡之內,也要有这种分別。

毛泽东:“經濟問題与財政問題”(1942年12月),
“毛泽东选集”,东北書店1948年版,第757頁。

在目前陝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講革命,除了經濟与教育(理論教育,政治教育,軍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內)兩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謂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錯,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許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說来,就大多数同志說来,确确实实地就是

經濟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圍繞着這兩項工作而有其意义。我們如果認真地做好了這兩項工作，我們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們也就算很好地協助了大后方的人民。

同上，第852頁。

在任何一个地区內，不能同时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輔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負責人，必須考虑到該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將各項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計劃，只按上級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亂无秩序的状态。上級机关也不要不分輕重緩急地沒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級机关做很多項工作，以致引起下級在工作步驟上的凌亂，而得不到确定的結果。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統籌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貫徹下去，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这是一种領導艺术。

毛泽东：“关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年6月1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08頁。

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党进行偉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5頁。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兩年先后开始的帶普遍性的整風运动和生產运动，曾經分別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質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們，我們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鏈条，而我們的斗争也就不能繼續前进。

毛泽东：“論軍隊生产自給，兼論整風和生产兩大运动的重要性”
（1945年4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
第1108頁。

一个粮食，一个鋼鐵，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毛主席在天津”，1958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鉴于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对工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还鉴于农

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經有了比較穩固的基础和比較成熟的經驗，我們的領導工作的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轉移到工业建設方面来。中央和省一級的領導机关，必須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从現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在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必須首先抓紧鋼鐵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8日)，
195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附 录

以反浪費反保守为綱，帶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終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設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經過前两个阶段的大爭大辯，群众的覺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偉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費反保守。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結成丰滿的經濟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发展。

“反浪費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195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社論)。

(五) 矛盾的統一性和斗争性

1. 矛盾双方互为前提，共处于一个統一体中；矛盾双方依一定的条件相互轉化，这就是矛盾的同—性。統一性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暫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們的反面轉化着。

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联結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个意思，說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統一体中；

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轉化。这些就是所謂同一性。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5頁。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沒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試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們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嗎？沒有生，死就不見；沒有死，生也不見。沒有上，無所謂下；沒有下，也無所謂上。沒有禍，無所謂福；沒有福，也無所謂禍。沒有順利，無所謂困難；沒有困難，也無所謂順利。沒有地主，就沒有佃农；沒有佃农，也就沒有地主。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无产階級；沒有无产階級，也就沒有資產階級。沒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沒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沒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沒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份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这种性質，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結。列宁所謂辯証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說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單說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間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統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嗎？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轉化。这就是說，事物內部矛盾着的兩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轉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們看，被統治的无产階級經過革命轉化为統治者，原来是統治者的資產階級却轉化为被統治者，轉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經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將要这样做。試問其間沒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

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誘（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轉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統一战綫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着贊成抗日。矛盾着的東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間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們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經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轉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經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轉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間，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轉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經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間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轉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專政或人民的專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專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軍，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許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轉化的。战争轉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轉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內战現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轉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轉化为战争，現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轉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統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轉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謂“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同上，第316—318頁。

人們經過失敗之后，也就从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变失敗为胜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暫長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實踐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頁。

何以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牺牲呢？每一战争都須支付代价，有时是极大的代价，豈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正确点說，是相反相成的。因为这种牺牲，不但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必要，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一部分的暫时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問題”（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97—398頁。

敌人退却时往往將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經道路上的村庄放火烧毀，目的在給予游击战争根据地以破坏，但同时就使得敌人第二次进攻时沒有房子住和沒有飯吃，害了他們自己。这就是所謂在一件事情上面包含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义的具体例証之一。

同上，第421頁。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謂“剝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繼續。轟炸机、机关槍、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鋼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結合为一体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廢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則自己將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輔助进攻或准备轉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屬於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繼續；而追击，則是进攻的繼續。……

怎样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牺牲呢？豈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

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71—472页。

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页。

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而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

……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

……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轉化，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8—320頁。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結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轉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轉化。世界上最願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則全无所所有，一則有也不多。現在美国操縱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暫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將变为富国，无权將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頁。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許有統一战綫的組織形式。刘少奇同志說的很对，如果所謂“一切經過”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謂“經過統一战綫”。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經許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綱領”)，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經過”。或者估計国民党可能許可的，先斬后奏。例如設置行政專員，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經過”則行不通。听說法国共产党曾經提出过这个口号，那天概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綱領，社会党方面不願照做，依然干他們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縛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剝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揮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們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

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11月6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版，第527—528页。

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强调统一，但是他们的所谓“统一”，乃是假统一，不是真统一；乃是不合理的统一，不是合理的统一；乃是形式主义的统一，不是实际的统一。他们高喊统一，却原来是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说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存在，中国就不统一，他们要把全国一切都化为国民党；不但继续他们的一党专政，而且还要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统一呢？……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统一，统一，投降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投降；反共顽固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我们能够信这些道理么？不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统一，算得真统一么？算得合理的统一么？算得实际的统一么？真是做梦！我们今天开大会，就是要提出我们的统一论。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这就是真统一论，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

这就是实际的統一論。那种假統一論，不合理的統一論，形式主义的統一論，乃是亡国的統一論，乃是丧尽天良的統一論。他們要把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統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統一之名，行專制之实，挂了統一这个羊头，卖他們的一党專制的狗肉，死皮賴臉，乱吹一頓，不識人間有羞耻事。我們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破他們的紙老虎；我們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頑固派。

毛泽东：“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頑固派”（1940年2月1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11—719頁。

今之論者不言团结而言統一，其意盖謂惟有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軍新四軍，取消陝甘宁边区，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謂之統一。不知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陝甘宁边区，乃全国主張統一之最力者。主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者，非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与边区乎？发起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主張建立統一民主共和国而身体力行之者，非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与边区乎？立于国防之最前綫抗御敵軍十七个师团，屏障中原、西北，保卫华北、江南，坚决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綱領”者，非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与边区乎？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張君勱、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頑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統一之名，行独霸之实。棄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若夫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与边区，則坚决提倡真統一，反对假統一；提倡合理的統一，反对不合理的統一；提倡实际上的統一，反对形式上的統一。非統一于投降而統一于抗战，非統一于分裂而統一于团结，非統一于倒退而統一于进步。以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之統一乃真統一，乃合理統一，乃实际統一。舍此而求統一；無論出何花样，弄何玄虛，均为南轅北轍，实屬未敢苟同。至于各地方抗日力量，則宜一体爱护，不宜厚此薄彼；信任之，接济之，扶掖之，獎勵之。待人以誠而去其詐，待人以寬而去其隘。誠能如此，則苟非別有用心之徒，未有不团结一致而納于統一国家之軌道者。統一必以团结为基础，团结必以进步为基础；惟进步乃

能團結，惟團結乃能統一，實為不易之定論。此應請採納實行者二。

毛澤東：“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1940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15—716頁。

準備反攻，須選擇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若干條件，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然後進入反攻階段。

依我們的過去情形說來，大概須在退却階段中取得下列諸種條件中至少二種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敵，才好使自己轉入反攻。這些條件是：

- (一)積極援助紅軍的人民；
- (二)有利作戰的陣地；
- (三)紅軍主力的全部集中；
- (四)發現敵人的薄弱部分；
- (五)使敵人疲勞沮喪；
- (六)使敵人發生過失。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01頁。

爭取中間勢力是我們在抗日統一戰綫時期的極嚴重的任務，但是必須在一定條件下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這些條件是：(1)我們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們的利益；(3)我們對頑固派作堅決的鬥爭，並能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沒有這些條件，中間勢力就會動搖起來，或竟變為頑固派向我進攻的同盟軍；因為頑固派也正在極力爭取中間派，以便使我們陷於孤立。在中國，這種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鬥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因此，必須對他們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

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綫中的策略問題”(1940年3月11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42—743頁。

2. 事物內部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具備着同一性，這是客觀存在的，因而就必須用“兩點論”的觀點全面地觀察事物。反對“一點論”，反對片面性。

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階級一方、不了解資产階級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順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將來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績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話，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問題。或者叫做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体，只看見树木，不看見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論軍事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他說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征說过：“兼听則明，偏信則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釘子。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0—301頁。

馬克思主义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蝦蟆坐在井里說：“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們說，紅軍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来是失敗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面)說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面)說来是失敗了。这样說才是恰当的，因为我們完成了長征。

毛泽东：“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44頁。

学习和認識的对象，包括敌我兩方面，这兩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們的头腦(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們都是不能解决

战争規律的学习和使用的問題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5頁。

失敗正是成功之母，从失敗經驗中取得了教訓，即是將來胜利的基綫。悲觀主义只看見抗战中的失敗，不看見抗战中的成績，尤其不看見失敗中已經包含了胜利的因綫，而敌人則在胜利中包含了失敗的因綫。我們应当向人民群眾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們明白失敗和困难的暫時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屬於我們。

毛泽东：“和英国記者貝特蘭的談話”(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72頁。

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們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們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綫來說，敌人是外綫作战，我們是內綫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則适得其反。敌軍虽强(武器和人員的某些素質，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軍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員的某些素質，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異民族侵入我国，我們是在本国反抗異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針：能够而且必須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內綫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綫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應該采取的战略方針。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問題”(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99頁。

完全不錯，抗日战争英勇奋斗了一年多，全国有了偉大的团結与偉大的进步，給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虽然失地很多，但同时就有了很多胜利，这是无可否認的事实。战争发展下去，主要的由于中国繼續进步，同时配合着日本增加困难，国际助我增强，最后胜利定屬於我，不屬於敌，这也是可以預断的。誰要是看不見过去的偉大成績与未来的胜利前途，誰就要陷入悲觀主义的深坑而不能自拔。然而單看到这一方面，是不够的，抗日战争还有另一方面，还有它的

消极方面，这就是我們面前摆着的許多困难。目前的情况告訴我們，一年多以来中国所有的奋斗，团结，进步，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还没有反攻敌人的力量。武汉現正处于敌人的威胁中，敌人还要向广州，長沙及西北等地进攻。

毛泽东：“論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
华北新华書店1948年版，第5—6頁。

我們要根据十五个月經驗中已經証明了的东西，向全党全国明确地指出我們国家与我們战争的長处与短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并指出長处与有利条件在全战争中占居着优势，号召全国努力奋斗，发揮自己的長处，增强自己有利条件，克服自己的短处与不利条件，为爭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同上，第15頁。

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規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規的村学、讀报組和識字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話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許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問題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訓練医生，不联合边区現有的二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們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战綫”（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选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09—1010頁。

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个五年計劃的时期內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問題，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規

模的經營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規模的經營……我們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長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絕大的困难，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頁。

如像我在上面講过的，在我們的社會中，群众鬧事是坏事，是我們所不贊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說来，坏事也可以轉变成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們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們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間处理得正确，結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轉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現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訓。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風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鍛煉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階級，这就变成好事。在許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風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黨員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願意繼續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黨員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們必須学会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說过：“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敗。但是在中国的失敗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敗。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証明了嗎？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頁。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

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
“红旗”1958年第1期，第3页。

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

毛泽东主席又说，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毛主席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样。

毛泽东主席在谈到国内形势的时候指出：经过了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全国到处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气象。无论在农业、工业、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建设事业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由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毛主席说，鉴于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对工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还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的领导工作的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在工业方面。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8日），
195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

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一九五九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組織起来……

毛主席巡視大江南北回京后对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談話，
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附 录

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們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們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
“人民日报”社論）。

3. 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沒有斗争就沒有发展。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終，一切过程都轉化为它們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有一种过程轉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則是绝对的。

無論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沒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統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見的統一、团结、联合、調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統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調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質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轉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則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經過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說，对立的統一是有条件的、暫

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前面我們曾經說，兩個相反的东西中間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統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轉化，这是說的条件性，即是說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統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轉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轉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構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說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們又說，矛盾的斗争貫串于过程的始終，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轉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說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20—321頁。

中国內部各派軍閥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軍閥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暫时的。今天的暫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毛泽东：“中国的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9頁。

历史告訴我們，正确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綫，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們，正确路綫的建設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9頁。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說来，对立的統一是有条件的、暫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則是绝对的。这个規律，列宁講得很清楚。这个規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漸多起来了。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頁。

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鬥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

同上，第12—13頁。

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鬥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當着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鬥爭。這種鬥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

同上，第27頁。

同錯誤思想作鬥爭，好比種牛痘，經過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強免疫力。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東西，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並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

同上，第28頁。

4. 對立面的鬥爭是事物發展的动力，因而必須有意識地樹立對立面，促進事物的发展。

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領導者必須善於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幹，並凭借這批骨幹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凡屬真正團結一致、聯繫群眾的領導骨幹，必須是從群眾鬥爭中逐漸形成，而不

是脫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00页。

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应当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毛泽东：“‘勤俭办社’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页。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做这种工作，出现了很多善于做宣传的农村工作同志。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

毛泽东：“‘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6页。

重要的是做出榜样给农民看。当着农民看见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比办小型社和低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并社和升级了。

毛泽东：“‘瓊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6页。

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

进行适当的批評。毫無疑問，我們应当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着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9頁。

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什麼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羣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

同上，第32頁。

附 录

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及一切黨報，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魍魎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歼滅這些丑類。……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歼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于鋤掉。農民不是每年要鋤幾次草嗎？草鋤過來還可作肥料。階級敵人是一定要尋找機會表現他們自己的。他們對於亡國、共產是不甘心的。不管共產黨怎樣事先警告，把根本戰略方針公開告訴自己的敵人，敵人還要進攻的。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勢利導，奪取勝利。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1957年7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

5. 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鬥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這是我黨統一戰綫政策的理論基礎。誰不認識這一真理，誰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鬥爭性相結合，構成

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我們中国人常說：“相反相成。”就是說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這句話是辯証法的，是違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說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說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結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沒有斗争性就沒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話來說，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21頁。

为了坚持抗战和爭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須坚持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路綫，必須扩大和巩固統一战綫。任何破裂国共兩党的統一战綫的主張是不許可的。“左”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統一战綫工作中必須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則。我們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統一战綫，是在实行一定綱領这个基础上面的統一战綫。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沒有任何的統一战綫，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則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現了。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84頁。

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將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在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統一战綫問題上，在党的組織問題上和民众的組織問題上，則須繼續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傾向，以便实现和各抗日党派的合作，发展共产党和发展民众运动；但是在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傾机会主义的傾向也要注意反对，否則也就会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則的发展了。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0頁。

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

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98—599页。

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阵营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一方面是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34页。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40页。

（五）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因为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

視同他們合作的政策，認為他們已經是事實上的投降派，已經就要舉行反共戰爭了，這種意見是錯誤的。但又因為他們在全國普遍地執行摧殘進步勢力的反動政策，不實行革命三民主義這個共同綱領，還堅決反對我們實行這個綱領，堅決反對我們超越他們所許可的範圍，即只讓我們同他們一樣實行消極抗戰，並且企圖同化我們，否則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壓迫，所以我們又必須採取反抗他們這種反動政策的鬥爭策略，同他們作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堅決鬥爭。這就是我們對付頑固派兩面政策的革命的兩面政策，這就是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如果我們能夠在思想上提出正確的革命理論，對於他們的反革命理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在政治上採取適合時宜的策略步驟，對於他們的反共反進步政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採取適當的軍事步驟，對於他們的軍事進攻給以堅決的打擊；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們實施反動政策的範圍，就有可能逼迫他們承認進步勢力的地位，就有可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而使他們陷於孤立。同時，也就有可能爭取還願抗日的頑固派，延長其留在抗日統一戰綫中的時間，就有可能避免如同過去那樣的大內戰。所以，在抗日統一戰綫時期中，同頑固派的鬥爭，不但是為了防禦他們的進攻，以便保護進步勢力不受損失，並使進步勢力繼續發展；同時，還為了延長他們抗日的時間，並保持我們同他們的合作，避免大內戰的發生。如果沒有鬥爭，進步勢力就會被頑固勢力消滅，統一戰綫就不能存在，頑固派對敵投降就會沒有阻力，內戰也就會發生了。所以，同頑固派鬥爭，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爭取時局好轉、避免大規模內戰的不可缺少的手段，這一真理，已被一切經驗證明了。

但在抗日統一戰綫時期，同頑固派鬥爭，必須注意下列幾項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說，決不可無故進攻人家，也決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鬥爭的防禦性。對於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必須堅決、徹底、干淨、全部地消滅之。第二是勝利原則。不鬥則已，鬥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應懂得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決不

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應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鬥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使這一鬥爭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個時期中，雙方實行休戰。這時，我們應該主動地又同頑固派講團結，在對方同意之下，和他們訂立和平協定。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鬥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這就是每一鬥爭的暫時性。在他們舉行新的進攻之時，我們才又用新的鬥爭對待之。這三個原則，換一句話來講，就是“有理”，“有利”，“有節”。堅持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就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派，并使頑固派爾後不敢輕易向我們進攻，不敢輕易同敵人妥協，不敢輕易舉行大內戰。這樣，就有爭取時局走向好轉的可能。

(六) 國民黨是一個由複雜成份組成的黨，其中有頑固派，也有中間派，也有進步派，整個國民黨並不就等于頑固派。因為國民黨中央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等反革命磨擦法令，並實行動員他們一切力量進行普遍全國的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反革命磨擦，有些人就以為整個國民黨都是頑固派，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現在的國民黨中，頑固派還站在支配共黨的政策中的地位，但在數量上只占少數，它的大多數黨員（很多是掛名黨員）並不一定是頑固派。這一點必須認識清楚，才能利用他們的矛盾，採取分別對待的政策，用極大力量去團結國民黨中的中間派和進步派。

— 同上，第743—745頁。

在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堅決地執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並以此為投降日本的準備的時候，我們應強調鬥爭，不應強調統一，否則就會是絕大的錯誤。因此，對於一切反共頑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傳、批評，不論是理論上的、政治上的、軍事上的，原則上均應堅決地反抗之，均應採取堅決鬥爭的態度。這種鬥爭，應從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出發，也就是自衛的原則、勝利的原則和休戰的原則，也就是目前每一具體鬥爭的防禦性、局部性和暫時性。對於反

甚頑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傳、批評，我們應提出針鋒相對的辦法和他們作堅決的鬥爭。例如，他們要四、五支隊南下，我們則以無論如何不能南下的態度對付之；他們要叶、張兩部南下，我們則以請准征調一部北上對付之；他們說我們破壞兵後，我們就請他們擴大新四軍的募兵區域；他們說我們的宣傳錯誤，我們就請他們取消一切反共宣傳，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們要向我們舉行軍事進攻，我們就實行軍事反攻以打破之。實行這樣的針鋒相對的政策，我們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黨中央應該提出，我軍的任何部分均應該提出。例如，張云逸對李品仙，李先念對李宗仁，均是下級向上級提出強硬的抗議，就是好例。只有向頑固派採取這種強硬態度和在鬥爭時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才能使頑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壓迫我們，才能縮小頑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範圍，才能強迫頑固派承認我們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頑固派不敢輕易分裂。所以，鬥爭是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巩固國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黨我軍內部，只有堅持對頑固派的鬥爭，才能振奮精神，發揚勇氣，團結幹部，擴大力量，巩固軍隊和巩固黨。在對中間派的关系上，只有堅持對頑固派的鬥爭，才能爭取動搖的中間派，支持同情的中間派，否則都是不可能的。在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的問題上，也只有採取鬥爭的方針，才能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則，就將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

毛澤東：“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
(1940年5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52年第2版，第750—751頁。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勢下，我們的政策有決定的意義。但是我們的幹部，還有許多人不明白黨在目前時期的政策應當和土地革命時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區別。必須明白，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是決不會變更的；過去十年土地革命時期的許多政策，現在不應當再簡單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後期，由於不認識中國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

命和革命的長期性這兩個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許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圍剿”和反对第五次“圍剿”的斗争是所謂革命和反革命兩条道路的决战，在經濟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稅收政策)和富农(分坏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識分子，肃反中的“左”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員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軍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認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組織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錯誤的。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現其为“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認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則是一切斗争，否認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兩個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証。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損失。

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認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認联合，而是綜合联合和斗争兩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說，就是：

(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或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战綫。

(二)統一战綫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須統一，又須独立。

(三)在軍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統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四)在和反共頑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五)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統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統一战綫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蔭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組織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間势力，孤立反共頑固势力。

(七)对于反共頑固派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即对其尙能抗日的方

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頑固派又有兩面性，我們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搖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結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頑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兩面性，因此我們的政策也有兩面性，即在他們尚不願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們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軍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將这种兩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

（八）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間也有兩面分子，我們也应以革命的兩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搖的方面，是加以拉攏和爭取的政策。將这种兩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区别。

（九）既須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張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須对于主張抗日但又动搖、主張团结但又反共的兩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兩面性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紳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們的政策。上述各項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十）对待帝国主义亦然。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須將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現時沒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須將同日本結成同盟承認“滿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須將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棄这个政策改为贊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們的策略原則，仍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們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謂“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們則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

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棄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們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們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們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在日本占领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認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縛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但是，自一九三九年冬季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和我們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纠正，但是还没有完全纠正，还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对于各项具体政策的研究和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論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59—763頁。

在反对国民党頑固派的斗争中，將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沒有或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將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紳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間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論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屢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

高潮再一次地証實了它的正確性。我們在皖南事變前所取“佳電”的立場，對於事變後我們轉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爭取中間派。因為如果不經過反復多次的經驗，中間派對於我黨為什麼必須向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堅決的鬥爭，為什麼只能以鬥爭求團結，放棄鬥爭則沒有任何的團結，就不能了解。地方實力派的領導成份雖然也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但是因為他們和統制中央政權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須以中間派看待之。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閻錫山，這一次就站在中間立場；而上次居于中間立場的桂系，這一次雖然轉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蔣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視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實力派更不待論。我們同志中却有許多人至今還把各派地主階級各派資產階級混為一談，似乎在皖南事變之後整個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叛變了，這是把複雜的中國政治簡單化。如果我們採取了這種看法，將一切地主資產階級都看成和國民黨頑固派一樣，其結果將使我們自陷於孤立。須知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並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

毛澤東：“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1941年5月8日），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83頁。

還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不了解統一戰綫政策和階級政策，從而不了解統一戰綫教育和階級教育的一致性。他們認為在皖南事變後需要特別強調所謂統一戰綫教育以外的階級教育。他們至今還不明白，我黨在整個抗日時期，對於國內各上層中層還在抗日的人們，不管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中間階級，都只有一個完整的包括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兩面性的）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即使是偽軍、漢奸和親日派分子，除對絕對堅決不願悔改者必須採取堅決的打倒政策外，對其餘的分子也是這種兩面性的政策。我黨對黨內對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這兩方面性質的教育，就是教導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如何和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各個不同的階層在各種不同的形式上聯合抗日，又和他

們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同上，第784—785頁。

再說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問題。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問題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8—869頁。

我們主張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們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

自然，这些阶级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間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虛伪的和錯誤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調节。在这种調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項建設。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56—1057頁。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經經過了好几年的酝酿。長期共存的思想已經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長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屬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們沒有理由不对它們采取長期共存的方針。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會議上，就已經这样說过：“只要誰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內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貫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廢，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說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長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長期共存，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产党一方面的願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監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見，作批評。所謂互相監督，当然不是單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監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監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讓民主党派監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們更为有益。当

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間所提的意見，所作的批評，也只有合乎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發揮互相監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們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爭取和共产党一道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2頁。

（六）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1. 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兩类性質完全不同的矛盾，不容混淆。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轉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也可能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問題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問題。我們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22頁。

列宁說：“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就是說，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同上，第324頁。

在我們的面前有兩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类矛盾。

.....

敌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間說来，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来，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對抗性的一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頁。

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23頁。

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間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間的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頁。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广泛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原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們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同上，第8頁。

2.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須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則。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

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9页。

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

同上，第323页。

……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同上，第325页。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讲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

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經繳械了的和投降了的地主階級分子、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幫凶們給以由坏人變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們變成好人。

毛澤東：“評白皮書”(1949年8月11日)，“毛澤東同志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頁。

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并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對人民說來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這種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

毛澤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閉幕詞”(1950年6月23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頁。

我們歷來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決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採用專政和民主這樣兩種不同的方法。這個意思，在我們黨的過去的許多文件里和黨的許多負責人的言論里，曾經說得很多。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頁。

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而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同上，第10頁。

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同上，第33頁。

附 錄

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這是科學的合乎實際情況的說明。這是一小撮人，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學生里都有，共產黨、青年團里面也有，在這次大風浪中表現出來了。他們人數極少，在民主黨派中，特別在某幾個民主黨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輕視。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辦罪呢？現在看來，可以不必。因為人民的國家很鞏固，他們中許多又是一些頭面人物。可以寬大為懷，不予辦罪。一般稱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稱為反動派。只在一種情況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繼續進行破壞活動，觸犯刑律，那就要辦罪。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1957年7月1日

“人民日報”社論)。

(七) 研究矛盾法則的簡單的結論

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矛盾存在於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矛盾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其特點，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條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夠共居於一個統一体中，又能夠互相轉化到相反的方面去，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然而矛盾的鬥爭則是不斷的，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時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都有鬥爭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鬥爭的表現更為顯著，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當着我們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

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824—825页。

七 量变質变規律

1. 任何事物都是質与量的統一体，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須既注意量，又注意質，也就是要善于把握事物的“度”。党的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就是馬克思主义关于質量統一观的具体运用。

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規部队，須具备数量扩大和質量提高两个条件。前者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后者則依靠战争中的鍛煉和提高武器的質量。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問題”(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24頁。

为了使全国农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必須認真地整頓已有的合作社。

必須強調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对不顧質量、專門追求合作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偏向。因此，必須注重整社的工作。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頁。

內战时期的中国紅軍，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黃埔軍校和国民革命軍的民主傳統，曾經扩大到几十万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內的殘酷的摧毀、万里長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軍隊，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們知道八路軍新四軍这时数量虽小，質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

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的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8—1039页。

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只要是长期战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问题，是每个游击队经常发生的问题。具体解决时应依照情况去决定。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军事部署和工作执行随之而不同，必须依情况分时期有所侧重，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17页。

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

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4页。

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40页。

但在抗日統一戰綫時期，同頑固派鬥爭，必須注意下列几項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說，決不可無故進攻人家，也決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鬥爭的防禦性。對於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必須堅決、徹底、干淨、全部地消滅之。第二是勝利原則。不鬥則已，鬥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應懂得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決不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應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鬥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使這一鬥爭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個時期中，雙方實行休戰。這時，我們應該主動地又同頑固派講團結，在對方同意之下，和他們訂立和平協定。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鬥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這就是每一鬥爭的暫時性。在他們舉行新的進攻之時，我們才又用新的鬥爭對待之。這三個原則，換一句話來講，就是“有理”，“有利”，“有節”。堅持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就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派，并使頑固派爾後不敢輕易向我們進攻，不敢輕易同敵人妥協，不敢輕易舉行大內戰。這樣，就有爭取時局走向好轉的可能。

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綫中的策略問題”（1940年3月11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44—745頁。

為了爭取蘇維埃工作的速度與質量，使一切蘇維埃工作適合於革命戰爭的要求，必須用極大的力量除掉蘇維埃工作人員中間的鬆懈不緊張的現象。絕大的提高蘇維埃人員的工作熱忱，使每個工作人員都自覺的為工農民主專政的國家工作而努力。……必須把“一切工作服從戰爭”“爭取工作的速度與質量”的口號，提到全部蘇維埃人員的前面去。……

……

爭取蘇維埃工作的速度與質量，使一切蘇維埃工作，完全適合於

革命战争的要求，这是苏维埃工作的总方向。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本，第299—301页。

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零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1955年12月27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

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同上，第3—4页。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页。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

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們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經濟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着一种不願意和群衆同甘苦，喜欢計較个人名利的危險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們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簡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險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經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經濟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儉建国的方針。

同上，第35—36頁。

任何社会主义的經濟事业，必須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設備，尽可能改善劳动組織、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經濟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

毛泽东：“‘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費用的經驗’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8頁。

这里介紹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領導的所謂“穷棒子社”。勤儉經營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針，不，应当是一切經濟事业的方針。勤儉办工厂，勤儉办商店，勤儉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儉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儉的原則。这就是节约的原則，节约是社会主义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現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儉的原則，但是特別要提倡勤儉，特別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內，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計劃的时期內。現在有許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儉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傳开去，讓大家照着做。应当獎勵那些勤儉的、产量最高的，

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評那些浪費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毛泽东：“‘勤儉办社’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頁。

2. 無論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質变和量变。 事物的发展总是不断地由量变过渡到質变，并通过質变 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

無論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靜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沒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靜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統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見的統一、团結、联合、調和、均势、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統一物的分解，团結、联合、調和、均势、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質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轉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則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經過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20—321頁。

我們常常說“新陈代謝”這句話。新陈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規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条件，經過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轉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謝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則由大变小，变成

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質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質。

同上,第311頁。

社会实践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們的腦子里生起了一个認識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內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

毛泽东:“实践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4頁。

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將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須估計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兩種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經過第一阶段的消耗將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減縮。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許要減縮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經濟方面。这一点,將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論和妥协論的根据。然而必須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經驗,軍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員,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現,国际援助的增長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質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給了我們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毛泽东:“論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56—457頁。

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將正規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一方面爭取時間加强

抗战力量,同时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以便举行战略反攻,驅逐日寇出中国。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問題”(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00—401頁。

(三一)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結果,反而造成了現時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問題。事情是現時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現,而出現的是不平衡。

(三二)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統一战綫的努力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則將遭到一定程度的失敗。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內一定程度上的胜或敗,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敗,这是什么緣故呢?因为一則敌强我弱之原来狀況就是相对的,不是絕对的;二則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統一战綫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狀況來說,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絕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統一战綫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內一定程度上的胜或敗,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况是繼續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軍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則的錯誤,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將随战争之延長而发展,必能繼續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繼續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

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毛泽东:“論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50—451頁。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則采用給敌以歼灭性打击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潰其另一部之目的,以便我軍能够迅速轉移兵力歼击他部敌軍。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們是劣势(就数量來說),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們是绝对的优势,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們就将在全体上轉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解放社編“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20—21頁。

我已得了华北华中各地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說:减租之后,农民生产兴趣大增,願意組織如同我們这里的变工队一样的互助团体,三个人的劳动效率抵过四个人。如果是这样,九千万人就可以抵过一亿二千万人。还有两个人抵过三个人的。如果不是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是采取耐心說服、典型示范的方针,那末,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組織在农业生产的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經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創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講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們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經濟工作”(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6頁。

現在的小社和初級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諸种生产資料,还是一种束縛。到了办大社和高級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縛,

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

毛泽东：“‘请老乡把大批兼营小商贩的农民吸引到农业合作中来了’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56页。

3. 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部分质变。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

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内，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2—303页。

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73页。

……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

化的緣故。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63頁。

4. 沒有質变就沒有发展，任何質变都必須由量变做准备。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革命者必須善于抓住时机，促成事物的轉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所謂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說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減和場所的变更。而这种增減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內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認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們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縮小。他們認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資本主义的剝削，資本主义的竞争，資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說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們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說明。他們簡單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認唯物辯証法所主張的事物因內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說。因此，他們不能解釋事物的質的多样性，不能解釋一种質变为他种質的現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是机械唯物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則有庸俗进化論。在中国，則有所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經長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拥护。近百年来輸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論和庸俗进化論，則为資產階級所拥护。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9頁。

馬克思說的武裝起义之后一刻也不應該停止进攻，这是說乘敌

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讓反动的統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間把国内反动的統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輕視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縮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敗。这是正确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93頁。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圍剿”，如果我们沒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倉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沒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圍剿”同时，进行我們的反“圍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們队伍中曾經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見是幼稚可笑的。

• ……………

反“圍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輕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傾向。我們需要的是热烈而鎮定的情緒，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同上，第194,196—197頁。

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則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們干持久战。这种方針，在領土狹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們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迴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內潰，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論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轉，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計，实在是下策。

毛泽东：“論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35—496頁。

在战争問題上，那里的(指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書編者)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敗北。自己所要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9—530頁。

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今后的問題就是在繼續抗战中使我党我軍和我們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們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50頁。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之把握。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解放社編“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21頁。

只要我們党对于处理合作化問題上的各項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們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簡單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講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村是老解放区，全村七十戶，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都加入了互助組，有一个强的党支部，又有王志琪那样为群众所信任的領袖人物，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所以那个村，在一九五二年，只費了一个多月的時間，就建成了合作社，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条件没有这个村这样完备的地方怎么办呢？那就是准备

条件的問題，有几个月，或者一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可以了。

毛泽东：“‘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45頁。

必須認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

必須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对單純地追求数量的偏向。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是我党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也可以用到建設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来。要有把握，就要有准备，而且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在一个省、一个專区和一个县里面建設一批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須事前做好許多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大体是：（1）批判錯誤思想，总结工作經驗。（2）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統地和反复地宣傳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針、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傳的时候，不但要解釋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3）按照实际情况，拟定全省的、全專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和全乡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从其中拟定年度规划。（4）用短期方式訓練办社干部。（5）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許多互助組互相联合起来，組成互助組的联合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

有了这些条件，就有可能使合作社发展的数量和質量統一的問題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还要在第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后，跟着就去进行整頓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来以后能不能巩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后的整頓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3頁。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来的辯証法，促成事物的轉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8頁。

5.任何質变都是飛跃。飛跃的形式是多样的，最基本的形式是：爆发式飛跃和漸进式飛跃。

、炸彈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統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現，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現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22頁。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須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8頁。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統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須揭露反动派所謂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等等欺騙的宣傳，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論，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証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22—323頁。

有人笑我們是“战争万能論”，对，我們是革命战争万能論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槍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們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槍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們可以說，整个世界只有

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1958年11月6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5頁。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

毛澤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頁。

我們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象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

毛澤東：“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7—28頁。

我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5日)，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6. 社会的发展也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是一个不断由量变到质变的无穷的发展过程。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認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沒有障着、也不允許隔着万里長城；我們又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論者，我們認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質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質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

完成中国資产階級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轉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偉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絕對不能半途而廢。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們只有在現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沒有在將來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現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應該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錯誤的。每个共产党员須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內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質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則是在于力爭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認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認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6页。

革命的轉变，那是將来的事。在將來，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轉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轉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轉变的条件为标准，時間会要相当地長。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轉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輕易談轉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去轉变，如象过去

某些同志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轉變之時，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們看不見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經濟情况的國家，他們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經濟上完成民主革命，較之俄國要困難得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努力。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55頁。

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我們是為着社會主義而鬥爭，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相同的。現在的努力是朝着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这个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將有幾個發展階段，都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下面。從資產階級占優勢到無產階級占優勢，這是一個鬥爭的長過程，爭取領導權的過程，依靠着共產黨對無產階級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提高，對農民、對城市小資產階級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提高。

無產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其次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同我們爭領導權的是資產階級。

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的克服，依靠群眾的力量和正確的政策，否則資產階級將反過來克服無產階級。

不流血的轉變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應該力爭這一着，結果將看群眾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於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和急性病。

毛澤東：“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1937年5月7日），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66—267頁。

中國共產黨在公布國共合作的宣言上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若干人們對於共產黨願意實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覺得奇怪，如像上海的諸青來，就

是在上海的刊物上提出这种疑問的一个。他們以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56頁。

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問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毛泽东：“五四运动”（1939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45—546頁。

中国革命的性質是什么？我們现在干的是什麼革命呢？我們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們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須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50—551頁。

很清楚的，中国現時社会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須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現時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9、661页。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同上，第664—665页。

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

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論”，起勁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資产階級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輿論。……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們似乎并无惡意，也迷惑于所謂“一次革命論”，迷惑于所謂“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純主觀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說，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須脚接，不容橫插一个資产階級專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論。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時間去完成的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同上，第677—678頁。

工人階級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階級必須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須經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

毛泽东：“‘中国工人’发刊詞”（1940年2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21頁。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資产階級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許放松，稍許怠工，稍許表現不忠誠、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誠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經過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馬克思主义的天經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長期的。沒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統一的国家，沒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經濟的发展，沒有私人資本主义經

济和合作社經濟的发展，沒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沒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話，沒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階級性質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60—1061頁。

7. 树立不断革命的思想，永远做促进派。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們的認識运动是沒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論是屬於自然界的和屬於社会的，由于內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們的認識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來說，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时須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經說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經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轉变的时候，須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观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認識受了許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緣故。我們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將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頑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們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們不能站在社会車輪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后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車。

毛泽东：“实践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3頁。

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貴呢？如果老就可貴，那么可貴的

人太多了。因此我們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說，可貴的是他一輩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利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沒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貫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貫的有益于青年，一貫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我們的吳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間顛沛流离……始終不变，这是……不容易的呵。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經不多了，而始終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沒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惡势力惡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餓飯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們的吳玉章同志就是經過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們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別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

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庆祝吳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詞，1940年1月24日“新中华报”。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長时期，我們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們的事情还很多，譬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尙待我們扫灭。严重的經濟建設任务摆在我們面前。我們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閑起来了，我們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們去做。

毛泽东：“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1月1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頁。

毛主席指示我們：“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热情，减少驕傲情緒，想驕傲也沒有驕傲的时间。”

轉摘自安子文：“永远做一个革命意志旺盛的人”，1958年3月19日“北京日报”。

八 肯定否定規律

1. 不破不立, 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 发展就是新陈代謝、新东西对旧东西否定的过程。新陈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規律。

我們常常說“新陈代謝”這句話。新陈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規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条件, 經過不同的飞跃形式, 一事物轉化为他事物, 就是新陈代謝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兩個方面的矛盾, 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結果, 新的方面由小变大, 上升为支配的东西; 旧的方面則由大变小, 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 旧事物的性質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 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 事物的性質也就随着起变化。

……

……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 总是这样新陈代謝、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毛泽东: “矛盾論”(1937年8月), “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第311—313頁。

巩固无产阶级的專政或人民的專政, 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專政, 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 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軍, 进行革命战争, 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許多相反的东西, 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同上, 第317—318頁。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88頁。

有人說，只要建設，不要破坏。那末，請問：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設。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設，否則不过是講夢話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設新的健全的东西。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25—726頁。

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縛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統治，还須費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則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縛。至于我們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馬克思主义的惡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傳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間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許多人中間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93—884頁。

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

的、虛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創作情緒。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緒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們，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設起新东西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5—876頁。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經走过了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將因其丧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們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們怕說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們則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創設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和人民專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認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沒有讀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剛才进党的青年同志們，也許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們必須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

毛泽东：“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頁。

2. 我們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們不应当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外国，而且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而且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于我国的历史遺產和外国的事物，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不要一概排斥，并不要盲目搬用，而应当棄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地加以繼承和总结。絕不可以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对于任何問題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領導路綫問題，应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

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42—943页。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1页。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但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页。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

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們应当給以总结，承繼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偉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页。

自从一八四〇年鴉片战争失敗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經過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毛泽东：“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1日），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3页。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釋，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93—694页。

紀念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紀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鮮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場，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銳的斗争。他在这一場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紀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偉績。

紀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偉績。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給我們許多有益的东西。

現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繼承者。

我們完成了孙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們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費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偉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毛泽东：“紀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
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員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魯迅，就是这个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学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战綫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陣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91頁。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帶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質，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經濟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識分子眼見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經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經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

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他們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战綫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偉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帜,立下了偉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謂“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識分子,即所謂市民阶级的知識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同上,第692—693頁。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現时的新政治新經濟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經濟发展而来的,中国現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給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辯証法的发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們向前看。

同上,第700—701頁。

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質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許多領導人物，还没有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們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張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們对于現狀，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沒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謂坏就是絕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謂好就是絕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33頁。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进了新內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東西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7頁。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針是錯誤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創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們建設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84頁。

中国應該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着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東西，如同我們对于食物一样，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运动，

送进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00頁。

詩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長发展。詩当然应以新詩为主体，旧詩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話仅供你們参考。

毛泽东：“关于詩的一封信”(1957年1月12日)，“詩刊”1957年創刊号。

3. 事物的发展不是簡單的反复，而是曲折的波浪式的前进。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建設也是如此。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

毛泽东：“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50頁。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說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沒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沒有紅軍到創造紅軍，从沒有革命根据地到創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說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許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軍事运动。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89—190頁。

战略退却，是劣势軍队处在优势軍队进攻面前，因为顧到不能迅

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軍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軍事冒险主义者則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們的主張是所謂“御敌于国門之外”。

誰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聰明的拳师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却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水滸傳”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連喚几个“来”“来”“来”，結果是退讓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綻，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春秋时候，魯与齐战，魯庄公起初不待齐軍疲憊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劌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針，打胜了齐軍，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軍战胜强軍的有名的战例。

同上，第197頁。

关于丧失土地的問題，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將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則。如果我們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賺錢生意。市場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貨物，也不能取得金錢。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設。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時間，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这是蝕本生意。

同上，第205—206頁。

第五次反“圍剿”时人們錯誤地否定了以前本來是正确的方針，我們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圍剿”时人們的錯誤方針，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針。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圍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圍剿”时的錯誤的东西。

同上，第226頁。

我們說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說和平巩固了，相反，我們說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兩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

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

毛泽东：“为爭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而斗争”
(1937年5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
第2版，第262頁。

我們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战,但不是說不經努力能够把內战、独裁和不抵抗的旧毒扫除乾淨。旧毒,污濁,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長期的斗争和努力。

同上,第263頁。

(九二)中国版图广大,兵員众多,但軍隊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則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輔助之,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謂“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謂“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

(九三)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战軍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然而,这和韓复榘式的逃跑主义是沒有相同之点的。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能被韓复榘一类人所借口,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沒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結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种思想也是不对的,即所謂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我們主張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輔助作用的陣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沒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拚命主义是軍事上的近視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拚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战軍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許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鎖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

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拼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87—488页。

英勇战斗于前，又放棄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嗎？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嗎？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問。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嗎？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嗎？可不可以这样提出問題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鴨綠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誰人不知，为爭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棄，时间却爭取了，給敌以歼灭和給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經驗却取得了，沒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長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嗎？一点也不白流的。放棄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棄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絕无把握的决战，結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隨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說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錢，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賭汉也要賭本，孤注一擲，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賭。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同上，第497—498页。

讓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驟达到了积极的目的。“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把讓步看作純消极的东西，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所許可的。純消极的讓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

际的劳资合作論，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讓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張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們應該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們的讓步、退守、防禦或停頓，不論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綫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綫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話，是积极的。

毛泽东：“統一战綫中的独立自主問題”（1938年11月5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5—526頁。

世界將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應該提起充分的警覺，估計到历史的若干暫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許多国家中不願看見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結；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誰要是忽視了这些，誰就將在政治上犯錯誤。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經确定，不能改变了。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頁。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鋒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經過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毛泽东：“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1日），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6頁。

搗乱，失敗，再搗乱，再失敗，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邏輯，他們决不会違背这个邏輯的。这是一条馬克思主义的定律。……

斗争，失敗，再斗争，再失敗，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决不会違背这个邏輯的。这是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毛泽东：“評白皮書”（1949年8月11日），“毛泽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1頁。

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須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

整頓的時間，然後再去發展一批合作社。那種不許有停頓、不許有倒退的思想是錯誤的。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
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頁。

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頁。

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鬥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

同上，第12—13頁。

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同上，第26—27頁。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生事物一定要勝利，舊的、衰朽的事物一定要死亡。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裡用得着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里不僅是具備了发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发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及其以後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了充分的證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着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嚮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3頁。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同上，第110頁。

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任何別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進了歷史博物館的东西了。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已有一部分進了博物館（在蘇聯）；其餘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快進博物館了。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79頁。

不論怎样迂迴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經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願，一定要由我們这一代人去实现，誰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54頁。

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們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願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則。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講話（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頁。

拿中国的情形来說，我們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槍，但是历史最后將証明，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許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敗，我們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們代表进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見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1946年8月），“毛泽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頁。

在一九四六年，战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中国的光明面和黑暗面也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和中国都发展了争取和平与争取民主自由的規模极大的人民运动。这个运动必然走向胜利。这个运动是任何力量阻止不住的。

毛泽东：“新年祝詞”（1947年1月1日），1947年1月1日“解放日报”。

我国的一切人民事业均正在循着新的軌道向前发展，每天都可以看見进步，看見成績，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人民事业的前进。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屆第二次会议开幕詞”（1950年6月1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屆第二次会议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頁。

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究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苏联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苏联是一个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是一个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有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国家，是一个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真正反对民族压迫和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本国全体人民的热烈支持，同时有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这两种支持所达到的程度，是各国的历史所从来没有过的。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页。

……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当然，在人民面前还有困难和曲折。但是，列宁在三十六年前说得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同上，第4页。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同上，第5页。

帝国主义除了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对国内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迫害以外，还指望着战争。但是他们能够从战争中指望什么呢？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曾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出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和东方出现了更多的革命。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

同上，第5—6页。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与国内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暴风雨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19页。

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与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与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同上，第34页。

美国共产党虽然暂时还处于不大顺利的地位，但是你们的斗争是很有意义的，将来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黑夜是有尽头的。美国反动势力现已到处碰壁，显示着他们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你们那里目前敌强我弱这种形势，完全是暂时的现象，它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起变化。

毛泽东同志给羅斯特同志的回信（1959年1月17日），“红旗”1959年第8期，第1页。

毛主席說：帝国主义者们的寿命不会很長了，因为他们們尽做坏事，專門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軍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們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們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們依然在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橫行霸道。他們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們本国的人民群众。毛主席說：这种局面必需改变。結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毛主席巡視大江南北回京后对新华社記者发表重要談話，
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5. 新生事物，只能在斗争中发展！在新生事物的成长过程中，部分的缺点和錯誤是难免的。馬克思主义者对于新生事物应当采取热情支持，坚决保护的态度，而絕不应当采取冷淡、譏諷、指責以至打击的态度。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鍛煉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中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驗出来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97頁。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經過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內，是那样頑固地要走他們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內，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贊成新事物。

毛泽东：“‘他們坚决選擇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按語”(1955年)，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頁。

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經過这样的一場斗争，就不能創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須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殘余，总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头脑里，不願意

輕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須經過許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已巩固起来。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8頁。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誕生，总是要伴随一場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傳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靜的情况下出現的，它要求我們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們理解的宣傳教育工作。

毛泽东：“‘一个整社的好經驗’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6頁。

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傳鷄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張旗鼓地宣傳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鷄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鷄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經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們的許多地方党組織沒有能够給貧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全怪它們，上面还没有給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給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們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調。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頑固的，也不敢議論鷄毛能不能上天的問題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

毛泽东：“‘誰說鷄毛不能上天’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8—779頁。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都是要經過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

中，要想不經過艱難曲折，不付出極大努力，總是一帆風順，容易得到成功，這種想法，只是幻想。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頁。

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承認，只能在鬥爭中曲折地發展。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哥伯尼關於太陽系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都曾經被看作是錯誤的東西，都曾經經歷艱苦的鬥爭。我國歷史上也有許多這樣的事例。同舊社會比較起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新生事物的成長條件，和過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壓抑新生力量，壓抑合理的意見，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於有意壓抑，只是由於鑒別不清，也會妨礙新生事物的成長。

同上，第26頁。

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裡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踪。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着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要解決這“少數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群眾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3頁。

這個軍隊（指八路軍和新四軍——本書編者）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着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着全民族

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9頁。

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綫，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願和我們一起奮鬥，去爭取勝利。要使全國人民有這樣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頭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說是你們這樣干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麼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揹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毛澤東：“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101—1102頁。

反對對敵人的力量估計過高。例如，懼怕美帝國主義，懼怕到國

民党区域作战，惧怕消灭买办封建制度、分配地主土地和沒收官僚資本，惧怕長期战争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全世界资本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統治，已經腐爛，沒有前途。我們有理由輕視它們。我們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內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上（不論是在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或思想的斗争上），却又决不可輕視敌人，相反，应当重視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們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輕視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上，也輕視敌人。如果我們在全体上过高估計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們，不敢胜利，我們就要犯右傾机会主义錯誤。如果我們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上，不采取謹慎态度，不講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爭取一切应当爭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階級，學生、教員、教授和一般知識分子，一般公務人員，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紳士），我們就要犯“左”傾机会主义錯誤。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問題”（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24頁。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瘋狂地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威胁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們，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敗及其瀕于灭亡的恐怖情緒。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因此，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須團結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須團結起来，必須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則就不能胜利。这个敌人的基础是虛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脫的經濟危机，因此，它是能够被战胜的。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計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將是一个极大的錯誤。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1月），“毛泽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23頁。

……長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战而胜之，或取而

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1日），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頁。

毛主席橫渡長江以後和一些省、市領導同志說：“長江，別人都說很大，其實，大，並不可怕。你們不讓我游，我現在不是已經游過來了嗎？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他一下，也沒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東西，其實並不可怕。”

“毛主席三次渡長江”，1957年6月18日“長江日報”。

一九四六年蔣介石開始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們許多同志，全國人民，都很憂慮：戰爭是不是能夠打贏？我本人也憂慮這件事。但是我們有一條信心。那時有一個美國記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談話的時候談了許多問題，蔣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國、原子彈等等。我說一切所有號稱強大的反動派統統不過是紙老虎。原因是他們脫離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紙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嗎？我也談到沙皇是紙老虎，中國皇帝是紙老虎，日本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國主義沒有倒，還有原子彈，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紙老虎。蔣介石很強大，有四百多萬正規軍。那時我們在延安。延安這個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們有多少軍隊呢？我們有九十萬游擊隊，統統被蔣介石分割成幾十個根據地。但是我們說，蔣介石不過是一個紙老虎，我們一定會打贏他。為了同敵人作鬥爭，我們在一個長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概念，就是說，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一定要藐視它，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如果不是在整體上藐視敵人，我們就要犯機會主義的錯誤。馬克思、恩格斯只有兩個人，那時他們就說全世界資本主義要被打倒。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在一個一個敵人的問題上，如果我們不重視

它，我們就要犯冒險主義的錯誤。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敵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工廠只能一個一個地蓋，農民犁田只能一塊一塊地犁，就是吃飯也是如此。我們在戰略上藐視吃飯：這頓飯我們能夠吃下去。但是具體地吃，卻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這叫做各個解決，軍事書上叫做各個擊破。

毛澤東同志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同志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25頁。

九 唯物辯証法的範疇

(一) 本質和現象。主流和支流

1. 現象是事物片面的外部的联系，本質是事物全体的內部的联系。我們看事情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导，一进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原来人在實踐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間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們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两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許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說話，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

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們的腦子里生起了一个認識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內部联系了。

毛澤东：“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274頁。

論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論理的認識則推进了一大

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質的、內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圍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发展。

同上，第275頁。

我們的實踐証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現象問題，理論才解决本質問題。这些問題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同上。

(二)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革命的主觀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現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这样看法的同志們）发生悲觀的念头。但若从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說，現在虽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經得了充分的証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导，一进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 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實質。……

(四) 現时的客觀情况，还是容易給只观察当前表面現象不观察實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别是我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覺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屬米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拋棄實質的观察，是因为他們对于一般情况的實質並沒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問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3—104頁。

2.通过現象抓住本質，这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观察問題应抓住它的本質，不要为表面現象所迷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它們外强中干，貌似强大，实则虚弱。一切反动派必將灭亡，革命事業必將胜利。

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們的最后掙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97頁。

在人类历史上，凡屬將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掙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們也往往在一个期間內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現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質。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掙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掙扎。在这个历史的轉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綫內的人們也有許多被法西斯的凶惡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質。

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轉折点”(1942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85—886頁。

中国共产党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計了国际与国内形勢，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够打敗的。当着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时候，我們就指出：这不过是暫时的現象，暴风雨即將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当着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匪帮发动全国規模的反革命战争的时候……那时我們說，敌人軍事力量的优势，这只是暫时的現象，这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占着优势。人民解放軍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

治基础。十八个月战争的經驗，充分地証明了我們的論断。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
解放社編“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
标准本，第19—20頁。

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現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与暫时的。危机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

同上，第32頁。

原子彈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彈是一种大規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長远的观点看問題，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动派，而是屬於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那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陣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結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維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紙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經被人們看作很有力量的嗎？但是历史証明了他是一只紙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們所預料的强大得多。

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紙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們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証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槍，但是历史最后將証明，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許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

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見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1948年8月），“毛泽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19頁。

我說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統統不过是紙老虎。原因是他們脫離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紙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嗎？我也談到沙皇是紙老虎，中国皇帝是紙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紙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沒有倒，还有原子彈，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紙老虎。蔣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規軍。那时我們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們有多少軍隊呢？我們有九十萬游擊隊，統統被蔣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們說，蔣介石不过是一个紙老虎，我們一定会打贏他。

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上的發言（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25頁。

3. 必須善于区分事物发展的主流和支流，不应把支流看成主流。應該看到我們工作中成績是主要的，缺点和錯誤是次要的，这样才不致于迷失方向。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来，全国也即將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帶有极其偉大的世界意义。我們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糾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和錯誤，只要我們积极地去幫助他們，就会克服和糾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領導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頁。

在发展的問題上，目前不是批評冒進的問題。說現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

同上，第18頁。

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对。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决。但是，不应当將这些看成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們必須相信：(1)广大农民是願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領導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質和主流。如果缺乏这种信心，我們就不可能在大約三个五年計劃时期內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同上，第21頁。

我們的肃反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錯誤。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們的方針是：“有反必肃；有錯必糾”。我們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綫是群众肃反的路綫。采取了群众路綫，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錯誤会比较容易糾正些。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頁。

(二) 全局和局部

1. 凡屬帶有要照顧事物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質的都是事物的全局。局部是全局的一部分，全局是由局部構成的。处理任何事情，都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对全局的关照上。“要贏得全局的胜利，必須爭取每一局部的胜利。”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質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

要求战役指揮員和战术指揮員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規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說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見是錯誤的，因为这种意見沒有看見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問題，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錯誤，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說“一着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帶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說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連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棄的，有在吃了許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說的“連战皆捷”和“許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說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說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顧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顧部队和兵团的組成問題，照顧两个战役之間的关系問題，照顧各个作战阶段之間的关系問題，照顧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間的关系問題，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說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連的动作和排

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級的首長，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揮的全局說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問題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問題或动作上。

說重要，就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規定，必須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規定。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規定。在給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飽，在給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餓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在紅色区域，則走漏消息的問題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級指揮員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他則无此必要。一个軍事学校，最重要的問題，是选择校長教員和規定教育方針。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总之，一个原則，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構成的，有局部經驗的人，有战役战术經驗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8—170頁。

我們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論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績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驅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設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毛泽东：“論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73頁。

軍事上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許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許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

位,就能逐漸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脫出了。

同上,第479頁。

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脫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許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剝夺敌人的許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拋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們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

同上。

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飯也是如此。我們在战略上藐視吃飯:这頓飯我們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日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軍事書上叫做各个击破。

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上的发言(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頁。

2. 全局統率局部，局部隸屬全局。必須树立全局观点，照顧全局，以局部服从全局，反对一切只見树木不見森林的片面观点，反对一切強調局部不顧全局的本位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

决定退却終点究在何处，須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轉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則据此决定退却終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須計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們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終点應該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圍剿”，陝甘第三次反“圍剿”时。有时須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时。有时則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时。这些

都是將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圍剿”，我軍全然不講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魯莽灭裂的干法。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03
—204頁。

关于丧失上地的問題，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將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則。如果我們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賺錢生意。市場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貨物，也不能取得金錢。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設。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時間，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这是蝕本生意。我們在敌人第五次“圍剿”时期的蝕本正因为这一点。不願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結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亞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結果，虽然阿国失敗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問題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爛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長期地打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長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塞維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見拒绝对德和約时，新生的苏維埃就有夭折的危險。

同上，第205—206頁。

初战的計劃必須是全战役計劃的有機的序幕。沒有好的全战役計劃，絕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說，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則这个仗虽胜也只算敗了（例如第五次“圍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須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軍全局將起如何变化，假若敗了，又將起如何变化。虽結果不見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須依据双方全局，仔細地切

实地想明白。沒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同上，第215—216頁。

共產黨員在領導群眾同敵人作鬥爭的時候，必須有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觀點。共產黨員必須懂得以局部需要服從全局需要這一個道理。如果某項意見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就應以局部服從全局。反之也是一樣，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也應以局部服從全局。這就是照顧全局的觀點。共產黨員決不可脫離群眾的多數，置多數人的情況於不顧，而率領少數先進隊伍單獨冒進；必須注意組織先進分子和廣大群眾之間的密切聯繫。這就是照顧多數的觀點。在一切有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產黨員必須採取和他們一道商量問題和一道工作的態度。那種獨斷專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態度，是不對的。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必須善於照顧全局，善於照顧多數，並善於和同盟者一道工作。我們過去在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點，必須注意改進。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3—514頁。

這裡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於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為什麼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種小圈子主義的人們，對於這樣一種思想是抵觸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並且尽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我們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在蓬勃地發展着，成績很大，但是，在目前社會大變動的過渡時期，困難問題還是很多的。又發展又困難，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應當解決，也是完全可以解

決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綫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決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我這樣說，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呢？當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團體想辦法，可以由群眾直接想辦法，他們是能夠想出很多好的辦法來的。而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應當指導社會團體和各地群眾這樣做。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5頁。

（六）本位主義，一切只知道為四軍打算，不知道武裝地方群眾是紅軍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一種放大了的小團體主義。

（七）有少數同志囿於四軍的局部環境，以為除此就沒有別的革命勢力了。因此，保存實力、避免鬥爭的思想非常濃厚。這是機會主義的殘余。

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89頁。

同志們，你們看，差不多一年半以來，中國的三支主力紅軍都在作障地的大轉移。從去年八月任弼時同志等率領第六軍團向賀龍同志的地方開始轉移起，接着就是十月開始的我們的轉移。今年三月，川陝邊區的紅軍也開始轉移。這三支紅軍，都放棄了原有障地，轉移到新地區去。這個大轉移，使得舊區域變為游擊區。在轉移中，紅軍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們拿着整個局面中的這一方面來看，敵人是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對的，因為這是事實。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國燾）：中央紅軍失敗了。這話對不對呢？不對。因為這不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全體。一個蝦蟆坐在井里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如

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甚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們說，紅軍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个方面（占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實現“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这样說才是恰当的，因為我們完成了長征。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44頁。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傾意見，来源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們看問題仅从一局部出发，沒有能力通觀全局，不願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結，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結，捉住一局部一時間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間，是應該捉住不放的，不然我們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終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絕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視。我們應該学习的是布尔塞維克的聰明。我們的眼力不够，應該借助于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06頁。

一部分同志，只看見局部利益，不看見全体利益，他們总是不适当地特別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們的局部利益。他們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們忘記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級服从上級，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張國燾是向党中央鬧獨立性的，結果鬧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現在講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現象必須預防，必須將各种不統一的現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个黨員，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項言論或行动，都必須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絕對不許可違反这个

原則。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23頁。

必須反對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本位主義的傾向。誰要是對別人的困難不管，別人要調他所屬的幹部不給，或以壞的送人，“以鄰為壑”，全不為別部、別地、別人想一想，這樣的人就叫做本位主義者，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產主義的精神。不顧大局，對別部、別地、別人漠不關心，就是這種本位主義者的特點。對於這樣的人，必須加重教育，使他們懂得這就是一種宗派主義的傾向，如果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

同上，第825—826頁。

積極擁護合作社的是些什麼人呢？是絕大多數貧農和下中農，他們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餘的人，大多數也對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滿意的只占極少數。許多人沒有分析這種情況，沒有對合作社的成績和缺點以及缺點產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當成了全體，這就在一些人中間刮起了一陣所謂合作社沒有優越性的小台風。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頁。

(三) 形式和內容

1. 形式和內容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有時形式上是重復的，內容却是發展了；形式上是被動的，內容却是主動的。然而形式不能離開內容單獨存在，一定的內容也必有一定的形式。

說長期反復；是說戰爭和戰鬥形式的反復。這是事實，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圍剿”和反“圍剿”，是戰爭形式的反復。敵以進攻對我防禦、我以防禦對敵進攻的第一階段，和敵以防禦對我進攻、我以進攻對敵防禦的第二階段，是每一次“圍剿”中戰鬥形式的反復。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87页。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碓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棄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棄主动权，同时即給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同上，第217—218页。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廢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523页。

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

形式的統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無論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对政治观点錯誤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沒有艺术力量的所謂“標語口号式”的傾向。我們應該进行文艺問題上的兩条战綫斗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1942年5月），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1頁。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遺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进了新內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東西了。

同上，第857頁。

2. 必須根据不同的時間、地点和条件选择适当的形式。在同一內容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中，存在着一种主要的形式，其他的形式必須与这种主要的形式很好地配合起来。

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須將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統一起来，就是說，和民族的特点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觀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00頁。

在各經濟部門中的生产和交換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則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体所有制經濟里面，在这兩种社会主义經濟形式之間，积累和消

費的分配問題是一个复杂的問題，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經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2頁。

当譚启龙彙报說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場时，毛主席說，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主席視察山东农村”，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們說，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輔助的，說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負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責任。但这不是說：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輔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說，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內的。長期的殘酷的战争中間，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陣地战是輔助的。第二阶段，則游击战將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陣地战輔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輔之以陣地战和游击战。

毛泽东：“論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88頁。

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組織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視，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組織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組織和斗

爭，則是直接或間接地配合戰爭的，例如北伐戰爭時期，革命軍后方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直接地配合戰爭的，北洋軍閥統治區域內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間接地配合戰爭的。又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色區域內部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直接地配合戰爭的，紅色區域外部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間接地配合戰爭的。再如現在抗日戰爭時期，抗日軍后方的和敵軍占領地的一切組織和鬥爭，也同樣是直接或間接地配合戰爭的。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1頁。

我們黨已經能夠把武裝鬥爭這個主要鬥爭形式同其它許多的必要的鬥爭形式直接或間接地配合起來，就是說，把武裝鬥爭同工人的鬥爭，同農民的鬥爭（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婦女的、一切人民的鬥爭，同政權的鬥爭，同經濟戰綫上的鬥爭，鋤奸戰綫上的鬥爭，思想戰綫上的鬥爭，等等鬥爭形式，在全國範圍內或者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配合起來。而這種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土地革命鬥爭。

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00頁。

但是着重武裝鬥爭；不是說可以放棄其他形式的鬥爭；相反，沒有武裝鬥爭以外的各種形式的鬥爭相配合，武裝鬥爭就不能取得勝利。着重農村根據地上的工作，不是說可以放棄城市工作和尚在敵人統治下的其他廣大農村中的工作；相反，沒有城市工作和其他農村工作，農村根據地就處於孤立，革命就會失敗。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奪取作為敵人主要根據地的城市，沒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達此目的。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30頁。

3. 我們看待任何事物，必須首先着重於它的內容，它的內部
 聯系，反對一切形式主義看問題的方法。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們对于食物一样，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們的身體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盘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种錯誤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00頁。

我們应当禁絕一切空話。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說：“資本論”不是很長的么，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話說：“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說：“看菜吃飯，量体裁衣。”我們無論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說也是这样。我們反对的是空話連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調，不是說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內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說也是一样，空話連篇言之无物的演說，是必須停止的。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35頁。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狀是：甲乙丙丁，开中藥鋪。你們去看一看中藥鋪，那里的藥瓶子上有許多抽屜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貼着藥名，当归、熟地、大黃、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們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說，著書，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貳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 B C D，小a b c d，还有阿剌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們造好了这許多符号，使我們开起中藥鋪来毫不費力。一篇文章充滿了这些符号，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决問題，不表示贊成什么，反对什么，說來說去还是一个中藥鋪，沒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說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說那种对待問題的方法不对。現在許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藥鋪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級、最幼稚、最庸俗的

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單單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沒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說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腦筋想問題，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質，而滿足于甲乙丙丁的現象罗列。

同上，第839—840頁。

不但文章里演說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嗎？在会場上做起“报告”来，則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要講一頓，不講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現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嗎？

同上，第842頁。

(四) 規律性

1. 規律是客觀事物的内部联系，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人們要想做好某件事，就必須認識这件事的发展規律，并且拿了这种对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实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毛泽东：“改造我們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頁。

軍事的規律，和其他事物的規律一样，是客觀实际对于我們头脑的反映，除了我們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觀实际的东西。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5頁。

……一切客觀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1—302頁。

大家明白，不論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物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3—164頁。

为什么要組織紅軍？因为要使用它去战胜敌人。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規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規律于战争。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問拿在講堂上，或在書本中，很多人尽管講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勝負之分。战争史和我們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証明了这一点。

那末，关键在那里呢？

我們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將軍，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們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將軍——智勇双全的將軍。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識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規律，并且应用这些規律于自己的行动。

同上，第171—172頁。

經驗多的軍人，假使他是虛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揮員、战斗員、武器、給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揮員、战斗員、武器、給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經濟、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軍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較地有把握，比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長

時間內認識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規律，解决了主觀和客觀的矛盾的結果。这一認識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沒有这一種長時間的經驗；要了解 and 把握整个战争的規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級指揮員，不是初出茅廬或仅仅善于在紙上談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須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同上，第174頁。

指揮員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們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驟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規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木。

同上，第176頁。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够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抓着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實踐、革命的階級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實踐以及科学實驗的實踐中去。

毛泽东：“實踐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0—281頁。

2. 規律由于起作用的範圍不同可分为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我們既要認識事物发展的一般規律，也要認識事物的特殊規律，否則就会陷入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錯誤。

我們現在是从事战争，我們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們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規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規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規律。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3頁。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階級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間、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

的性質，它和它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戰爭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導戰爭，就不能打勝仗。

革命戰爭——革命的階級戰爭和革命的民族戰爭，在一般戰爭的情形和性質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質。因此，在一般的戰爭規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不懂得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質，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規律，就不能指導革命戰爭，就不能在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中國革命戰爭——不論是國內戰爭或民族戰爭，是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內進行的，比較一般的戰爭，一般的革命戰爭，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質。因此，在一般戰爭和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如果不懂得這些，就不能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所以，我們應該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也應該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最後，我們還應該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同上，第164—165頁。

有一種人的意見是不對的；我們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只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着反動的中國政府或反動的中國軍事學校出版的那些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這些條令僅僅是一般戰爭的規律，並且全是抄了外國的，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照抄來用，絲毫也不變更其形式和內容，就一定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他們的理由是：過去流過血得來的東西，為什麼要不得？他們不知道：我們固然應該尊重過去流血的經驗，但是還應該尊重自己流血的經驗。

又有一種人的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只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着蘇聯內戰的指導規律和蘇聯軍事機關頒布的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蘇聯的規律和條令，包含着蘇聯內戰和蘇聯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抄了來用，不允許任何的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這些人的理由是：蘇聯的戰爭是革命的戰爭，我

們的戰爭也是革命的戰爭，而且蘇聯是勝利了，為什麼還有取舍的余地？他們不知道；我們固然應該特別尊重蘇聯的戰爭經驗，因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戰爭的經驗，是在列寧、斯大林指導之下獲得的；但是我們還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因為中國革命和中國紅軍又有許多特殊的情況。

再有一種人的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就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最好的，我們應該學習它，具體地說，學北伐戰爭的長驅直進和奪取大城市。他們不知道：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應該學習的，但是不應該刻板地抄用，因為我們現時戰爭的情況已經變化了。我們只應該採用北伐戰爭中那些在現時情況下還能適用的東西，我們應該按照現時情況規定我們自己的東西。

由此看來，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着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從時間的條件說，戰爭和戰爭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点，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於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和反革命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從地域的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特別是大國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樣不能呆板地移用。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

同上，第165—166頁。

·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從來就是十月革命所開始的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計到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論在革命事業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我們都充分地利用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豐富經驗。中國人民感到幸運，因為有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使自己可以減少或者避免許多錯誤，可以比較順利地進

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經驗,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創造性地利用这些經驗,那末,他就不能通曉作为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設的問題。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錯誤,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錯誤。我們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錯誤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6日),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頁。

(五) 目的性

1. 有目的有計劃的自覚活动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然而目的性之能否实现是受客观規律所制約的。革命的符合規律的目的一定能实现,反动的違反規律的目的必然要失敗。

自覚的能动性,說的是自覚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

毛泽东:“論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77頁。

現在來說計劃性。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計劃性于战争,較之实现計劃性于別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事先的計劃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同上,第484頁。

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則,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貫徹于战争的始終。

抗日戰爭的各級指導者，不能離開中日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導戰爭，也不能離開這個戰爭目的去指導戰爭。

同上，第473頁。

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

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頁。

社會的人們投身於變革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實踐中（不論是關於變革某一自然過程的實踐，或變革某一社會過程的實踐），由於客觀過程的反映和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使得人們的認識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應於該客觀過程的法則性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然後再應用這種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於該同一客觀過程的實踐，如果能夠實現預想的目的，即將預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在該同一過程的實踐中變為事實，或者大体上變為事實，那末，對於這一具體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例如，在變革自然的過程中，某一工程計劃的實現，某一科學假想的証實，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農產的收穫，在變革社會過程中某一罷工的勝利，某一戰爭的勝利，某一教育計劃的實現，都算實現了預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為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學條件和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分地改變思想、理論、計劃、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

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復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于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變主觀的東西為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予想的結果。

同上，第282—283頁。

我們的戰爭是神聖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達此目的，便須決一死戰，便須準備着一切犧牲，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停止。犧牲雖大，時間雖長，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經鮮明地擺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從事戰爭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爭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國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要把戰爭延長到無盡期，我們則要把戰爭在一個不很久遠的將來給以結束。為了這個目的，人類大多數應該拿出極大的努力。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占了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夠一齊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對於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貢獻，無疑地是非常偉大的。這種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會經濟的行程已經接近了這一點，只須加上多數人的努力，幾十年工夫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6頁。

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曾經說過：“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就是張伯倫政策的必然結果。”張伯倫以損人的目的開始，以害己的結果告終。這將是一切反動政策的發展規律。

毛澤東：“關於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1939年9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70頁。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據這種分裂方針所準備採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並且讓它永遠也解不開，這條繩索的名稱就叫做“國民大會”。他們的原意是想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寶，祭起來，一則抵制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可是，歷史的選

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69頁。

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並且將必然取得勝利。“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是中國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為的一句俗話。各國反動派也就是這樣的一批蠢人。他們對於革命人民所作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難道沙皇和蔣介石對於革命人民的種種迫害，不就是對於偉大的俄國革命和偉大的中國革命起了這樣的促進作用嗎？

毛澤東：“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6日），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頁。

2. 辯證唯物論者強調動機與效果二者不可分割，是動機與效果的統一論者；因此辯證唯物論者認為，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标准。

文藝批評有兩個标准，一個是政治标准，一個是藝術标准。按照政治标准來說，一切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着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這裡所說的好壞，究竟是看動機（主觀願望），還是看效果（社會實踐）呢？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為個人的和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有為大眾的動機但無被大眾歡迎、對大眾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及其

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标准。我們的文艺批評是不要宗派主義的，在團結抗日的大原則下，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態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們的批評又是堅持原則立場的，對於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眾和反共的觀點的文艺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和駁斥；因為這些所謂文艺，其動機，其效果，都是破壞團結抗日的。按着藝術标准來說，一切藝術性較高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坏的，或較坏的。這種分別，當然也要看社會效果。文艺家幾乎沒有不以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們的批評，也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但是按照藝術科學的标准給以正確的批判，使較低級的艺术逐漸提高成為較高級的艺术，使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艺术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毛澤東：“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89—870頁。

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后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坏，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

同上，第876頁。

（六）因果性

客觀事物的因果關係是極其複雜的，有時是一果多因，有時是一因多果。就是原因也有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內因和外因，主觀原因和客觀原因，等等。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

政权的区域長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現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間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紳階級支持着的各派新旧軍閥，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間进行着繼續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沒有一国有这种現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也沒有一处有这种現象，仅仅帝国主义間接統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現象。这种現象产生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农业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义經濟)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剝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給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产党领导的紅色区域，能够在四圍白色政权包圍的中間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贛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小塊。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紅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觀的情緒。这是沒有找出这种紅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釋的緣故。我們只須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繼續不断的，則紅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紅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經過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貴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兩年資产階級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經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組織，有过工农階級对地主豪紳階級和資产階級的許多經濟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贛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紅軍，也是由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軍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軍隊，例如閻錫山、張作霖的軍隊，

此時便決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紅軍的成份來。第三，小地方民眾政權之能否長期地存在，則決定於全國革命形勢是否向前發展這一個條件。全國革命形勢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不但沒有疑義，而且必然地要作為取得全國政權的許多力量中間的一個力量。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繼續地向前發展，而有一個比較長期的停頓，則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現在中國革命形勢是跟着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的分裂和戰爭，而繼續地向前發展的。所以，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於全國政權的取得。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若只有地方性質的赤衛隊而沒有正式的紅軍，則只能對付挨戶團，而不能對付正式的白色軍隊。所以雖有很好的工農群眾，若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武裝，便決然不能造成割據局面，更不能造成長期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據局面。所以“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第五，紅色政權的長期的存在並且發展，除了上述條件之外，還須有一個要緊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 and 它的政策的不錯誤。

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版，第50—52頁。

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權。二，就會明白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因之，也會明白農村起義何以有現在這樣的全國規模的發展。三，就會明白工農民主政權這個口號的正確。四，就會明白相對於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着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於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五，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

民地中国在无产階級領導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1—102页。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9—290页。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8—619页。

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在今天，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条件，规定了抗日战争是艰难的战争，例如敌人之强，我们之弱，敌人的困难还刚在开始，我们的进步还很不够，如此等等，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

多的，只須加上主觀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難而爭取勝利。這些有利條件，歷史上沒有一個時候可和今天比擬，這就是抗日戰爭必不會和歷史上的解放運動同歸失敗的理由。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44頁。

……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競賽結果，有勝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勝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正確，敗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錯誤。

同上，第479—480頁。

（七）必然和偶然、必然和自由

1. 必然性是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的，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只能預見未來發展的必然方向，而不能機械地規定時日。必然性是客觀規律的強制的傾向。

如問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來，只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真正向前發展了，才能作決定。既然國際上帝國主義相互之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帝國主義和它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一迫切，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一天天擴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戰，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發展起來。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着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着帝國主

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况,便使地主階級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农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貨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国貨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餉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軍隊,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經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禍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禍,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錢开学,許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許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嘩变、学生罢課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4--105頁。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这点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个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机械地規定时日。

同上，第110頁。

客觀现实的行程將是異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給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輪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將來的事实，而將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見，描画輪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毛泽东：“論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52—453頁。

我們承認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会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运动，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錯誤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戰爭情况和戰爭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况和戰爭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偵察手段，繼之以指揮員的聰明的推論和判断，減少錯誤，實現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們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

同上，第480頁。

我們共产党人提出結束国民党一党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个步驟，目前时期，經過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驟，將來时期，經過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團結一切願意参加的階級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綱領之下，为現在的抗日和將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設想，願意或不願意，自覺或不自覺，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則，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过来的。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69—1070頁。

附 录

階級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現他們自己的。他們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針公开告訴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階級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文汇报的資產階級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論）。

2. 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認識，只有認識了必然，才能得到自由，才能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說出来的一句话：沒有把握。为什么沒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沒有規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沒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談到这类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給以詳細分析之后，他就覺得比較地有了把握，願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經過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經驗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虛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問題的人，他就能夠自己做出應該怎样进行工作的結論，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問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體(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現狀)，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質(事情的性質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內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沒有不跌交子的。

毛泽东：“实践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8—279頁。

当着我們剛才开始研究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馬克思主义的知識之間，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轉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轉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馬克思主义。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3頁。

在游击战争已經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領地的方針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認識是必要的，否則游击战争的領導者們全無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地进攻的形勢，

必至惊惶失措，被敌击破。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19页。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

毛泽东同志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3月16日“新中华报”。

当你在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毛主席和海员”，1958年4月16日“人民日报”。

（八）可能和现实

1. 可能性必须依据一定的条件，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问题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

是他們的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二者之間動搖着。這就說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時期他們為什麼參加了革命，及到這一時期之末，他們又為什麼站到蔣介石方面去了。現在的時期，同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的時期有什麼分別呢？那時的中国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現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來，他們拋棄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階級，和地主買辦階級做朋友，得了什麼好處沒有呢？沒有什麼好處，得到的只不過是民族工商業的破產或半破產的境遇。因為這些情況，我們認為民族資產階級的态度，在今天的時局下，有起變化的可能性。變化的程度怎樣呢？總的特点是動搖。但在鬥爭的某些階段，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參加鬥爭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動搖而採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40頁。

為什麼雞蛋能夠轉化為鷄子，而石頭不能夠轉化為鷄子呢？為什麼戰爭與和平有同一性，而戰爭與石頭卻沒有同一性呢？為什麼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東西呢？沒有別的，就是因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條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條件，就沒有任何的一性。

為什麼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直接地聯繫着，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沒有直接地聯繫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終於失敗了呢？為什麼蒙古和中亞細亞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會主義聯繫了呢？為什麼中國的革命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可以與社會主義直接聯繫起來，不要再走西方國家的歷史老路，不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呢？沒有別的，都是由於當時的具體條件。一定的必要的條件具備了，事物發展的過程就發生一定的矛盾，而且這種或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轉化，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9—320頁。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现在也是最大的。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27页。

附 录

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尽、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人民日报”编者按语（1955年6月10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4页。

2.事物发展的方向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有好的可能性，也有坏的可能性。我们应当阻止和准备对付最坏的可能性，争取和加速实现最好的可能性。

（九）在此期间，中国的片面抗战可能向三个方向发展：

第一个方向，结束片面抗战，代以全面抗战。这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但是国民党还没有下决心。

第二个方向，结束抗战，代以投降。这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反对。

第三个方向，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这将是日寇、汉奸和亲日

派无法达到第二个方向的目的，因而实行其破裂中国抗日陣綫的阴谋詭計的結果。他們正在策动这一着。这个危險严重地存在着。

(十)依目前形势看来，国内国际不許可投降主义得势的因素，占着优势。这些因素是：日本坚决灭亡中国的方針使中国处于非战不可的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存在，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多数党员的要求，英、美、法顧慮到国民党投降对于它們利益的損失，苏联的存在及其援助中国的方針，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深切希望(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好好地組織起来，不但將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因素，也將克服停頓于片面抗战的因素。

(十一)因此，从片面抗战轉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爭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 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79—380頁。

我們是否否認亡国危險呢？不否認的。我們承認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兩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們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們和亡国論者不同，我們客觀地而且全面地承認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爭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論者則主觀地和片面地只承認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認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爭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們对于妥协傾向和腐敗現象也是承認的，但是我們还看到其他傾向和其他現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將逐步地占优势，二者在猛烈地斗争着；并指出后者实现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傾向和轉变腐敗現象而努力。因此，我們并不悲觀，而悲觀的人們則与此相反。

毛泽东：“論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48—449頁。

問：由于对于統一的了解不同，国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答：如果只說到可能性的話，那末，團結和分裂兩種可能性都有，要看國共兩黨的態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國人民的態度如何來決定。我們共產黨方面，關於合作的方針，早經講過，我們不但希望長期合作，而且努力爭取這種合作。聽說蔣委員長在國民黨五中全會中也說過，國內問題不能用武力來解決。大敵當前，國共兩黨又都有了過去的經驗，大家一定要長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給長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證，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徹底避免，這就是堅持抗戰到底和實行民主政治。如果能這樣做，那末，就能繼續團結而避免分裂，這是要靠兩黨和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這樣努力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這是我們黨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來的三大政治口號。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做，中國才能避免亡國，并把敵人打出去；除此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毛澤東：“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1939年9月16日），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81—582頁。

在現在時期，敵人如同過去進攻武漢那樣的大規模戰略進攻行動，由於他所受中國過去二年餘的英勇抗戰的打擊，由於他的兵力不足和財力不足，其可能性已經不大了。在這種意義上，抗戰的戰略相持階段基本上已經到來。這種戰略相持階段，即是準備反攻階段。但是第一，我們說相持局面基本上已經到來，並不否認敵人還有某些戰役進攻的可能；敵人現在正在進攻長沙，將來還可能進攻其他若干地區。第二，隨着正面相持的可能之增多，敵人將加重其對於我游擊根據地的“掃蕩”戰爭。第三，如果中國不能破壞敵人占領地，讓其達到確保占領地、經營占領地的目的；又如果中國不能打退敵人的政治進攻，不能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以準備反攻力量，或者國民黨政府竟自動投降；那末，在將來，敵人就仍有大舉進攻的可能。就是說，已經到來的相持局面仍有被敵人和投降派破壞的可能。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1939年10月10日），“毛澤東選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08頁。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25—1026页。

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84页。

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

了发生群众鬧事的可能性。在这个問題上，我們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鬧事的問題。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3頁。

3. 在可能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人的主观活动起决定作用。客观条件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但可能并不等于现实，只有经过人的努力，才能使可能变为现实。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說，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証明。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8頁。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問題。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09頁。

我們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誰也贊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們指出，沒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們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計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爭取最后胜利的唯一

一途徑，而排斥毫無根據的速勝論。我們主張為着爭取最後勝利所必要的一切條件而努力，條件多具備一分，早具備一日，勝利的把握就多一分，勝利的時間就早一日。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縮短戰爭的過程，而排斥貪便宜尚空談的速勝論。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49頁。

戰爭的勝負，固然決定於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僅決定於這些；僅有這些，還只是有了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的能动性。

同上，第467—468頁。

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態。在這裡，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客觀因素具備着這種變化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就需要正確的方針和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的作用是決定的了。

同上，第476頁。

中日戰爭的長期性將表現於在敵則進攻，相持，退却，在我則防禦，相持，反攻，這樣三個階段之中。……

上述三個階段的看法，是依據敵我既存的與將來可能發生的雙方相反對比之具體條件，而作出的一種對於整個戰爭過程的估計，現在並不是事實，而是一種可能的趨勢，要依我之主觀努力，創造出為這種可能趨勢所必要的條件，才能使可能趨勢變為事實。然而依據既存條件，加上正確指導與全民族廣大而堅持的努力，是能够使這種可能趨勢變為事實的。

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華北新華書店1948年版，第20—21頁。

十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識

1. 历史唯物論与历史唯心論是根本对立的。历史唯物論是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組成部分，是观察和研究社会生活唯一科学的理論和方法。沒有或者不用历史唯物論的观点去观察問題就必定要犯錯誤。

共产主义的宇宙觀是辯証唯物論和历史唯物論……

毛澤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81頁。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对社会实践的依賴关系，即認識对生产和階級斗争的依賴关系。

毛澤东：“实践論”(1937年7月)，“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1頁。

在很長的历史时期內，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則由于生产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認識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現近代无产階級的时候，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科学。

同上，第272頁。

当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則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們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矛盾，看出剝削階級

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而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會在各種不同的階級社會中，引出各種不同的社會革命。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5頁。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毛澤東：“評白皮書”(1949年8月11日)，“毛澤東同志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頁。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屬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

同上，第11—12頁。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得很有點象。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觀念可以引起革命，這是典型的歷史唯心論。

“六評白皮書”(1949年9月16日新華社社論)，1949年9月17日“人民日報”。

馬列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和中國革命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這和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對於中國社會條件格格不入的情況是相反的。任何觀念形態，如果不和客觀實際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列主義，也是沒有用的。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

唯物論者。

同上。

附 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們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訓)，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訓傳”及其他关于武訓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嗎？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經学得的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应当重視电影‘武訓傳’的討論”(1951年5月20日
“人民日报”社論)。

2. 物質資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地理环境和人口虽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它們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遼闊的領土、丰富的資源和六亿五千万勤劳勇敢的人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首先，馬克思主义者認為人类的生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在沒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員的資格，同其他社会成員協力，結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質生活問題。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員，則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質生活問題。

毛泽东：“实践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1頁。

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間的矛盾，新旧之間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謝。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0頁。

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同上，第290—291页。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5页。

中国人口广大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斥。……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

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六評白皮書”(1949年9月16日新華社社論)，1949年9月17日
“人民日報”。

過去，人們總以為合作化以後，勞動力一定會過剩。原來已經過剩了，再來一個過剩，怎麼辦呢！在許多地方，合作化的實踐，打破了人們的這種顧慮，勞動力不是過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後，一時感到勞動力過剩，那是因為還沒有擴大生產規模，還沒有進行多種經營，耕作也還沒有精緻化的緣故。對於很多地方說來，生產的規模大了，經營的部門多了，勞動的範圍向自然界的廣度和深度擴張了，工作做得精緻了，勞動力就會感到不足。這種情形，現在還只是在開始，將來會一年一年地發展起來。農業機械化以後也將是這樣。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的農作物的高產量。工業、交通和交換事業的發展，更是前人不能設想的。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也是如此。

毛澤東：“發動婦女投入生產，解決了勞動力不足的困難”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4—675頁。

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我們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在蓬勃地發展着，成績很大，但是，在目前社會大變動的過渡時期，困難問題還是很多的。又發展又困難，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應當解決，也是完全可以解決的。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5頁。

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

热气高，干劲大。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
“红旗”1958年第1期，第3页。

3.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思想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1—272页。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4页。

……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份，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7页。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古统治地位的文化，

則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資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漸地生長了資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漸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現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領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統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論在日本占領区和国民党統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現时中国社会的性質，这就是現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統治的东西來說，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而为这种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同上，第657—658頁。

在階級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階級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現在封建階級有封建主义，資產階級有資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基督徒有基督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近年还有人提倡什么基馬尔主义，法西斯主义，唯生主义，“按劳分配主义”，为什么无产階級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

同上，第680頁。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东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階級服务的，是應該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則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东西，是

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务的。

如我們在第三节中已經提过的話，中国自从发生了資本主义經濟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質，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經濟还是占优势。这种資本主义經濟，对于封建經濟說来，它是新經濟。同这种資本主义新經濟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經濟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們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沒有資本主义經濟，沒有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沒有这些階級的政治力量，所謂新的观念形态，所謂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同上，第688頁。

以社会主义为內容的国民文化必須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經濟的。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們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來說，我們現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經濟，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

同上，第698頁。

一个自命为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須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識。但是現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說，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識，就是階級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却把这个問題弄顛倒了，說什么一切應該从“愛”出发。就說愛吧，在階級社会里，也只有階級的愛，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資产階級的很深的影響。應該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響，很虛心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應該学习文艺創作，这是对的，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3—854頁。

誠然，为着剝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頗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实秋一类人，他們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們在实际上是主張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周作人、張資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們，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們曾說，現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現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同上，第857頁。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見绌，它們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同上，第862頁。

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在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統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义者。

同上，第866頁。

减租之后,农民生产兴趣大增,願意組織如同我們这里的变工队一样的互助团体,三个人的劳动效率抵过四个人。如果是这样,九千万人就可以抵过一亿二千万人。还有两个人抵过三个人的。如果不是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是采取耐心說服、典型示范的方针,那末,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組織在农业生产的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經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創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講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們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土地上了。

毛泽东:“必須学会做經济工作”(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6頁。

随着經济建設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个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过去了,我們將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屆全体會議上的开幕詞(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屆全体會議重要文献”，新华書店1949年版,第5頁。

4. 社会意識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反动的、落后的思想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革命的、进步的思想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革命思想是革命阶级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誠然,生产力、实践、經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誰不承認这一点,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論、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轉过来表現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須承認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

何事情都是一样) 要做, 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 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 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 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 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 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 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 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 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 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 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3—314页。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而经济是基础, 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么, 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 然后, 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 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規定, 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 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6—657页。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 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 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87页。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認識受了許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緣故。我們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將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頑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們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們不能站在社会車輪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后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車。

毛泽东：“实践論”(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3頁。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綫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綫。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綫上的各級指揮員。“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見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軍隊，这个軍隊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01頁。

在我們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綫，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两个战綫，这就是文化战綫和軍事战綫。我們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仅仅有这种軍隊是不够的，我們还要有文化的軍隊，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五四”以来，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到了現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謂“以数量对質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說，反动派有的是錢，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綫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

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內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原因。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49—850页。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同上，第863页。

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09页。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

社会主义劳动組織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資产階級意識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相矛盾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頁。

一張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組織、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毛泽东：“給刘建勋、章国清同志的信”（1958年1月12日），“新聞战綫”1958年第13期，第1頁。

毛泽东主席在談到国内形势的时候指出：經过了偉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全国到处出現了蓬勃兴旺的气象。無論在农业、工业、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建設事业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由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8日），195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附 录

以反浪費反保守为綱，帶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終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設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經過前两个阶段的大爭大辯，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偉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費反保守。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結成丰满的經濟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发展。有些單位对于这个形势認識不足，在运动中忽視思想工作，只算經濟賬，簡單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認真开展群众性的爭辯，不彻底轉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們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絕浪費現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爭既是一个經濟上的斗爭，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爭，既要算經濟

賬，又要算思想賬、政治賬。通過大鳴大放，大爭大辯，不但要反掉浪費，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要通過和結合反浪費反保守的鬥爭，徹底改進幹部和羣眾的關係，提高全體職工羣眾的社會主義覺悟，打破那些妨礙生產力迅速發展的陳規，精簡機構，改善生產管理和勞動組織，改進生產技術，降低生產費用，以便貫徹執行多快好省的方針；促進生產的大躍進。

“反浪費反保守是當前整風運動的中心任務”
(1958年2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

5. 興無滅資，積極樹立共產主義思想，批判一切資產階級思想。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鬥爭。目前共產主義精神已經在我們國蓬勃發展起來了，但清除資產階級思想的工作還是長期的、艱巨的。

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什麼地方呢？在於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鬥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繫起來，在於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

所有這些方針與任務，只有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有實現的可能，因為這是階級鬥爭極端尖銳的表徵，這是人類精神解放絕大的勝利。

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1934年1月)，“蘇維埃中國”，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57年翻印本，第285頁。

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積極精神，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與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和羣眾的聯繫；關心黨和羣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

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上的任务之一。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49页。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0页。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4页。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

……

在现时，毫无疑问，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

談，無疑是很不適當的。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97、699頁。

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產階級藝術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徹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5—876頁。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和教育，應當採取適當的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

.....

中國國民文化和國民教育的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就是說，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83、1084頁。

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想。

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解放社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9年北京4版標準本，第88—89頁。

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要從舊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它就必須清除這個基地。反映舊制度的舊思想的殘餘，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里，不願意輕易地退走的。

毛澤東：“‘嚴重的教訓’一文接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頁。

合作社必須強調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向農民

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毛泽东：“‘張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1頁。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誕生，总是要伴随一場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傳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業，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靜的情况下出現的，它要求我們共产党人向着背上揹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們理解的宣傳教育工作。

毛泽东：“‘一个整社的好經驗’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6頁。

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种办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讓他們表現，而应当讓他們表現，同時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进行适当的批評。毫無疑問，我們应当批評各种各样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着錯誤思想到处泛濫，任凭它們去占領市場，当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頁。

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产階級的世界觀而树立无产階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变是一个根本的轉变，現在多数知識分子还不能說已經完成了这个轉变。我們希望我国的知識分子繼續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觀，逐步地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經起了变化，資产階級思想的經濟基础已經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

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觀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長的时间，我們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

同上，第22頁。

我国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誰胜誰負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長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資产階級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長期存在，作为階級的意識形态，还要在我国長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会忽視必要的思想斗争。

同上，第27頁。

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間，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沒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陣，現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針对着这种情况，現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論是知識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應該努力学习。除了学习專業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沒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沒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須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門都要負責任。共产党應該管，青年团應該管，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管，学校的校長教师更應該管。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覺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儉建国。要使全体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国家現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時間內，团結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創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給我們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們的辛勤劳动。

同上，第22—23頁。

反对自私自利的資本主义的自发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

利益相結合的原則为一切言論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經濟逐步地过渡到大規模合作化經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証。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須根据农民的生活經驗，很具体地很細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簡單的方法。它是要結合着經濟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毛泽东：“‘严重的教訓’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2—124頁。

对青年一定要加强階級教育，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叫他們向优秀的老工人学习。

“毛主席在群众中”，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33頁。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經濟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資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長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領導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沒有看見人民群众象現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揚，意气风发。过去的剝削階級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們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願意帶着花崗岩头腦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識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潰之势已成，則是确定无疑的了。……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付奴隶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現在真正开始統治这块地方了。

毛泽东：“介紹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紅旗”1958年第1期，第3—4頁。

要青年学生去打杂扫地，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啊！我看对青年一定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青年不再輕視劳动；要願意参加体

力劳动，才能建設好我們的国家。

“毛主席在群众中”，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0頁。

附 录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單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現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費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鳴放高潮和整改高潮。……

……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显然是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在思想战綫、政治战綫上的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群众在这个运动中决不满足于克服生活中的鋪張浪費，也决不满足于仅仅要求产量指标的突破。許多企业在辯論了浪費的性質、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問題以后，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造成浪費的責任應該由領導工作人員、技职人員和工人三方面担負，这三方面都必須同时改进。領導工作人員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鑽研业务的毛病；技职人員往往只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規，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創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許多人沒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沒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問題。在許多單位的辯論会上，三方面的人員都同时揭发和批判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打掉了官气、暮气和邪气，資产階級思想受到批判，无产階級思想大大抬头。

“反浪費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1958年2月18日

“人民日报”社論）。

十一 社会基本矛盾

1. 社会的变化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0页。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則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則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同上，第305—306页。

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

盾，是所有有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的各國所共有的東西，對於資本主義說來，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資本主義的這種矛盾，乃是一般階級社會發展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的東西，對於一般階級社會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說來，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當着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來之後，同時也就更進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階級社會中這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普遍性闡發出來了。

同上，第306頁。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我國現在的社会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会制度要優勝得多。如果不優勝，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比較舊時代生產關係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舊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生產力的發展一直是非常緩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間，全國除東北外，鋼的生產一直只有幾萬噸；加上東北，全國的最高年產量也不過是九十多萬噸。在一九四九年，全國鋼產量只有十幾萬噸。但是全國解放不過七年，鋼的生產便已達到四百幾十萬噸。舊中國幾乎沒有機器製造業，更沒有汽車製造業和飛機製造業，而這些現在都建立起來了。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後，中國要向那裏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

但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

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說，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2页。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

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3—314页。

2.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状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时，对生产力发展起促进作用，不适应时起阻碍作用。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在沒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1页。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页。

經過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加以我們提倡生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長了，生产便有恢复的形势了。現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在革命起义过程中荒廢了的土地，而且开发了新的土地。很多的地方組織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以調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組織了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問題。同时，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决然做不到的。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願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們把土地分配給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獎勵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偉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

毛泽东：“我們的經濟政策”(1934年1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26頁。

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剝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們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組織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針。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已得了华北华中各地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說：减租之后，农民生产兴趣大增，願意組織如同我們这里的变工队一样的互助团体，三个人的劳动效率抵过四个人。如果是这样，九千万人就可以抵过一亿二千万人。还有两个人抵过三个人的。如果不是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針，而是采取耐心說服、典型示范的方針，那末，几年之內，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組織在农业生产的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經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創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講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們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經濟工作”(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5—1016頁。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79页。

在过去，束缚边区生产力使之不能发展的，是边区的封建剥削关系，一半地区经过土地革命，把这种封建束缚打破了，一半地区经过减租减息之后，封建束缚减弱了，这样合起来，整个边区就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大半，这是第一个革命。

但是，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

毛泽东：“论合作社”（1943年10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89—890页。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是极好的情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页。

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

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同上,第18—19页。

根据这两个合作社的情况,按照现在的生产条件,就已经多余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过去三个人作的工作,合作化以后,两个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那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

毛泽东:“‘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接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页。

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

剩。原来已經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許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們的这种顧慮，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規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經營，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緣故。对于很多地方說来，生产的規模大了，經營的部門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擴張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將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們設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現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換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設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項事业也是如此。中国的妇女是一种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发掘这种資源，为了建設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4—675頁。

……发展多种經營，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現在的小社和初級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諸种生产資料，还是一种束縛。到了办大社和高級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縛，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經營，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許多大規模的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

毛泽东：“‘諸翟乡把大批兼营小商贩的农民吸引到农业合作中来了’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6頁。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階級与官僚資产階級（大資产階級）的剝削与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一切被束縛的生产力。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解放社編“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27頁。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5日)，
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3. 对中国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做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

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34页。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

作(运鹽)、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鹽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我們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組織成为一支劳动大軍。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同上,第935頁。

有些同志不贊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驟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驟相适应的方針,而这种方針,曾經在苏联証明是正确的。他們認為在工业化的問題上可以采取現在規定的速度,而在农业合作化的問題上則不必同工业化的步驟相适应,而应当采取特別迟緩的速度。这就忽視了苏联的經驗。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資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个五年計劃的时期內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問題,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国家組織的使用机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垦荒在內(三个五年計劃期內,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們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長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絕大的困难,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問題,苏联在建設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經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計劃地领导和發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們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这样兩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門——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現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础上才有使用

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於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面，在我們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於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蘇聯的經驗，在這個問題上也給我們指出了方向，我們的有些同志卻沒有注意，他們老是孤立地互不聯系地去看這些問題。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繫起來想一想，即：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於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們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够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
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24頁。

我們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採取了逐步前進的辦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組織僅僅帶有某些社會主義萌芽的、幾戶為一起或者十幾戶為一起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然後，第二步，在這些互助組的基礎上，仍然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組織以土地入股和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小型帶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然後，第三步，才在這些小型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的基礎上，按照同樣的自願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進一步地聯合起來，組織大型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

同上，第27—28页。

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〇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1955年12月27日），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合作网应当普遍地建立起来，使之成为制度。现在小社多，多有建立合作网的必要，区也应有合作网。将来中等社和大社多了，应当着重区的合作网。我们希望一九五六年，每区每乡都有合作网。那些全乡只建成为一两个大社的地方，乡当然不要建立这种网了。

毛泽东：“‘合作网的制度应当在全国推广’一文按语”（1955年），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9页。

毛泽东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毛泽东主席接着說，我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內和共产党外，都有許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們的疑問已經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們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月25日)，
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4. 經濟基础决定上层建築。政治、国家、政党等上层建築对經濟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

蔣、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們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資本，壟断全国的經濟命脉。这个壟断資本，与国家政权結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这个壟断資本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密切地結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这就是蔣介石反动政权的經濟基础。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解放社編
“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27頁。

这个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們認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們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險。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第31—32頁。

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經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經濟基础已經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識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頁。

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层建筑，屬於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說，归根結底，它是为經濟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

同上，第5頁。

沒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謀独立。廢止国民党一党專政，成立民主的統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軍隊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謀自由、民主和統一。沒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业。沒有工业，便沒有巩固的国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〇年鴉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訴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設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夢，但是一概幻灭了。許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們，他們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問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夢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80—1081頁。

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們現有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保护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

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毛泽东：“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頁。

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党已經胜利地领导了一个偉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專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約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內，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9頁。

这个材料指出了—个真理，就是任何情况混乱的合作社，都是可以整理的。因为加入合作社的都是劳动农民，不管他們各个阶层之間意見怎样不合，总是可以說清楚的。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內，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沒有向群众講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我們知道办社是好事情。但是办起社来，县委、区委、支部都不管我們了。恐怕是嫌我們寨子穷，吃不好，住不好，才不到我們社里来。”所謂混乱，沒有別的原因，就是这样—个原因。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这个材料又提出了—个在落后乡村是否可以建立合作社的問題。回答是肯定的。本文作者所說的这个合作社，就是处在一个落后村。全国約有百分之五左右的落后乡村，我們应当都去建立合作社，就在建社的斗争中去消灭这些地方的落后状态。

毛泽东：“—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67—1168頁。

附 录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綱，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終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設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經過前两个阶段的大爭大辯，群众的覺悟大大提高了。

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偉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結成丰滿的經濟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发展。

“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195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社論)。

5.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

、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維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偉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創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維埃必須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統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創造新的工农的苏維埃文化。

毛泽东：“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苏維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資料編輯委员会1957年翻印本，第282頁。

……我們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份，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經濟，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7頁。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一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於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东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

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同上，第688—689页。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

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經濟。

同上，第656—657頁。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針來說，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們应当努力在工人階級中宣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驟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現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經濟、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階級领导的緣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經濟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說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在現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階級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国民文化領域來說，如果以为現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應該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傳，当作了当前行动綱領的實踐；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場和方法去观察問題、研究學問、处理工作、訓練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針。以社会主义为內容的国民文化必須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經濟的。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們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來說，我們現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經濟，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由于現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階級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現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階級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偉大的同盟軍；这种一部分，虽則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來說，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資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資格去参加的。由于現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階級的領導，因而現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階級文化思想的領導，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領導。但是这种領導，在現阶段是領導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

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現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內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在現時，毫无疑义，應該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傳，加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沒有这种宣傳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將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現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

同上，第697—699頁。

誠然，为着剝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階級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統治階級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頗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資产階級的，这是資产階級的文艺。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实秋一类人，他們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实际上是主張資产階級的文艺，反对无产階級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張資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們，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們曾說，現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階級領導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現在一定是无产階級領導的。資产階級領導的东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1942年5月），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7頁。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苏联革命的觀念形态下組織的”。艾奇遜說对了。这个觀念形态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觀念形态，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产階級的“为以前的外国侵入者所未會帶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資产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馬列主义文化，即科学的社会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社会革命新文化，第一仗打敗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軍閥，第二仗打敗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長征路上的攔阻，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

四仗最后結果了美国 and 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統治及其走狗蔣介石等一切反动派。

“六評白皮書”(1949年9月16日新华社社論),1949年9月17日
“人民日报”。

随着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个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过去了,我們將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

毛澤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一屆全体會議上的開幕詞(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一屆全体會議重要文獻”,新华書店1949年版,第5頁。

我国現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銳的矛盾。現在我国不仅有許多到了学习年齡的兒童沒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學齡的少年和青年也沒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說了。这个严重的問題必須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組織了合作社,因为經濟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組織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們可以自己組織学文化。

毛澤东:“‘莒南县高家柳溝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記工学习班的經驗’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7頁。

6. 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統帥,沒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沒有灵魂。科学、文艺等一定要为政治服务,一切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論調,都是資產阶级的荒謬理論。

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綫。在社会經濟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毛澤东:“‘严重的教訓’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頁。

沒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沒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

个部門都要負責任。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頁。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綫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階級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階級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階級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說，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或多元論，而其实际質就象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馬克思主义的；艺术——資产階級的。”我們不贊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強調到錯誤的程度，但也不贊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文艺是从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来給予偉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和別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較起来，自然有輕重緩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齒輪和螺絲釘，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連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沒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認識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們所說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对階級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須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經過政治，階級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7—868頁。

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觀也并不等于艺术創作和艺术批評的方法。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階級社会中的各个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階級社会中的任何階級，总

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同上，第870—871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想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

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1页。

7. 自觉的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改良种子，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90页。

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6—7页。

要在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中反對官僚主義。現在在不少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中存在着很嚴重的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現象，這種現象的發生和滋長，是與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的官僚主義分不開的。即以中央一級機關來說，許多部門中的許多領導幹部，還僅僅滿足於坐在機關中寫決議，發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層去了解情況和檢查工作，使自己的領導常常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以至在工作中發生了不少的嚴重問題。我們要进行大規模的國家建設，就必須克服官僚主義，密切聯繫人民群眾。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幹部都應該經常地深入下層，檢查工作。如果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克服了官僚主義，下面那些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壞現象，也一定會得到克服的。這些毛病都去掉了，我們的國家計劃建設就一定會成功，人民民主制度就一定會發展，帝國主義的陰謀就一定會失敗，我們就一定能夠取得完全的勝利！

毛澤東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的指示（1953年2月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頁。

現在辦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為了易于辦成，為了使幹部和群眾迅速取得經驗，二、三十戶的小社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種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併。有些地方可以一鄉為一個社，少數地方可以幾鄉為一個社，當然會有很多地方一鄉有幾個社的。不但平原地區可以辦大社，山區也可以辦大社。安徽佛子嶺水庫所在的一個鄉，全是山地，縱橫幾十里，就辦成了一個大規模的農林牧綜合經營的合作社。當然，這種合併要有步驟，要有適當的幹部，要得到群眾的同意。

毛澤東：“‘大社的優越性’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1頁。

對於條件已經成熟了的合作社，就應當考慮使它們從初級形式轉到高級形式上去，以便使生產力和生產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因為

初級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時候，這種半私有制就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人們就要求改變這種制度，使合作社成為生產資料完全公有化的集體經營的經濟團體。生產力一經進一步解放，生產就會有更大的發展。

毛澤東：“‘一個從初級形式過渡到高級形式的合作社’一文接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5頁。

附 錄

整風運動在全國的企业、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里，目前出現了一個新的洪峰。這就是以反浪費和反保守為中心，掀起了了一個新的鳴放高潮和整改高潮。……

從各地區各企业和各機關的情況看來，這次的反浪費反保守運動，同過去历次的增產節約運動有很大的不同。這次運動實際上已經成為反對思想、政治、經濟各方面落后現象的鬥爭，已經形成了一個廣泛地比先進、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在這個波瀾壯闊的運動中，很多束縛群眾積極性和生產力發展的陳規被沖破了，很多長期不得解決的根本性問題順利的解決了，各方面的生產和工作已經有了明顯的迅速的改進。

“反浪費反保守是当前整風運動的中心任務”
(1958年2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

這個聲勢浩大的運動，顯然是一九五七年我國人民在思想戰綫、政治戰綫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產物。正因為這樣，群眾在這個運動中決不滿足於克服生活中的鋪張浪費，也決不滿足於僅僅要求產量指標的突破。許多企业在辯論了浪費的性質、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問題以後，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造成浪費的責任應該由領導工作人員、技職人員和工人三方面擔負，這三方面都必須同時改進。領導工作人員往往有官僚主義、主觀主義、不深入地鑽研業務的毛病；技職人員往往只重業務不重政治，墨守陳規，不善于發動和依靠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工人群眾中也有許多人沒有正確對待個人和

國家的關係，沒有正確解決為誰勞動的問題。在許多單位的辯論會上，三方面的人員都同時揭發和批判了自己的缺點。这样就打掉了官氣、暮氣和邪氣，資產階級思想受到批判，無產階級思想大大抬頭。

同上。

目前的鬥爭既然是一個經濟上的鬥爭，同時又是一個思想政治的鬥爭，既要算經濟賬，又要算思想賬、政治賬。通過大鳴大放，大爭大辯，不但要反掉浪費，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要通過和結合反浪費反保守的鬥爭，徹底改進幹部和羣眾的關係，提高全體職工羣眾的社會主義覺悟，打破那些妨礙生產力迅速發展的陳規，精簡機構，改善生產管理和勞動組織，改進生產技術，降低生產費用，以便貫徹執行多快好省的方針，促進生產的大躍進。

同上。

十二 階級斗争, 国家与革命

(一) 階級斗争, 革命

1. 階級斗争是階級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 是階級社会的发展动力。階級斗争有多种形式, 政治斗争是階級斗争的最高形式。

社会的变化, 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 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阶级之间的矛盾, 新旧之间的矛盾,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 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毛泽东: “矛盾论”(1937年8月), “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第290页。

在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 阶级斗争不能消灭, 也无法消灭, 企图根本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歪曲的理论。

毛泽东: “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 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 第81页。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 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 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 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 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 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 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 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

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 “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第617页。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

同上，第619—620页。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

陵之西南兩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說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須加勁作政治斗争,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5頁。

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漲而动摇。但是現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現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項,还要待农民的經濟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們对农民应该领导他們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經濟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貧农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經濟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結果。

同上,第34頁。

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須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經過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8頁。

附 录

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針公开告訴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勢利导,夺取胜利。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論)。

2. 革命不是綉花，而是一个階級推翻另一个階級的暴烈行动。在階級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动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获得政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画綉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样温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階級推翻一个階級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須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紳权。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8—19页。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几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內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沒有这个变动，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同上，第17页。

当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則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們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矛盾，看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經濟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間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

的階級社會中，引出各種不同的社會革命。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5頁。

……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共產黨人必須揭露反動派所謂社會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等等欺騙的宣傳，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革命論，使人民懂得，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類的歷史和蘇聯的勝利，都証明了這個科學的真理。

同上，第322—323頁。

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當然還有別的矛盾，例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反動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這些矛盾的鬥爭及其尖銳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偉大的近代和現代的中國革命，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之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25—626頁。

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並且將必然取得勝利。“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是中國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為的一句俗話。各國反動派也就是這樣的一批蠢人。他們對於革命人民所作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難道沙皇和蔣介石對於革命人民的種種迫害，不就是對於偉大的俄國革命和偉大的中國革命起了這樣的促進作用嗎？

毛澤東：“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6日)，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5頁。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

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对的，不論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9頁。

3. 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領導力量，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軍。統一战綫問題、武装斗争問題、党的建設問題是我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問題。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問題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領導了全部中国革命。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須由无产阶级領導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長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沒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領導权，被买办豪紳阶级夺取了領導，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

毛泽东：“中国的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0頁。

……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沒有或違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領導，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組織性，而且也最能虛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經驗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領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狹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7頁。

……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統

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8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53页。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五四运动”（1939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46页。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

毛泽东：“在管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解放社编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87—88页。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

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沒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們是工业經濟的生产者。沒有近代工业工人階級，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們是中国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沒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喚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85頁。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階級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資产階級和民族資产階級也应当贊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员会第一屆第二次會議閉幕詞”(1950年6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员会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頁。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槍杆子里面出政权”。我們的原則是党指揮槍，而决不容許槍指揮党。但是有了槍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軍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来的。槍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說的观点看来，軍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誰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誰就应有強大的軍队。……俄国共产党的槍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們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階級斗争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槍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裝的資产階級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們可以說，整个世界只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5頁。

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軍，組織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同上，第532頁。

經驗告訴我們，中国的問題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認識这一点，对于今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是有利益的。抗日战争中全民武装反抗的具体事实，將教育全党进一步地認識这个問題的重要性，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綫。我們这次會議又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更給了一个明确的方針。这对于有些党员願作党的組織工作，願作民众运动的工作，而不願研究战争和参加战争，有些学校沒有注意鼓励学生上前綫，等等現象，还是一剂对症的良葯。大部分中国領土內党的組織工作和民众运动工作是直接联系于武装斗争的，沒有也不能有單独的孤立的党的工作或民众运动。一部分距离战区較远的后方（如云南、貴州、四川）和一部分敌人控制的地区（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党的組織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綫的要求。一句話，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軍事，准备打仗。

同上，第532—533頁。

我們党的历史，可以說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說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說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沒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詞”（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95頁。

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

綫，也就不能了解我們的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綫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十八年來，我們黨是逐步學會了並堅持了武裝鬥爭。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十八年來，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塞維克化，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的，沒有武裝鬥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

同上，第600—601頁。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道路，是在這樣同中國資產階級的複雜關聯中走過的。這是一個歷史的特點，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過程中的特點，而為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所沒有的。再則，由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占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不但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基本的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產階級的參加；並且規定了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我們黨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武裝鬥爭的歷史。

同上，第595頁。

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懂得：他們自己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是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他們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綫。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中，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軍，這是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所已經證明了的根本規律之一。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0頁。

党的建設的过程,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維克化的过程,也同样是有三个阶段的特点的。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綫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終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統一战綫、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設三个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統治地位的成份,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沒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騙,而使革命遭到失敗。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組織是发展了,但是沒有巩固,沒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沒有給予必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經驗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沒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詭計的包围中,但是沒有警覺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沒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还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結合。这就是党的建設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經驗,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規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們的干部更多地領会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更多地学会了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結合,我們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組織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們的党,但是党驅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創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

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偉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經驗，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沒有統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沒有能够在这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只在到了遵义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塞維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張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基础。这就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經过去了三年，这三年的斗争，是有非常偉大的意义的。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經驗，凭借着党的組織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間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統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而且进行了偉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組織已經从狹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詞”（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01—603頁。

所以，統一战綫問題，武装斗争問題，党的建設問題，是我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問題。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問題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領導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們丰富的經驗，失敗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縮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經驗，我們已經能够对这三个問題做出正确的結論来了。就是說，我們已經能够正确地处理統一战綫問題，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問題，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設問題。也就是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战綫，武装斗争，党的建設，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

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国革命的偉大成績。

同上，第597頁。

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綫和武裝斗爭，是战胜敌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綫，是实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綫。而党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綫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鋒陷陣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同上，第604頁。

十八年来，党的建設过程，党的布尔塞維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綫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統一戰綫問題、武裝斗爭問題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論断，很明显地，已經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証明了。倒轉來說，党更加布尔塞維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綫，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統一戰綫問題和武裝斗爭問題。这一論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証明了。

同上，第596頁。

(二) 国家。无产阶级專政。过渡时期的阶级斗爭

1. 国家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是指政权的构成形式。我們国家的国体是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国家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

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們不仁”。正是这样。我們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們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11页。

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69页。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同上，第670页。

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54页。

……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68页。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

揮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同上,第670頁。

我們的主張是什么呢?我們主張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們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56頁。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組織,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針,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会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同上,第1058頁。

民主和集中之間,並沒有不可越过的深溝,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們所要求的政府,必須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經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經民意通过的方針,其执行必能順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別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質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

主集中制。

毛泽东：“和美国記者貝特蘭的談話”（1937年10月25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73頁。

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問題上表現动摇，是因为他們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們以为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自由多。他們要求实行西方的兩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謂兩党制不过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种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劳动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义国家也容許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层建筑，屬於政治这个范疇。这就是說，归根結底，它是为經濟基础服务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頁。

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絕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紀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統一体的兩個矛盾着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应当片面地強調某一个側面而否定另一个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須用社会主义的紀律約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同上，第5—6頁。

2. 无产階級在革命胜利以后，必須建立自己的国家，实行无产階級專政。我們的国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这个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无产階級專政。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專政。專政的作用就是压迫国内反动階級和防御国外敌人可能的侵略。

“你們独裁”。可爱的先生們，你們講对了，我們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实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讓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現阶段，是工人階級，农民階級，小資产階級和民族資产階級，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及共产党的領導之下，團結起来，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产階級以及代表这些階級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們实行專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乱說乱动。如要乱說乱动，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則实行民主制度，給予言論集会結社等項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給人民，不給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毛泽东：“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1日)，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10頁。

对于反动階級和反动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坏，不搗乱，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們如果不願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們劳动。也对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对俘虏軍官們已經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說是“施仁

政”罢，但这是我們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們所强迫施行的，和我們对于革命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論。

同上，第11—12頁。

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項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权，他們的政权就会被內外反动派所推翻，內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同上，第13—14頁。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証明，沒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經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証。

同上，第14頁。

总结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經過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这个專政必須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們的公式，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

同上，第16頁。

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对敌人說来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时期內，不讓他們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們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們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們成为新人。对人民說来則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們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

法向他們进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员会第一屆第二次會議閉幕詞”(1950年6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员会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頁。

一切事实都証明：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較之資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極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發揮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一屆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會議上的開幕詞(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一屆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頁。

我們的国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这个專政是干什么的呢？專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內部的反动階級、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剝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設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間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將他們判罪，在一个时期內不給地主階級分子和官僚資产階級分子以选举权，不給他們发表言論的自由权利，都是屬於專政的範圍。为了維護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盜窃犯、詐騙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須实行專政。專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顛复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出現的时候，專政就担負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間的矛盾的任务。專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將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頁。

誰来行使專政呢？当然是工人階級和在它領導下的人民。專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內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間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

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專政是有原則区别的。在人民內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宪法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論、出版、集会、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們的宪法又規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須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員必須为人民服务。我們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資产階級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們的專政，叫做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階級團結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階級、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分子实行專政。所謂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同上，第4頁。

我們历来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类不同性質的矛盾，采用專政和民主这样兩種不同的方法。

同上，第8頁。

附 录

在国际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众，必須鎮压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达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則是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产党領導之下对于反革命的專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乱說乱动。……在內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錯誤缺点的批評，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們的制度。而这些，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則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縱反革命乱說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專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們的制度。資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資产階級專政，不許革命人民乱說乱动，只叫他們規規矩矩。剝削者和反革命者無論何

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剝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專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則总是理亏的。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人民日报”編者按語（1955年5月24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8—69頁。

胡风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見。这是确实的，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这种自由。

同上，第68頁。

3. 过渡时期的階級斗争始終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兩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在經濟战綫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必须进行政治战綫、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斗争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反对修正主义是目前国内外迫切的任务。

有些同志，从資产階級、富农、或者具有資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場出发，錯誤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問題。他們認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險，他們劝我們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馬”。他們向我們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險。”我們認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險。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馬，一个要上馬，却是表現了兩条路綫的分歧。大家知道，我們已經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給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資产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經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經消灭了。現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資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几年中間，农村中的資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經到处出現，許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許多貧农，則因为生产資料不足，仍然

处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讓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兩极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繼續处于貧困地位的农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决困难。向資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將对我們不滿，因为我們如果不想走資本主义的道路的話，就永远不能滿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繼續巩固下去嗎？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們認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們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險。劝我們“下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問題上是完全想錯了。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0—32頁。

富裕中农說：“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鷄毛能上天。”鷄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兩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經濟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們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們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強大的，他們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兩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貧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兩三年內，看誰增产：是單干的富余中农增产呢，还是貧农和下中农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貧农和下中农組成的合作社，同單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貧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爭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們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們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

持合作社。

毛泽东：“‘誰說鷄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7—778頁。

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毛泽东：“‘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3頁。

山西省解虞县三婁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124頁。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綫。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同上，第123頁。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7頁。

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於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思想鬥爭同其他的鬥爭不同，它不能採取粗暴的強制的方法，只能用細致的講理的方法。現在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中，具有優勝的條件。

同上，第27頁。

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應當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而應當讓他們表現，同時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適當的批評。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着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

同上，第29頁。

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挂着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面的鬥爭。而在这个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

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同上，第29—30頁。

附 录

在一个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对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間，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讓魍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說，共产党看出了資产階級与无产階級这一場階級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文汇报的資产階級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
“人民日报”社論)。

4. 階級、政党、国家將來是要逐步衰亡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条件。由于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階級还存在，所以我們現在不但不能消灭国家权力，相反必須巩固和加强我們的国家权力，巩固和加强无产階級專政，这正是为將來消灭階級、政党、国家，实现共产主义創設条件。

巩固无产階級的專政或人民的專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專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領導的革命軍，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7頁。

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階級消灭了，作为階級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將因其丧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們和資产階級政党相反。他們怕說階級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們則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創設条件，

而努力奮鬥。共產黨和人民專政的國家權力，就是這樣的條件。不承認這一條真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沒有讀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剛才進黨的青年同志們，也許還不懂得這一條真理。他們必須懂得這一條真理，才有正確的宇宙觀。他們必須懂得，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他們懂得辯證法，他們看得遠些。資產階級所以不歡迎這一條真理，是因為他們不願意被人們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國民黨反動派被我們所推翻，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被我們及各國人民所推翻，對於被推翻者來說，這是痛苦的，不堪設想的。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人，則不是什麼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工作，創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于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1日)；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2頁。

“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為什麼？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保護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

同上，第10頁。

(三) 戰爭與和平

1. 戰爭是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階級和階級、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互相鬥爭的最高形式。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行動，自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5页。

（六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六四）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8—469页。

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同上，第469页。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

治原則即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在軍事上實行起來，就是以軍事力量保衛祖國，驅逐日寇。為達到這個目的，在軍隊本身的行動上，就表現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滅敵人的力量。

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97頁。

2. 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而且積極地參加正義戰爭。

古人說：“春秋無義戰。”于今帝國主義則更加無義戰，只有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有義戰。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來反對壓迫者的戰爭，都是義戰。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義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人民的革命是義戰。中國的反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義和團戰爭，辛亥革命戰爭，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戰爭，今天的抗日和討伐賣國賊的戰爭，都是義戰。在目前的全中國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義戰將遍于全中國，全世界。凡義戰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義戰都是應該使之轉變成為義戰的，這就是列寧主義的路綫。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56頁。

歷史上的戰爭，只有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兩類。我們是擁護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的。一切反革命戰爭都是非正義的，一切革命戰爭都是正義的。人類的戰爭生活時代將要由我們之手而結束，我們所進行的戰爭，毫無疑義地是屬於最後戰爭的一部分。但是我們所面臨的戰爭，毫無疑義又是最大的和最殘酷的戰爭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殘酷的非正義的反革命的戰爭，迫臨在我們的頭上，我們

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问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7—168页。

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强迫人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作战，违反人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路易乔治一类的政府就是需要的。路易乔治压迫英国人民不许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话，任何表现这种民意的机关和集会都不许存在；即使仍然有国会，那也是奉令通过战争预算的国会，也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的机关。政府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不一致，就产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绝对集中主义的政府。可是历史上还有革命的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战争、俄国的革命战争、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战争。在这一类的战争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赞成战争，因为人民极愿意进行这种战争；政府的基础建设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引导人民发表意见，以便积极地参加战争。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74页。

……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

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

毛泽东：“論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47頁。

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

同上，第465—466頁。

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它对于战争的态度必然是鲜明的两种态度：（1）坚决地不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对于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因此，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2）积极地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例如，十三年以前，援助中国人民的北伐战争；一年以前，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抗德意的战争；两年以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几个月以来，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及还必然地会援助将来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中间可能发生的人民解放的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战争，还必然地会援助有利于保卫和平的战争。关于这一点，苏联过去二十二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今后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

毛泽东：“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85—586頁。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

們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页。

3. 正义的战争必然胜利，非正义的战争必然失败。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唯武器论”的观点是错误的。

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

……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37—439页。

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同上，第459页。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

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万万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吓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01頁。

敵人軍事力量的優勢，這只是暫時的現象，這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也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而蔣介石戰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占着優勢。人民解放軍的戰爭所具有的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年12月25日），解放社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9年北京4版標準本，第19—20頁。

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着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接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1946年8月），“毛澤東同志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頁。

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吓人的——只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并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同上，第17—18頁。

毛主席說：帝國主義者的壽命不會很長了，因為他們盡做壞事，專門扶植各國反人民的反動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軍事基地，以原子戰爭威脅和平。這樣，他們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將要對他們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國主義者目前還

是在活着；他們依然在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橫行霸道。他們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壓迫他們本國的人民群眾。毛主席說：這種局面必需改變。結束帝國主義主要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務。

毛主席巡視大江南北回京後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重要談話，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報”。

4. 戰爭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要消滅戰爭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美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

根據歷史事實與列寧的學說，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極端不平衡的，因此，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毛澤東：“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1939年9月14日），
“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436頁。

帝國主義的本性是掠奪，帝國主義國家在“和平”時代的政策也無時不是為了掠奪。但如果一些帝國主義國家的掠奪政策遇到了另一些帝國主義國家的阻礙而不能用和平方法冲破這種阻礙時，就使用戰爭方法去冲破這種阻礙，以便繼續其掠奪政策。所以，掠奪——這就是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的政治目的。

同上，第487頁。

“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一點也不錯。目前的戰爭發展到世界大戰之間，是不會間斷的，人類的戰爭災難不可避免。為什麼又說這次戰爭接近於永久和平？這次戰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已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的基礎上發生的，由於這種總危機，逼使各資本主義國家走入新的戰爭，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國家從事於新戰爭的冒險。我們可以預見這次戰爭的結果，將不是資本主義的獲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潰。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4—465頁。

人類一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便到達永久和平的時代；那時候便再

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

同上，第465頁。

日本帝国主义处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是决不放松其进攻和镇压的，它的帝国主义本质规定了这一点。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

同上，第498—499頁。

英、美、法各国政府，并无诚意制止大战的爆发；相反，它们是促成了大战的爆发。因为它们拒绝同苏联妥协，拒绝同苏联订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互助条约，这就证明它们只愿意战争，不愿意和平。谁也知道，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拒绝了苏联，就是拒绝了和平。

毛泽东：“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1939年9月28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84頁。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海军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总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反动派不想进攻苏联。苏联是世界和平的

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時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17页。

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与暂时的。危机就象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这种情况，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计划，像野兽一样，向欧、亚两洲及其他地方乱窜；集合各国的反动势力，那些被人民唾弃的渣滓，组成帝国主义及反民主的阵营，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一切民主势力，准备战争，企图在将来，在遥远的时间内，有一天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败民主力量。这是一个狂妄的计划。全世界民主势力必须打败这个计划，也完全能够打败它。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22页。

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

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来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

毛泽东主席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重要谈话，
“新华半月刊”1960年第10号，第2页。

5. 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7页。

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6页。

我們是战争消灭論者，我們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經過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槍杆子必須拿起槍杆子。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5頁。

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綿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偉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讓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們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們民族的數千年历史已經証明，現在再来一次偉大的証明。

毛泽东同志在紀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陣亡將士大会上的演說（1939年3月12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指南”第4册，解放社1939年版，第3頁。

我們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棄它那种橫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謀，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鮮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們好战，我們願意立即停战，剩下的問題待將來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願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願意打多少年，我們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願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議上的指示（1953年2月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議文件”，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頁。

在这里，我認为有必要喚起人們的注意，这即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敗，是不会甘心的。他們还会要互相勾結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們的走狗鑽进中国內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搗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們决不会忘記这一項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們自己的力量，封鎖中国的海港。只要他們还有可能，他們就

会这样做。再則，假如他們还想冒險的話，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們均必須充分地估計到。我們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們的瘋狂的报复陰謀的警惕性。誰要是放松这一項警惕性，誰就將在政治上解除武裝，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須團結起来，坚决彻底干淨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項反对中国人民的陰謀計劃。中国必須独立，中国必須解放，中国的事务必須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来处理，不容許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

毛泽东主席在新政治协商會議筹备会上的講話
(1949年6月15日)，1949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我們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結，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們还要繼續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还要作最后的掙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們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搗乱，他們將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們務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一屆全体會議上的開幕詞(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一屆全体會議重要文獻”，新华書店1949年版，第4頁。

搗乱，失敗，再搗乱，再失敗，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邏輯，他們决不会違背这个邏輯的。这是一条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們說“帝国主义是很凶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灭亡。

毛泽东：“評白皮書”(1949年8月11日)，“毛泽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1頁。

最近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进行間諜活动，被苏联击落，苏联人做得很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虛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証明了这

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經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說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

毛泽东主席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重要談話，
“新华半月刊”1960年第10号，第2頁。

6.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堡壘。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統治必須結成广泛的統一战綫。

……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一貫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就是以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联系着的。在过去，苏联不但为了自己建設社会主义需要和平，需要巩固苏联和世界各国間的和平关系，不使发生反苏战争；而且需要制止各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制止各所謂民主国家挑撥战争的行为，需要尽量地延緩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爭取世界範圍內的和平。

毛泽东：“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1939年9月28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83頁。

以偉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是保証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壘，是一切不願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把侵略和战争的矛头指向阿拉伯民族，指向独立的叙利亞。这种侵略企图有导向世界战争的危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亞人民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对侵略者的严正警告。全世界人民都应当警觉起来，为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毛泽东：“在莫斯科机场上的講話”（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論”，人民日报出版社1960年版，第2頁。

毛主席……指出：我們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們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綫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毛主席說，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

毛泽东主席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重要談話，
“新华半月刊”1960年第10号，第1頁。

毛主席認為：南朝鮮人民和土耳其人民的這種鬥爭，表明亞洲各國受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風暴，將會有更大的興起。這個鬥爭對於非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正義鬥爭都將是一種支持。毛主席說，全世界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都是互相支持的。毛主席感謝非洲朋友們對於中國人民的深厚友情，祝賀中國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偉大團結，並且確信在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共同鬥爭中，一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同上。

毛主席說，中國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樣，長期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依靠自己的團結，依靠各國人民的支援，進行了長期艱苦的鬥爭，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現在正在建設着自己的國家，改變着“一窮二白”的面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好，因此需要時間，需要和平，需要朋友。毛主席說，古巴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帝國主義以及他們而走狗則是我們的共同敵人，但是他們的人數很少。毛主席說，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國人民的鬥爭。毛主席對古巴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英勇鬥爭表示欽佩。毛主席說，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鬥爭幫助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的鬥爭也幫助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國的人民。人民是決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團結和鬥爭，必能戰勝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同上，第1—2頁。

毛主席說，當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是美帝國主義，在很多國家有它的走狗。帝國主義所支持的人，正是廣大人民所唾棄的人。蔣介石、李承晚、岸信介、巴蒂斯塔、賽義德、曼德列斯之流，或者已經被人民所推翻，或者將要被人民所推翻。這些國家的人民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和其它帝國主義的走狗，也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毛主席說，日本人民正在行動起來，現在廣大的日本人民正在舉行比過去規模更大的示威，反對岸信介政府同美帝國主義簽訂的

侵略性的軍事同盟條約，中國人民堅決支持日本人民的這一鬥爭。毛主席說，世界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都得到並將繼續得到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堅決支持。毛主席說，帝國主義的壽命不會很長了，他們做盡了壞事，全世界一切受壓迫的人民決不會饒恕他們。毛主席說，為了戰勝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必須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綫，必須團結不包括敵人在內的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繼續進行艱巨的鬥爭。

同上，第2頁。

帝國主義最怕的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覺悟，怕世界各國人民的覺悟。我們要團結起來把美帝國主義從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趕回它的老家去。

同上。

7. 目前形勢的特点是東風壓倒西風。只要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我們和全世界人民就一定要將它們從地球上消滅干淨。

我認為現在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世界上現在有兩股風：東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点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壓倒的優勢。

毛澤東同志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同志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頁。

世界的風向變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鬥爭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現在全世界共有二十七億人口，社會主義各國的人口將近十億，獨立了的舊殖民地國家的人口有七億多，正在爭取獨立或者爭取完全獨立以及帶有中立傾向的資本主義國家人口有六億，帝國主義陣營的人口不過四億左右，而且他們的內部是分裂的。那里會發生“地震”。現在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

是东风压倒西风。

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留苏学生的讲话(1957年11月17日),
“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6—27页。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所说的,国际形势的总的特点是,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195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
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在许多国家培养它的走狗,这些走狗是本国人民所不喜欢的。日本的岸信介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有识爱国人士,也对岸信介的反动政策表示不满。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规模宏大的斗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人民在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中,觉悟一天天提高,觉悟的人越来越多。毛主席说,日本人民是很有希望的。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日本人民也支持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毛泽东主席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重要谈话,
“新华半月刊”1960年第10号,第2页。

帝国主义除了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对国内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迫害以外,还指望着战争。但是他们能够从战争中指望什么呢?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出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和东方出现了更多的革命。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页。

在我們中蘇兩個偉大的國家的合作之下，我相信，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是要被粉碎的。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們中蘇兩國的偉大合作下，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沒有不能被粉碎的。它們一定要被徹底粉碎。只要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我們和全世界人民就一定要將它們從地球上消滅干淨！

毛澤東同志在蘇聯駐我國大使館慶祝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定五周年舉行的招待會上的講話（1955年2月14日），“毛澤東同志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30頁。

現在世界各國的人們都在談論着會不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也要有精神準備，也要有分析。我們是堅持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也不要害怕。我們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同對待一切“亂子”的態度一樣，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蘇聯，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九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全部崩潰。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頁。

十三 人民內部矛盾

1. 分清敵我革命的首要問題。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一切混淆這兩類矛盾的看法，都是完全錯誤的。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3月），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頁。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給予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1日），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10頁。

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

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敵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頁。

有右傾思想的人不分敵我，認敵為我。廣大群眾認為是敵人的人，他們卻認為是朋友。有“左”傾思想的人則把敵我矛盾擴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內部的矛盾也看作敵我矛盾，把某些本來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

同上，第18頁。

2. 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痺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

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人民內部的矛盾不

是現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有着不同的內容。在我国現在的条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农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农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眾之間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說来，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頁。

工人階級的利益同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要开展民族革命，对于民族革命的先鋒队不給以政治上、經濟上的权利，不使工人階級能够拿出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賊，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民族資產階級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那末，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廢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財產，并不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資本家，只要他不贊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賊，我們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資間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資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納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階級。

毛泽东：“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54頁。

工农之間，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異，它們的差異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階級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資間的矛盾；它們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漸地解决这个矛盾。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5頁。

共产党內正确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說，在階級存在的时候，这是階級矛盾对于党內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階級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訴我們：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們党內許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張国焘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們党內的正确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沒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錯誤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錯誤，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須对于錯誤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須充分地給犯錯誤的同志留有自己覺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錯誤的人坚持錯誤，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經濟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資產階級統治的城市殘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統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們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同上，第323—324頁。

——在我們国家里，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

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不同。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着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是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這個政策，那末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頁。

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痺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這種情況，在社會主義國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暫時的現象。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現的那種範圍相當寬廣的對抗行動，是因為有內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原故。這是一種特殊的也是暫時的現象。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動派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挑撥離間，興風作浪，企圖實現他們的陰謀。匈牙利事件的這種教訓，值得大家注意。

同上，第8頁。

3. 人民內部矛盾是推動我國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正確地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勝利的基本保證。

我們的國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

革命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迅速地改變了舊中國的面貌。祖國的更加美好的將來，正擺在我們的面前。人民所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國的六億人民正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地進行着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但是，這並不是說在我們的社會里已經沒有任何矛盾了。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頁。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對立面又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對於任何一個具體的事物說來，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因而是相對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這個規律，列寧講得很清楚。這個規律，在我國，懂得的人逐漸多起來了。但是，對於許多人說來，承認這個規律是一回事，應用這個規律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又是一回事。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着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着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這樣，就有必要在我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幹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並且懂得採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

同上，第9—10頁。

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面歡迎新制度，一面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

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繼續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經驗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們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兩类矛盾的界綫，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場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們的經濟，发展我們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較順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同上，第13頁。

4.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决。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必須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法。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須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則。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則，他們不了解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毛泽东：“矛盾論”(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9頁。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

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页。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說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同上,第3页。

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问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們寬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須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36页。

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說,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那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說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

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並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決地打倒他們。對於統一戰綫中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有聯合，有批評，有各種不同的聯合，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他們的抗戰，我們是贊成的；如果有成績，我們也是贊揚的。但是如果抗戰不積極，我們就應該批評。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動的道路，那我們就要堅決反對。至於對人民群眾，對人民的勞動和鬥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贊揚。人民也有缺點的。無產階級中還有許多人保留着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后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鬥爭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點錯誤作鬥爭，使他們能夠大踏步地前進。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只要不是堅持錯誤的人，我們就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敵視他們。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鬥，去掉落后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0—851頁。

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响（這個影响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內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並繼續前進，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發展。

我們在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

對於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後，只要

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他們如果不願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並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對俘虜軍官們已經做過的那樣。這也可以說是“施仁政”罷，但這是我們對於原來是敵對階級的人們所強迫施行的，和我們對於革命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並論。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1日)，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12頁。

在國內，我們必須團結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必須鞏固我們這個已經建立的偉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統一戰綫。不論什麼人，凡對於這個革命統一戰綫的鞏固工作有所貢獻者，我們就歡迎他，他就是正確的；凡對於這個革命統一戰綫的鞏固工作有所損害者，我們就反對他，他就是錯誤的。要達到鞏固革命統一戰綫的目的，必須採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採取這種方法時所用的標準，主要是我們現時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綱領。我們在这次會議中，即根據共同綱領，採取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是推動大家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國家內全體革命人民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確的方法。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並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對人民說來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這種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都採用這種方法。

毛澤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閉幕詞”(1950年6月23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8頁。

附 录

胡风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見。这是确实的，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这种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評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无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一个社会，無論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兩种人們、兩种意見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見克服落后的意見，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只有充分地发揚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群众，必須鎮压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达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輿論一律”对于他們的不方便。他們感到不方便，正是我們的目的，正是我們的方便。我們的輿論，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內部，允許先进的人們和落后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報紙、刊物、講壇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們，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須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則是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产党領導之下对于反革命的專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乱說乱动。这里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問題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詞；有些糊塗的人們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論調之后，也好像覺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輿論一律”，或者說，“沒有輿論”，或者說，“压制自由”，豈不是很难听的么？他們分不清楚人民的內部和外部兩個不同的范疇。在內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 and 政府的錯誤缺点的批評，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們的制度。而

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行为。在外部，放縱反革命乱說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專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們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專政，不許革命人民乱說乱动，只叫他們規規矩矩。剝削者和反革命者無論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剝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專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則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說：“絕大多數讀者都在某种組織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們在人民內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說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錯誤的。“絕大多數讀者都在某种組織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沒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長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將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剝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結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內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結。胡风所說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們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經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們認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沒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長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多么难受。一句話，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們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人民日报”網者按語（1955年5月24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8—70頁。

5. “团結——批評——团結”，即从团結的愿望出发，經過批評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是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唯一正确的原則。

我們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兩条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发，不講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

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一個人發了闌尾炎，醫生把闌尾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為一個好同志。這個工作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用魯莽的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29—830頁。

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這些缺點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對於人民，基本上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

……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3—874頁。

中央認為應使幹部對於黨內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時對於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在作結論時應取寬大的方針，以便一方面，徹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另一方面，能夠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錯誤路線和李立三錯誤路線的大鬥爭，這些鬥爭是完全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

点，我們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問題，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責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錯誤的內容，当时錯誤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問題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这是我們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41—942頁。

我們主張有领导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說，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是非的辨別問題，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們不信教。不能强制人們放棄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們相信馬克思主义。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帶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維持，这是人們的常識所了解的。这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相輔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維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行政命令，在許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評——团结”。講詳細一点，就是从团结的願望出发，經過批評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們的經驗，这是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們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內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間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馬克思主义思想之間的矛盾。“左”傾教条主义者从前

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页。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

們历来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決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採用專政和民主這樣兩種不同的方法。這個意思，在我們黨的過去的許多文件里和黨的許多負責人的言論里，曾經說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里曾經說過：“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里，又說過：“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並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對人民說來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這種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過去我們已經多次講過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問題，並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這樣做的，很多幹部和人民都在實際上懂得這個問題。為什麼現在又有人覺得這是一個新問題呢？這是因為過去國內外的敵我鬥爭很尖銳，人民內部矛盾還不像現在這樣被人們注意的原故。

同上，第8—9頁。

對於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應該採取什麼方針呢？對於明顯的反革命分子，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分子，事情好辦，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就行了。對於人民內部的錯誤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這些思想，不允許這些思想有任何發表的機會，行不行呢？當然不行。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讓發表錯誤意見，結果錯誤意見還是存在着。而正確的意見如果是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如果沒有見過風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勝仗。因此，只有採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才能真正發展正確

的意見，克服錯誤的意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同上，第28—29頁。

6. 整風運動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最有效的方法。

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7頁。

為了使黨政軍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開展明年的對敵鬥爭和生產運動，各根據地黨委和軍政領導機關，應準備於明年陰曆正月普遍地、無例外地舉行一次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的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軍隊方面，重新宣布擁政愛民公約，自己開檢討會，召集居民開聯歡會（當地黨政參加），有損害群眾利益者，實行賠償、道歉。群眾方面，由當地黨政和群眾團體領導，重新宣布擁軍優抗公約，舉行熱烈的勞軍運動。在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的運動中，徹底檢查軍隊方面和黨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點錯誤，而於一九四四年堅決改正之。以後應於每年正月普遍舉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讀擁政愛民公約和擁軍優抗公約，再三再四地將各根據地曾經發生的軍隊欺壓黨政民和黨政民關心軍隊不足的缺點錯誤，實行公開的群眾性的自我批評（各方面只批評自己，不批評對方），而徹底改正之。

毛澤東：“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1943年10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16頁。

大家明白，我們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黨的黨員，剩下的不過數萬人，而我們現在的黨員是一百二十多萬，其中大多數是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他們有很可愛的革命積極性，並願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但是，他們是帶了他們原來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入黨的。這種情形，就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黨的黨員中也是存在着的。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矛盾，一個絕大的困難。在這

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們还能顺利地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們在大量干部中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这个矛盾——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我們的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空前统一地（不是完全统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前进了。在今后，我們党还会、也还应该有更更大的发展，而我們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下更好地掌握将来的发展了。

毛泽东：“論军队生产自給，論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108頁。

为了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一个生气勃勃的整风运动。这就是在城市和农村中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重大政策、党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人民的生活福利等項問題，用摆事实講道理的方法，有领导地自由地展开全民性的大辯論，用以正确地解决在人民内部实际存在而为当前所必需解决的各项矛盾問題。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經取得巨大的胜利。凡是这样做了的地方，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增長，錯誤思想迅速澄清，工作中的缺点迅速克服，人民内部的团結迅速加强，劳动紀律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我們正在六亿人口中分期分批地推行这个人民自我教育运动，大概再有几个月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今后，我們准备每年或每兩年举行一次整风运动，运动時間可以大为縮短，作为解决我国整个过渡时期各项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方法。实行这个方法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必須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会站在我們方面的，是講道理的。这一点已为运动的全部經驗所証明。

我們根据列宁关于密切联系群众、承認群众的首創精神、实行批

評和自我批評的原則，在多年的革命實踐中，得出了整風的方法，而目前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运动又一次证明了这个方法的正确性。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6日），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9頁。

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龔自珍詩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馬齐瘖”的沉悶空气冲破了。

毛泽东：“介紹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紅旗”1958年第1期，第4頁。

毛泽东同志去年夏天就指出，經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在我国創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潑的政治局面”。

轉摘自譚震林：“論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7. 正确处理各个不同領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調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設而奋斗。

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殘余呢？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首先就是鬧独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見局部利益，不看見全体利益，他們总是不适当地特別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們的局部利益。他們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們忘記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級服从上級，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張国燾是向党中央鬧独立性的，結果鬧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現在講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現象必須預防，必須將各种不統一的現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項言論或行动，都必須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絕

对不許可違反这个原則。

關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們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們在个人和党的关系問題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們在口头上虽然也說尊重党，但他們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經說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別長，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別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这种人關什么东西呢？關名譽，關地位，關出风头。在他們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關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攏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資产階級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們應該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沒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張国森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關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計，自以为很聰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我們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問題。我們一定要建設一个集中的統一的党，一切无原則的派別斗争，都要清除干淨。要使我們全党的步調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們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須团結，必須反对宗派主义傾向。因为許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軍新四軍到后才創立的，許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須加以很好的注意。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結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長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內才能生根，否則是不可能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長处，也各有短处，必須互相取長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不但如此，即在一个根据地內部，因为根据地內的各个区域

有发展先后之不同，干部中也有外来本地之别。比较先进区域的干部到比较落后的区域去，对于当地，也是一种外来干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干部的问题。就一般情形说来，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这个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外来干部的身上。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其责任就更大些。现在各地对这个问题的注意还很不够，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谩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他们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自己的短处，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许可谩笑他们，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的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义倾向。

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也是如此。两者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必须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

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对于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个問題，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問題。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現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說：“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則的关系，他們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他在这里講了干部狀況，又講了自然科学。我們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們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不错，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們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經驗，他們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鍛煉中逐渐地去掉的。他們的長处，正如斯大林說过的，是对于新鮮事物有銳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則正是缺乏的。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長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傾向。在老干部負主要领导責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負主要的責任。

以上所講的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門和那一工作部門之間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都是党內的相互关系。在这种种方面，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傾向，使我們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調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整頓党的作风，必須彻底地解决这个問題。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組織关系上的一种表現；我們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內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統一的地步。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內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其理由就是：單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須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

上，二十年来做了艰苦的偉大的工作；抗战以来，这个工作的成績更加偉大。但这并不是說，我們所有的同志对待人民群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都沒有了宗派主义的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傾向，有些人并且很严重。我們的許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員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視人家，而不願尊重人家，不願了解人家的長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傾向。这些同志，讀了几本馬克思主义的書籍之后，不是更謙虛，而是更驕傲了，总是說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員相比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員合作呢？对于一切願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义务，絕无排斥他們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願意同我們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們。这是沒有任何根据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給了我們这样的根据嗎？沒有。相反地，他們总是諄諄告誡我們，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脫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給了我們这个根据嗎？沒有。中央的一切決議案中，沒有一个決議說是我們可以脫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相反地，中央总是叫我們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脫离群众。所以，一切脫离群众的行为，並沒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們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綫的实行，所以我們要針對这个問題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們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問題的严重性，使他們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員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23—828頁；

我們要和各民族講团结，不論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

如鄂倫春族还不到兩千人，我們也要和他們團結。只要是中國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愛國和團結的，我們都要和他們團結。團結起來，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進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點，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點，不論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沒有商量好就不勉強做。商量好了，大多數人贊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辦事，這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不同的地方。國民黨勢力大就壓迫人。他們不僅壓迫少數民族，還壓迫大多數漢人。國民黨是做壞事的。壞事是不應當做的，我們的幹部有了錯誤就要批評。我們在西藏的工作有什麼缺點和錯誤，請你們講；你們不同意的和你們認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講，便於我們糾正。有了缺點就馬上糾正，這是我們和國民黨不同的地方。

毛主席對西藏國慶觀禮團代表的重要指示，
1954年6月30日“東北日報”。

我國少數民族有三千多萬人，雖然只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區廣大，約占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一定要搞好。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克服大漢族主義。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義的少數民族中間，則應當同時克服地方民族主義。無論是大漢族主義或者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於各族人民的團結，這是應當克服的一種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數少數民族地區民族關係比較從前大有改進，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在一部分地區，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還嚴重地存在，必須給以足夠的注意。經過各族人民幾年來的努力，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絕大部分都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24頁。

合作社正在經歷一個逐步鞏固的過程。它還存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矛盾。例如，在國家同合作社之間，在合作社內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間，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決。

我們必須經常注意从生产問題和分配問題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問題上，一方面，合作社經濟要服从国家統一經濟計劃的領導，同时在不違背国家的統一計劃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經營的經濟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計劃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計劃。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須处理适当，經常注意調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們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同上，第17—18頁。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順利，是跟我們把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当做人民內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階級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經過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現在有些人說：資本家已經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說，資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說，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階級不改造？这些議論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誰說工人階級不要改造？当然，剝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談。工人階級要在階級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階級必須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們这些人來說，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說，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馬克思主义的思想，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書本上学了一点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長期階級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繼續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則就要落后

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說，中国资产阶级現在已經沒有兩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經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員，正处在由剝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轉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們現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說，他們的剝削根子还没有脫离。他們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說已經沒有了兩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繼續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認為资产阶级已經沒有了兩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沒有了。

應該說，这种意見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願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願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須是在工作中間，他們应当在企业內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經過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願为基础。許多工商业者在講習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語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們从亲身的經驗懂得，繼續学习，繼續改造自己，对于他們是有益的。剛才所說的那种認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見，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見，只是少数人的意見。

同上，第19—21頁。

· 我国人民內部的矛盾，在知識分子中間也表現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識分子，現在轉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們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們如何帮助他們适应新社会需要的問題。这也是人民內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識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經有了显著的进步。他們表示贊成社会主义制度。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經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漸增多。当然，知識分子中間有一些人現在仍然怀疑

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同上,第21—22页。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使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

包括在統籌兼顧、适当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应当指導社會團體和各地群眾這樣做。

同上，第24—25頁。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也是我國具體的歷史條件的產物。這個口號並不是突然提出來的，它已經經過了好幾年的醞釀。長期共存的思想已經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會主義制度已基本建立，這些口號就明確地提出來了。為什麼要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同工人階級政黨長期共存呢？這是因為凡屬一切確實致力於團結人民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到人民信任的黨派，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它們採取長期共存的方針。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就已經這樣說過：“只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還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並且是一貫地做下去，並不半途而廢，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機會和效力的機會的。”這裡所說的，也就是各黨派可以長期共存的政治基礎。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於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產黨一方面的願望作決定，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黨派互相監督的事實，也早已存在，就是各黨派互相提意見，作批評。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什麼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當然，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相互之間所提的意見，所作的批評，也只有在合乎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六條政治標準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互相監督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希望各民主黨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爭取和共產黨一道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以適應新社會的需要。

同上，第31—32頁。

一九五六年，在個別地方發生了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的事件。

这些人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決的，有些是不適當的和要求過高、一時還不能解決的。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機關負責，不能全怪下面。鬧事的另一個原因是對於工人、學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還有少數合作社社員鬧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對於群眾缺乏教育。

應該承認：有些群眾往往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長遠的、全國性的、集體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於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于把舊中國和新中国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國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鬥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怎樣的長時間的艱苦勞動。因此，需要在群眾中間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並且應當經常把發生的困難向他們作真實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決困難的辦法。

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們相信，我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無故鬧事。但是這並不是說，在我國已經沒有了發生群眾鬧事的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一）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只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二）如果由於我們的工作作得不好，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幹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應當在處理鬧事的过程中，進行細致的工作，不要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要“草率收兵”。對於鬧事的帶頭人物，除了那些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法辦以外，不應當輕易開除。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里，有少數人鬧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

在我們社會里，也有少數不顧公共利益、蠻不講理、行凶犯法的人。他們可能利用和歪曲我們的方針，故意提出無理的要求來煽動群眾，或者故意造謠生事，破壞社會的正常秩序。對於這種人，我們並不贊成放縱他們。相反，必須給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懲治這種人是社會廣大群眾的要求，不予懲治則是違反群眾意願的。

同上，第32—34頁。

這裡所講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係。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着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築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於為人們所理解。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於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關於經濟問題今天不準備多講。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因為才進行七年，還需要積累經驗。對於革命我們開始也沒有經驗，翻過劬斗，取得了經驗，然後才有全國的勝利。我們要求在取得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比較取得革命經驗的時間要縮短一些，同時不要花費那麼高的代價。代價總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時期所付的代價那麼高。必須懂得，在這個問題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會主義

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同上，第36—38頁。

十四 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

(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1.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必都有巨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年7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参考资料”(一),第48页。

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施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因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闾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

辟易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三)”(1919年7月)，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參考資料”(一)，第55—56頁。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頁。

同志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4頁。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衝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吓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我們方面，軍隊須有源源不絕的補充，現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買兵法”亟須禁止，改為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這樣，要幾百萬人當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財源十分困難，動員了民眾，則財政也不成問題，豈有如此廣土眾民的国家而患財窮之理？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不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01頁。

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已經

輸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服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轍而北其轍”，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毛泽东：“論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70页。

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

……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力。因为每一次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結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7、619頁。

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兒子們要用鋤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說是你們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沒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揹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們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們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們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101—1102頁。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1頁。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軍队，这个軍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

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01页。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2页。

2.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掌握了自己命运的、觉悟了的、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发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以从来没有的革命干劲，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向前跃进。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1949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农村中实现土地改革和在工厂企业中实现民主改革之后，工人和农民即获得发展其爱国增产的极大积极性，并改

善其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可能。只要我們善于團結、教育和依靠工人和農民，我國就一定會要出現一個普遍高漲的愛國增產運動。

毛澤東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開幕詞（1951年10月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頁。

農業合作化的進度這樣快，是不是在一個健康的狀態中進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黨組織都全面地領導了這個運動。農民是那樣熱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這個運動。他們的生产積極性空前高漲。最廣大的群眾第一次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的將來。在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糧食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文盲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掃除。許多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等等，過去人們認為沒有辦法對付的，現在也有辦法對付了。總之，群眾已經看見了自己的偉大的前途。

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1955年12月27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頁。

社會主義不僅從舊社會解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也解放了舊社會所無法利用的廣大的自然界。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产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

毛澤東：“‘多餘勞動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頁。

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二十三戶貧農只有三條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十年內，由於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国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這些人掌

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書記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頁。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經濟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尙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資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長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沒有看見人民群众象現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揚,意气风发。……除了別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則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我現在向全国七十九万个合作社的同志們,以及城市里的同志們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付奴隶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現在真正开始統治这块地方了。

毛泽东:“介紹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紅旗”1958年第1期,第3—4頁。

3. 树立群众观点: 相信群众自己能够解放自己;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密切联系群众, 依靠群众; 遇事同群众商量, 做群众的小学生。

我們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負責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負責的一致性;这些就是

我們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須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須随时准备修正錯誤，因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5頁。

菩薩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們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薩，无須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薩。共产党对这些东西的宣傳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薩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別人代庖是不对的。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4—35頁。

……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給以恰当的指導与調整，給以可能的物質帮助，單靠政府用有限財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偉大任务的。

毛泽东：“論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华北新华書店1948年版，第54頁。

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給群众以恩賜。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賜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結果是不巩固的。

毛泽东：“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13頁。

自由是人民爭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賜的。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70頁。

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願，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敗。“欲速則不达”，这不是說不要速，而是說不要犯自动主义，自动主义是必然要失敗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这里是兩条原則：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願，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

我們代替群众下决心。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战綫”(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0—1011頁。

就农业合作化問題來說，我認为我們应当相信：(1)貧农、新中农中間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間的下中农，因为他們的經濟地位困难(貧农)，或者他們的經濟地位虽然比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們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們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們中間的覺悟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

.....

我們应当相信群众，我們应当相信党，这是兩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9頁。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349頁。

什么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問題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問題。不解决这两个問題，或这两个問題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們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們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連串的問題。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5頁。

我們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

农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軍。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够长期地和我們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們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說的四种人。

同上，第857—859頁。

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个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过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則的問題上。而对于这个原則問題，爭論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輕視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傾向。我說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說，这些同志的輕視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輕視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問題不解决，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决。

同上，第859—860頁。

既然必須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結合，就必須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問題。魯迅的兩句詩，“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这里就是說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惡的敌人我們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說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魯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結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認識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同上，第878頁。

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們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我們同志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們应做的革命工作，这是很好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

們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給人民的東西。我們有什么东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在目前陝甘寧边区的条件說来，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与文化程度。……只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們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們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們才会說我們要东西是應該的，是正当的，他們才会懂得他們如不送出糧草等等东西給政府，則他們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样我們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順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这就是我們党的根本路綫，根本政策，每个同志（軍隊的同志也在內）都要好好去研究。只在我們的同志懂得并且实行了这样兩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我們方能算得上称为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

毛澤东：“經濟問題与財政問題”（1942年12月），“毛澤东选集”，东北書店1948年版，第876—877頁。

合作社性質，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們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問題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能好办。

毛澤东：“論合作社”（1943年10月），“毛澤东选集”，东北書店1948年版，第891頁。

我們大家要学习他（指白求恩——本書編者）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純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級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澤东：“紀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654頁。

我們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队伍。我們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

工作的。……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03页。

我们的每一指战员，以至于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

毛泽东同志在留守兵团学习代表招待会上的讲话，1944年9月23日“解放日报”。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9页。

苏维埃政府只有用尽一切力量使民众明白当前的危机与国民党的罪恶，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的提高，才能顺利地执行自己的神圣的任务——以民族革命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血腥统治。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本，第247页。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

人員。我們的同志如果把這個中心任務真正看清楚了，懂得無論如何要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那末，我們對於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因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1頁。

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他是民眾自己的政權，他直接依靠於民眾。他與民眾的關係必須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後才能發揮他的作用。蘇維埃具有絕大的力量，他已經成為革命戰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而且也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他的力量的偉大，是歷史上任何資產階級國家形式所不能比擬的。但他的力量完全依靠於民眾，他不能夠一刻離開民眾。

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1934年1月），“蘇維埃中國”，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57年翻印本，第259頁。

為着發展國營經濟和幫助合作社經濟，我們在群眾擁護之下，發行了三百萬元經濟建設公債。這樣依靠群眾的力量來解決經濟建設的資金問題，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

毛澤東：“我們的經濟政策”（1934年1月23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29頁。

十五個月抗戰又証明了民眾援助抗戰力量之偉大；同時也証明了民眾力量之僅在開始發動，因而使抗戰得不到民眾的廣大援助而遭受了許多挫折。從此得到教訓，國人必須進一步的認識抗戰依靠民眾這個基本問題。依靠民眾則一切困難能夠克服，任何強敵能夠戰勝，離開民眾則將一事無成。中國今後的進步，還必須充分表現在發動民眾力量這一方面。

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華北新華書店1948年版，第17—18頁。

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結合，事情就办不好，有兩種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則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軍隊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老百姓可以罵我們，我們却不能罵他們，因為他們是主人，因為我們的飯是他們作的，房子是他們作的，我們要軍民合作。八路軍有兩条規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軍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團結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毛澤东同志在边区第二屆农工展覽会開幕典禮上的講演詞，
1940年2月3日“新中華報”。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謀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决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應該站在民众之上。

毛澤东：“在陝甘宁边区參議会的演說”(1941年11月21日)，
“毛澤东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1頁。

紅軍的历史說明了一个无可置辯的真理：只有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武力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毛澤东：“慶祝紅軍二十四周年”(1942年2月18日)，
1942年2月23日“解放日報”。

我們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們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們不要有一时一刻脫离群众。只要我們不脫离群众，我們就一定胜利。

毛澤东同志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問題的報告，
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報”。

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屬錯誤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脫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經驗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驕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們脫离群众。我們的代表大会應該号召全党提起警覺，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讓他脫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細

心地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6—1097页。

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与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与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6日），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34页。

就國內的条件來說，我們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階級領導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为了进行偉大的建設工作，在我們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們有一千多万黨員，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們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項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員来作。如果我們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員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詞”（1956年9月15日），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頁。

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認為无产階級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
.....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頁。

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依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

“幸福的会見，巨大的鼓舞”，1958年7月1日“人民日报”。

沒有滿腔的热忱，沒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

……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繼續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願。

毛泽东：“‘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0—791頁。

我們的文学專門家應該注意群众的牆报，注意軍隊和农村中的通訊文学。我們的戏剧專門家應該注意軍隊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們的音乐專門家應該注意群众的歌唱。我們的美术專門家應該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應該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們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幫助他們，指导他們，一方面又向他們学

习，从他們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專門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們應該尊重專門家，專門家对于我們的事業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我們應該告訴他們說，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現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毛澤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5—866頁。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諸葛亮”，这就是說，群众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国人民中間，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众中間去，向群众学习，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訴群众(宣傳)，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問題，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毛澤东：“組織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36頁

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群众的意見与經驗一定要作为我們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給我們許許多多事情。我們的任务就是听从他們，学习与了解他們的經驗、願望、批評，确定他們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給他們。

轉摘自“論党的群众路綫”，浙江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們学习，同时号召你們，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們，繼續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

毛澤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會議致祝詞(1950年9月25日)，“新华月报”1950年10月号，第1259頁。

接着毛主席轉向我說：“參觀一下你們的養豬場好嗎？”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嘴快的春蘭子就高喊起來：“歡迎！歡迎！”我忙說：“請毛主席多指教！”毛主席看着我笑說：“別什麼都要我指教吧，我和井泉同志都是來向你們學習的，在許多事情上，你們比我們內行多了，是吧？”……

……

“真是新鮮事兒，牛糞也能喂豬！”毛主席很感興趣地說。親自舀了兩瓢去喂豬，見豬們抖起抖起地吃得怪上勁，他老人家更加高興了，問我：“怎麼個制法，介紹一下好嗎？”

我一邊介紹，他老人家一邊摸出筆記本來，向井泉同志說：“井泉同志，來，我們都記上吧，這是群眾的創造！從前我們就沒聽見說過。看來我們中國那句老話：‘做到老，學到老’實在不錯！”

“毛主席在群眾中”（續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28頁。

4. 一切工作都要大搞群眾運動。馬克思主義者對待群眾運動必須採取熱忱歡迎、積極領導的態度。指手劃腳地批評群眾運動或者反對群眾運動都是錯誤的。

要加強群眾運動。所謂準備群眾即指此。……群眾是我們的最後依靠，也是抗戰的最後依靠。

毛澤東：“反投降提綱”（1939年6月），中國人民大學1950年版，第50頁。

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

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項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將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

农民在乡里造反，攪动了紳士們的甜夢。……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风雨的議論的压迫，他閉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沒有法子否認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說：“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則是糟。”总而言之，無論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認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們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內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着瞎說。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的，你必定覺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們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沒有这个变动，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14、16—17頁。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們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搖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

人說：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評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規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針。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針，这是錯誤的方針。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来；全国也即將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帶有极其偉大的世界意义。我們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計劃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糾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錯誤，只要我們积极地去帮助他們，就会克服或糾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例如：一方面排斥貧农入社，不照顧貧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們的利益。这些都應該向他們去进行教育，加以糾正，而不是簡單地去进行斥責。簡單的斥責是不能解决問題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經驗中將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長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

……

我們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們应当同合作社社員、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們的积极性。

……

在胜利面前，我認为有兩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腦，使自己的头腦大大膨脹起来，犯出“左”的錯誤，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腦，来一个“坚决收縮”，犯出右的錯誤，这也不好。現在的情况是屬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第1—2、10、12頁。

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來說可以在三年內实现初級形式

的合作化的人們(三年合作化的口號是群眾提出的,遭到了機會主義者的批評),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區可以和老解放區同時實現合作化的人們,請看一看江蘇省崑山縣的這個鄉吧!這裡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兩年就合作化了。這裡不是老解放區,是一個千真萬確的晚解放區。這個晚解放區,走到許多老解放區的前面去了。有什麼辦法呢?難道可以把它拉回來嗎?當然不能,機會主義者只有認輸一法。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那些在革命時期還只會按照常規走路的人們,對於這種積極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時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這種人難道我們遇見得還少嗎?這些只會循着常規走路的人們,老是對於人民的積極性估計過低。一種新事物出現,他們總是不贊成,首先反對一氣。隨後就是認輸,做一點自我批評。第二種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這兩種態度循環一遍。以後各種新事物出現,都按照這個格式處理。這種人老是被動,在緊要的關頭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擊一猛掌,才肯向前跨進一步。那一個年頭能使這種人自己有辦法走路,並且走得象個樣子呢?有一個治好這種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時間到群眾中去走一走,看看群眾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從其中找出先進經驗,加以推廣。這是一個治好右傾頑症的有效藥方,奉勸人們不妨試一試。

毛澤東:“‘這個鄉兩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接語”(1955年),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587—588頁。

幾乎帶普遍性地在許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礙廣大的貧農和下中農群眾走合作化道路的、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同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互相呼應着。對於這樣一種情形,這一篇文章算是描寫得恰好。作者以極大的憤怒斥責了機會主義者,支持了貧苦農民。有些人雖然頂着共產主義者的稱號,卻對於現在要做的社會主義事業表現很少興趣。他們不但不支持熱情的群眾,反而向群眾的頭上潑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國,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決勝負的一

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烟瘴气，阴霾滿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臉，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毛泽东：“‘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29—730頁。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讀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別要講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現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長，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組織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聰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領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許多地方党的領導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級地方党委在这个問題上采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場，將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領導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講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毛泽东：“‘一个違背領導意願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4頁。

发展鋼鐵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沒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毛主席在安徽”，1958年10月7日“人民日报”。

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項任务

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鋼鐵战綫上的任务。在鋼鐵战綫上，广大群众已經发动起来了。……到現在，我們还有一些同志不願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規模的群众运动，他們把在工业战綫上搞群众运动，說成是“不正规”貶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毛主席巡視大江南北回京后对新华社記者发表重要談話，
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二) 群众是划分为階級的

1. 群众是划分为階級的。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領的群众，包括无产階級、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階級群众。我們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和巩固这个集团。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86頁。

中国无产階級、农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产階級，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階級，或者已經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們必然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構成和政权構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階級則是領导的力量。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68頁。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資产階級。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7頁。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須是无产階級領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說，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階級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領导者，只能和必須由无产階級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領导者。这

就是說，由參加這個革命的人們所組成的統一戰綫是十分廣大的，這里包括了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以及從地主階級分裂出來的開明紳士，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大眾。由這個人民大眾所建立的国家及政府，就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及代表各民主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聯合政府。這個革命所要推翻的敵人，只是和必須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些敵人的集中表現，就是蔣介石國民党的反動統治。

毛澤東：“在首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解放社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9年北京4版標準本，第87—88頁。

在国内，喚起民眾。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国内的統一戰綫，并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农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頁。

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內容。拿我国的情况來說，在抗日戰爭时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会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时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国民党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会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会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敵視、破壞社会主义建設的社会勢力和社会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毛澤東：“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頁。

2. 工人階級和全体勞動人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工农聯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力量。是否与工农相結合，是划分革命、不革命或是反革命的唯一标准。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9页。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五四运动”（1939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46页。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85页。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页。

就國內的条件來說，我們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階級領導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結了一切可能团結的力量。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詞”（1956年9月15日），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頁。

中国工人階級，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領導者。中国工人階級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为驅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

毛泽东：“‘中国工人’发刊詞”（1940年2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21頁。

中国工人階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覺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鋒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中，中国工人階級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极大的努力和极有价值的貢獻。在最后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階級將起着极大的作用。在抗日結束以后，可以預断，中国工人階級的努力和貢獻將会是更大的。中国工人階級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82頁。

……只有工人階級最有远見，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証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資产階級和民族資产階級曾經多次領導过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証。

毛泽东：“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頁。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页。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认识这一切，不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78—1079页。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and 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中国的知識青年們和学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組織起来。沒有工农这个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軍隊，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生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識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結合在一塊，和他們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軍人。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軍隊呵！有了这支大軍，才能攻破敌人的各固障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壘。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應該指出一种錯誤的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們不願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們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們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們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說，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沒有好結果的。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里說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結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認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也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結合在一塊。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講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我們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 and 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別的标准，沒有第二个标准。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53—555頁。

3. 階級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階級觀點和群眾觀點，階級路線和群眾路線是一致的。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頁。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產情況。對於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

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89頁。

須知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並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

毛澤東：“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1941年5月8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83頁。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这个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毛澤東：“評白皮書”（1949年8月11日），“毛澤東同志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頁。

積極擁護合作社的是些什麼人呢？是絕大多數貧農和下中農，

他們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滿意的只占极少数。許多人沒有分析这种情况，沒有对合作社的成績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間刮起了一陣所謂合作社沒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頁。

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綫，是依靠雇农貧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綫的正确应用，是保証土地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維埃每一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

毛泽东：“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苏維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編輯委员会1957年翻印本，第273頁。

为着坚决地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乡村中不但必須組織包括雇农貧农中农在內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而且必須首先組織包括貧农雇农群众的貧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机关，而貧农团則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我們的方針是依靠貧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及半封建的剝削制度。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解放社編“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24頁。

土地改革的总路綫，是依靠貧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別地消灭封建剝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力量，只能和必須是貧农。这个貧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滿足貧雇农群众的要求。土地改革必須团结中农，貧雇农必須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結成巩固的統一战綫。不这样做，貧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敗。土地改革的一个任务，是滿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必須容許

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較一般貧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

毛泽东：“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解放社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88頁。

至于新中农中間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間的上中农，即一切經濟地位較为富裕的中农，除开若干已經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覺悟、真正自願加入合作社的，可以吸收他們入社以外，其余暫時都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强地把他們拉进来。这是因为他們現在还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覺悟，只有等到农村中大多数人都加入合作社了，或者合作社的單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同这些富裕中农的單位面积产量相等甚至更高了，他們感到再單干下去在各方面都对他們不利，而唯有加入合作社才是較为有利的时候，他們才会下决心加入合作社。

这样，先將經濟地位貧苦或者还不富裕的人們(約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按其覺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几年內，組成合作社，然后再去吸收富裕中农。这样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頁。

在最近几年內，在一切还没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区，坚决地不要接收地主和富农加入合作社。在已經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区，在那些已經巩固的合作社內，則可以有条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棄剝削、从事劳动、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参加集体的劳动，并且在劳动中繼續改造他們。

同上，第17—18頁。

这里所說的問題，有普遍的意义。中农是必須团結的，不团結中农是錯誤的。但是工人階級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結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貧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現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两个革命时期，中农在开始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参加到革命方面来。貧农必須向中农做工作，

把中农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须吸引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较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以占三分之一左右为适宜。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下中农）委员的人数应当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老下中农和若干觉悟很高、确实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农仍然可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来充当。我们对于福建省福安县贫农领导的合作社和中农领导的合作社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一种情况，不应当看作是个别的现象，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毛泽东：“‘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一文接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1—702页。

这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问题。各级党委和派到农村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们，对于这个问题都应当引起充分的注意。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许多同志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建立贫农优势的问题，在土地改革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贫农，还没有上升为中农，而中农对于土地改革是动摇的，因此那时确有建立贫农优势的必要。现在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过去的贫农大部分已经上升为新中农，而老中农的生产资料又多，没有老中农参加就不能解决合作社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因此，这些同志认为，现在不应当提出依靠贫农或者建立贫农优势的口号，认为这种口号会不利于合作化。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工人阶级

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他们中间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变为新中农，但是他们同老中农比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他们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比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份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的支部和派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们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应当公开告诉农民群众。

毛泽东：“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期，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857—859页。

4. 对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

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們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們始終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們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們在受外資打击、軍閥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国主义反軍閥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們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張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統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議論說：“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話，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們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說解釋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們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納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統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豎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間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識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員、小員司、小事务員、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屬於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經營的，都是小生产的經濟。这个小资产阶级內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經濟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多余錢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腦力劳动所得，除自給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財，却总

想爬上中产階級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东，往往垂着一尺長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們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和中产階級頗接近，故对于中产階級的宣傳頗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資产階級中占少数，是小資产階級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經濟上大體上可以自給的。这一部分人比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們也想發財，但是赵公元帥總不讓他們發財，而且因为近年以來帝国主义、軍閥、封建地主、买办大資产階級的压迫和剝削，他們感覺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從前的世界。他們覺得現在如果只使用和從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維持生活。必須增加劳动時間，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維持生活。他們有点罵人了，罵洋人叫“洋鬼子”，罵軍閥叫“搶錢司令”，罵土豪劣紳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軍閥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軍閥的來頭那麼大)，不肯貿然參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絕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資产階級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謂殷实人家，漸漸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漸漸变得生活下降了。他們每逢年終結帳一次，就吃惊一次，說：“咳，又亏了！”这种人因為他們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負債漸多，漸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慄”。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覺的痛苦很大，因為他們有一个從前和現在相反的比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頗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資产階級的左翼。以上所說小資产階級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資产階級的左派參加革命，中派亦可參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挾，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們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經驗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錯的。

半无产階級。此处所謂半无产階級，包含：(一)絕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貧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員，(五)小販等五种。絕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貧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謂农民問題，

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半自耕农、貧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經營的，都是更細小的小生产的經濟。絕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貧农虽同屬半无产階級，但其經濟狀況仍有上、中、下三个細別。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約有一半不够，須租別人田地，或者出賣一部分劳动力，或經營小商，以資弥补。春夏之間，青黃不接，高利向別人借債，重价向別人糶粮，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貧农。因为貧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則租于別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貧农。貧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剝削。其經濟地位又分兩部分。一部分貧农有比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資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結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撈魚蝦、飼鷄豕，或出賣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維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較另一部分貧农为优。其革命性，則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貧农。所謂另一部分貧农，則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資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賣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憐，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務叢集，如牛負重。他們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傳。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階級，是因为他們虽然自有簡單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們也常常被迫出賣一部分劳动力，其經濟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貧农相当。因其家庭負擔之重，工資和生活費用之不相称，时有貧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貧农亦大致相同。店員是商店的雇員，以微薄的薪資，供家庭的費用，物价年年增長，薪給往往須数年一增，偶与此輩傾談，便見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貧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傳极易接受。小販不論肩挑叫賣，或街畔攤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貧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個变更現狀的革命，也和貧农相同。

无产階級。現代工业无产階級約二百万人。中国因經濟落后，故現代工业无产階級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

鐵路、矿山、海运、紡織、造船五種產業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個數量是在外資產業的奴役下。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却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我們看四年以來的罷工運動，如海員罷工、鐵路罷工、開灤和焦作煤礦罷工、沙面罷工以及“五卅”後上海香港兩處的大罷工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業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所處地位的重要。他們所以能如此，第一個原因是集中。無論那種人都不如他們的集中。第二個原因是經濟地位低下。他們失了生產手段，剩下兩手，絕了發財的望，又受着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的極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別能戰鬥。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碼頭搬運夫和人力車夫占多數，糞夫清道夫等亦屬於這一類。他們除雙手外，別無長物，其經濟地位和產業工人相似，惟不及產業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國尚少新式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所謂農村無產階級，是指長工、月工、零工等雇農而言。此等雇農不僅無土地，無農具，又無絲毫資金，只得營工度日。其勞動時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職業之不安定，超過其他工人。此種人在鄉村中是最感困難者，在農民運動中和貧農處于同一緊要的地位。

此外，還有數量不小的游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都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綜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

他們扰乱了我們的陣綫。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9页。

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了。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么？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么？”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

大的好处。他們鍋里有米煮，沒有人半夜里敲門來討賬。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着眉頭在那里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么？”“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么？”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着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中農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還要看一看。農會爭取中農入會，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里積極奮鬥。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他們對着富農說：“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為什麼還遲疑？”富農帶着譏笑的聲調說道：“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麼不進農會！”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麼不進農會？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占百分之七十，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都是“赤貧”，占百分之二十。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次貧”，占百分之五十。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0—22頁。

一 地 主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二 富 农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三 中 农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

微的剝削，但非經常的和主要的。

四、農

貧農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整的工具；有些全無土地，只有一些不完整的工具。一般都須租入土地來耕，受人地租、債利和小部分僱傭勞動的剝削。

中農一般不要出賣勞動力，貧農一般要出賣小部分的勞動力，這是區別中農和貧農的主要標準。

五、工、人

工人（雇農在內）一般全無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極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賣勞動力為生。

毛澤東：“怎樣分析農村階級”（1933年10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21—123頁。

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

……這種情形，就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麼辦”的問題。反抗呢？還是投降呢？或者游移於兩者之間呢？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中國各個階級怎樣來回答這個問題。

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反日浪潮，證明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

中國的小資產階級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學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不是已經發動了一個廣大的反日運動么？中國的這些小資產階級成份曾經參加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農民一樣，他們有同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小生產的經濟地位。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勢力，曾經給了他們以重大的損害，使他們中的很多人陷於失業、破產或半破產的境地。現在他們眼看就要當亡國奴了，除了反抗，再沒有出路。

.....

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买办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过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不論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們組成了一個卖国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綫，他們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們的总头子就是蔣介石。这一卖国賊營壘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沒有这一群卖国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一步田地的。他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民族資产階級是一个复杂的問題。这个階級曾經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燄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蔣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問題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資产階級有沒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們認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資产階級同地主階級、买办階級不是同一的东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产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买办階級那樣多的买办性。民族資产階級內部有同外国資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产階級的右翼，我們暫且不去估計他們的变化的可能性。問題是在沒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較少的那些部分。我們認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資产階級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們的动摇。他們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們在这二者之間动摇着。这就說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他們为什么参加了革命，及到这一时期之末，他們又为什么站到蔣介石方面去了。現在的时期，同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有什么分別呢？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現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來，他們拋棄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階級，和地主买办階級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沒有呢？沒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我們認為民族資产階級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动

搖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毛泽东：“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7—140頁。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沒有的。再則，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經濟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規定了中国現阶段的革命的性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規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詞”（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95頁。

十八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統一战綫，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間发展着的，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証明了下列的規律：（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軍閥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內，應該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統一战綫，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統一战綫的内容不能始終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內，而在另一时期則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內。

同上，第597頁。

根据現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質、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的分析和規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呢？

既然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

国革命所反对的对象主要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統治和內部的封建主义，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这两个压迫者，那末，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动力問題。認清这个革命的动力問題，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問題。

現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些什么阶级呢？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的統治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在今天中国的最广大的領土上，还是被統治阶级。

所有这些阶级，它們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場如何，全依它們在社会經濟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經濟的性質，不仅規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規定了革命的动力。

我們現在就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各阶级。

一 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統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剝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絲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因此，作为阶级來說，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

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經投降日寇，变为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頑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壘內，亦已非常动搖。但是許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紳士即帶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們，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們一道抗日。

二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有帶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

帶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它們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帶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

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

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阵营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和他們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沒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

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 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象，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

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这些小资产阶级也只有有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各种类型的没有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小资产阶级。

第一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

命。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傳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离开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广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克服。

第二是小商人。他們一般不雇店員，或者只雇少數店員，開設小規模的商店。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和高利貸者的剝削，使他們處在破產的威脅中。

第三是手工業者。這是一個广大的群眾。他們自有生產手段，不雇工，或者只雇一、二個學徒或助手。他們的地位類似中農。

第四是自由業者。有各種業務的自由業者，醫生即是其中之一。他們不剝削別人，或對別人只有輕微的剝削。他們的地位類似手工業者。

上述各項小資產階級成份，構成广大的人群，他們一般地能夠參加和擁護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須爭取和保護之。其缺點是有些人容易受資產階級的影響，故必須注意在他們中進行革命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

四 農民階級

農民在全國總人口中大約占百分之八十，是現時中國國民經濟的主要力量。

農民的內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過程中。

第一是富農。富農約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連地主一起共約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稱為農村的資產階級。中國的富農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貸，對於雇農的剝削也很殘酷，帶

有半封建性。和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还是有益的。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

第二是中农。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二十九左右。中农一般地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但在年成丰收时能有些许盈余，有时也利用一点雇佣劳动或放一点小债），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农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一部分中农土地不足，只有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土地略有多余。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時候是如此。

第三是贫农。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是指贫农和中农。

五 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中国无产阶级有那些特出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經濟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近的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六 游 民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謀生的正当途徑，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許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搖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則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們缺乏建設性，破坏有余而建設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應該善于改造他們，注意防止他們的破坏性。

以上这些，就是我們对于中国革命动力的分析。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32—641頁。

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資产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面性。这种兩面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資产階級，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們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們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資产階級的一般規律，不过中国資产階級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67頁。

蔣、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們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資本，壟断全国的經濟命脉。这个壟断資本，与国家政权結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这个壟断資本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地主階級及旧式富农，密切地結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这就是蔣介石反动政权的經濟基础。这个国家壟断資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小資产階級，損害中等資产階級。这个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間及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質条件。这个資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資

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27页。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15页。

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页。

这里谈一个社员成份问题。我以为在目前一两年内，在一切合作社还在开始推广或者推广不久的地区，即目前的大多数地区，应当是：（1）贫农；（2）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3）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这几部分人中间暂时还不积极的分子则不要勉强地拉进来。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他们对于合作社感到兴趣了，然后再分批地把他们吸收进合作社。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生活或者还是困难的（贫农，他们分得了土地，比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还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虽然如此，他们中间的积极性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积极，有些人

暫時還不大積極，有些人還要看一看。因此，我們對於一切暫時還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們是貧農和下中農也罷，要有一段向他們進行教育的時間，要耐心地等待他們的覺悟，不要違反自願原則，勉強地把他們拉進來。

同上，第15—16頁。

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國的階級力量對比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社會主義大為上升，資本主義大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過渡時期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就可以從基本上奠定了。

毛澤東：“‘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文接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9頁。

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是比較地不固執小農私有生產資料的制度，比較地容易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人們。他們中間的大部分現在已經變為新中農，但是他們同老中農比較起來，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農以外，大多數在政治上較高的覺悟，他們過去的困苦生活還是容易回憶起來。還有，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比較接近，而和新老中農中間的上中農，即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農不相同。

毛澤東：“‘長沙縣高山鄉武塘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怎樣從中農占優勢轉變為貧農占優勢的’一文接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58頁。

有人說，中國資產階級現在已經沒有兩面性了，只有一面性。這是不是事實呢？不是事實。一方面，資產階級分子已經成為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管理人員，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另一方面，他們現在還在公私合營的企業中拿定息，這就是說，他們的剝削根子還沒有脫離。他們同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生活習慣還有一個不小的距離。怎麼能說已經沒有了兩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資產階級的帽子，也還需要一個相當的時間繼續進行思想改造。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頁。

世界上最願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階級，其次是半无产階級，因为一則全无所有，一則有也不多。

同上，第35頁。

(三) 无产階級政党和領袖

1. 政党是階級斗争的工具。中国工人階級在革命斗争中創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說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簡直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3頁。

革命运动是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階級，中国工人階級自己創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問題的報告，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列宁、斯大林式的革命党。沒有这样一个革命党，沒有一个按照馬、恩、列、斯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及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時間內，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什維克領導十月革命、領導社会主义建設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的时候，才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从有了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致使老一輩的人們完全不能設想的变革，都轟轟烈烈地出現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了。这个事实难道还不明显嗎？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1948年），“中苏友好文献”，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4頁。

2. 中国共产党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为基础的党，是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核心力量。

在无产阶级已經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責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違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敗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組織性，而且也最能虛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經驗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狹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搖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7頁。

共产党人决不拋棄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經濟綱領。其最高的綱領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綱領，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50頁。

党的建設的过程，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維克化的过程，也同样是有三个阶段的特点的。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綫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

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統一战綫、武裝斗争和党的建設三个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狀況和社会狀況、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實踐还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領導机关中占統治地位的成份，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沒有能够領導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資产阶级的欺騙，而使革命遭到失敗。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組織是发展了，但是沒有巩固，沒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沒有給予必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經驗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沒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詭計的包围中，但是沒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沒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裝，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还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實踐相結合。这就是党的建設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經驗，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狀況和社会狀況、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規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們的干部更多地領会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更多地学会了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我們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資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組織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們的党，但是党驅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創造了坚强的武裝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偉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虛心領会过去的經驗，对于中国的历史狀況和社会狀況、

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實踐沒有統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領導机关的一部分人，沒有能够在这—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傾机会主义的危害。只在到了遵义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塞維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張国焘右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基础。这就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經过去了三年，这三年的斗争，是有非常偉大的意义的。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經驗，凭借着党的組織力量和武裝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間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實踐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統一的理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而且进行了偉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組織已經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党。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詞（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01—603頁。

在某种程度上說来，我們的党已經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經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領導骨干說来，就其黨員的某些成份說来，就其总路綫說来，就其革命工作說来，也已經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巩固的和布尔塞維克化的党。

同上，第594頁。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們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肤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对于这些的認識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

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則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5頁。

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創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說，不論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論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問題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見的态度，那是极其錯誤而且必然要失敗的。过去和現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見，不尊重我們的意見，但是結果都行不通。这是什么緣故呢？不是別的，就是因为我們的意見，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表，誰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誰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誰就一定要失敗。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87頁。

我們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結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

同上，第1094頁。

共产党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发起人，而且在將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蔣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

毛泽东：“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52頁。

沒有共产党，这样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領

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誰怀疑我們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誰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同上,第145頁。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7—178頁。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依現時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53頁。

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

同上，第253—254页。

……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

辱之上了，并且已經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6—647頁。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繼續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屬於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長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經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綱領，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則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66頁。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說，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須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

毛泽东：“在管綏干部会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解放社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务”，1949年北京4版标准本，第87—88頁。

我們有許多宝贵的經驗。一个有紀律的有馬、恩、列、斯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軍隊。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层各革命派别的統一战綫。这三件是主要的經驗。这些都是我們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毛泽东：“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16頁。

我們的事業是正义的。正义的事業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础是馬克思列宁主义。

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將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們正在前進。

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

我們的目的一定會達到。

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1954年9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彙刊”，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3頁。

黨是有能力領導全國人民進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我們黨已經勝利地領導了一個偉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人民民主專政，也就一定能夠領導全國人民，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於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業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樣，我們已經有了足以說服人的有力量的證據。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9頁。

我們必須相信：(1) 廣大農民是願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2) 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這兩點是事物的本質和主流。

同上，第21頁。

這個材料指出了一個真理，就是任何情況混亂的合作社，都是可以整理的。因為加入合作社的都是勞動農民，不管他們各個階層之間意見怎樣不合，總是可以說清楚的。有些合作社，在一個時期內，確是混亂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黨的領導，黨沒有向群眾講明自己的政策和辦法。“我們知道辦社是好事情。但是辦起社來，縣委、區委、支部都不管我們了。恐怕是嫌我們寨子窮，吃不好，住不好，才不到我們社里來。”所謂混亂，沒有別的原因，就是這樣一個原因。得不到黨的領導，當然就要混亂。領導一加上去，混亂就會立刻停止。

毛澤東：“一個混亂的合作社整頓好了”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下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67頁。

我國的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能不能和國家工業化的進度相適

应，合作化运动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少出毛病，保证增产，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它们，使它们自己不动手，专门依赖工作组。贵州的这个乡，自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转变工作态度以来，只有五个多月，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不是依赖工作组，而是自己动手了，党员也不怕困难了。这种转变，首先要靠各级党委的书记——省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和自治州委的书记，县委和自治县委的书记，区委书记和支部书记，他们应当把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起来。怕麻烦，怕困难，面临着这样伟大的任务自己不动手，仅仅委托给农村工作部，或者工作组，这种态度，不但任务不可能完成，而且会要闹出很多的乱子来的。

毛泽东：“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25—1126页。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页。

毛泽东主席在谈到国内形势的时候指出：……由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关于目前正在全国蓬勃展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毛主席说，必须采取热忱欢迎的态度，积极加强领导。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8日），195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3. 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自己最好的领袖，无产阶级的领袖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67—268页。

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8页。

十五 唯物辯証的工作方法 和工作作風

1. 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問題。 不解决方法問題,任务只是瞎說一頓。

我們是革命战争的領導者、組織者,我們又是群众生活的領導者、組織者。組織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們的兩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問題,就严重地摆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沒有桥或沒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問題,过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决方法問題,任务也只是瞎說一頓。不注意扩大紅軍的領導,不講究扩大紅軍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紅軍念一千遍,結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經濟建設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拋棄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說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實現的。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4—135頁。

沒有正确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開展經濟战綫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問題,也要在这次會議得到解决。因为同志們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許多工作,并且要指导許多工作人員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級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貿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他們是亲自动員群众組織

合作社、調劑和運輸糧食、管理出入口貿易的實際工作人員，如果他們的領導方式不對，不能採取各種正確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會立刻影響到工作的成效，使我們各項工作不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經濟建設上的整個計劃。

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933年8月20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17頁。

我們應該學習的是布尔塞維克的聰明。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借助於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06頁。

使一個地方健全地達到合作化的問題是黨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問題。只要我們黨對於處理合作化問題上的各項政策是正確的，只要我們黨當著發動群眾加入合作社的時候所採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義的或者簡單從事的方法，而是向群眾講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眾自覺自願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並且達到增產，很困難的。

毛澤東：“‘只花一個多月時間就使全村合作化’——交接語”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

2. 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 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是我們黨的根本工作方法。

為了爭取工作的速度，革命競賽的辦法應該在每個鄉里實行起來，鄉蘇是競賽的領導者。但鄉蘇也只是“領導者”，因為每一競賽，主要是群眾的競賽，不只是各村代表之間的競賽，因此每一競賽條約的訂立，應召集村為單位的群眾大會作報告，得到群眾的承認，並把競賽條約張貼出來。在生產問題等項的競賽上，還應召集每個代表領導下的幾十個居民開會作報告，得到他們的承認。一時期內檢查成績的結果，也應該召集這樣的會作報告，來推動工作的前進。一

切競賽沒有成績的，都是由于只把競賽條約放在少數人的袋子里，沒有推動廣大的群眾。每一次競賽，都要作出總結，並且實行給獎。

毛澤東：“長岡鄉調查”（1933年12月15日），“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152頁。

（一）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

（二）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于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于落空的危險。……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風經驗又證明：每一單位的整風，必須在整風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的首要負責人為核心的少數積極分子的領導骨幹，並使這一領導骨幹和參加學習的廣大群眾密切結合，才能使整風完成任務。只有領導骨幹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幹去恰當地組織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領導者必須善於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幹，並憑借這批骨幹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

……………

（五）領導骨幹和廣大群眾在組織中在鬥爭行動中發生正確關係的思想，正確的領導意見只能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的思想，在領導意見見之實行時、要將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互相結合的思想，都必須在這次整風中普遍地加以宣傳，借以糾正幹部中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觀點。許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於團結積極分子組成領導核心，不注重和不善於使這種領導核心同廣大群眾密切地結

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八)……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九)……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99--904页。

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部长、总务处长的观点，是错误的。

毛泽东：“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15页。

应该说：同志们，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吧。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如果上面不去这样作，而把一切事实上担负不起的担子老是由自己担起来，不敢放手让下面去做，不去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虽然上面费尽了气力，结果将是上下交困，在目前条件下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105页。

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

驗。犯了錯誤，也得了犯錯誤的經驗。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頁。

3.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 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 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 風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誕生以來，在其二十四年的歷史中，經歷了三次的偉大鬥爭，這就是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現在還在進行的抗日戰爭。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体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4—1095頁。

（1）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

共產主義者是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即有革命徹底性。三民主義者除了那些最忠實於革命和真理的人們之外，是理論和實踐不一致的，講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沒有革命徹底性。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81頁。

第二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如同

斯大林所說的那樣：把革命氣概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情緒，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夸夸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学习”(1941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802頁。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說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對於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刮臉皮。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卻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樣

就阻碍了理論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9頁。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經反复地講，我們的学說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記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話。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們善于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說，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实际相联系。

同上，第822頁。

必須使各級党的領導骨干都懂得，理論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結全党进行偉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5頁。

我国的革命和建設的胜利，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們党的一貫的思想原則。許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們在加强党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現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們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經提高了一步。但是我們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着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組織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脫离群众、脫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內和党外的团結的，是阻碍我們事业进步、阻碍我們同志进步的。必須用加强党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詞”(1956年9月15日)，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頁。

(2) 和人民羣众緊密聯系的作風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問題，从土地、劳动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学办起了沒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决定，應該实行，應該檢查。要使广大群众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要使他們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們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們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長岡乡的群众說：“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模范的長岡乡工作人員，可尊敬的長岡乡工作人員！他們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們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謀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鹽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問題，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問題，解决群众的一切問題。我們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們，把革命当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們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紅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們粉碎了么？

毛澤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3—134頁。

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應該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無論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

神，才是可尊敬的。共产党员应和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而努力。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0页。

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

同上，第514页。

自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01页。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

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众中間去，向群众学习，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訴群众(宣傳)，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問題，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緒，不能够帮助群众組織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們“救民私粮”的問題，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問題，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問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們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那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脫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們必須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結合起来。

毛泽东：“組織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36頁。

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專門家們，他們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来，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則区别。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8頁。

我們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們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們不要有一时一刻脫离群众。只要我們不脫离群众，我們就一定会胜利。

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問題的報告，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

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0页。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

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5—1097页。

（3）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47页。

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4月2日“解放日报”。

無論在地方工作中，在軍隊工作中，無論是官僚主義傾向或軍閥主義傾向，其毛病的性質都是一樣，就是脫離群眾。我們的同志，絕大多數都是好同志。對於有了毛病的人，一經展開批評，揭發錯誤，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須開展自我批評，正視錯誤傾向，認真實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評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不批評軍閥主義傾向，那就是願意保存國民黨作風，願意保存官僚主義灰塵和軍閥主義灰塵在自己清潔的臉上，那就不是一個好黨員。如果我們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去掉軍閥主義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會順利地開展，生產運動當然也是這樣。

我們邊區的生產，無論在農民群眾方面、機關學校方面、軍隊方面、工廠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績，在軍民關係上也有了很大進步，邊區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同志的群眾觀點已經加強，同群眾的結合大進一步的表現。但是我們不應該自滿，我們還要繼續作自我批評，還要繼續求進步。我們的生產也要繼續求進步。我們臉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掃地。儘管我們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傾向，已經根本上克服了，但是這些惡劣傾向又可以生長起來的。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勢力的層層包圍之中，我們是處在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之中，極端惡濁的官僚主義灰塵和軍閥主義灰塵天天都向我們的臉上大批地撲來。因此，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應該抑制自滿，時時批評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為了清潔，為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

毛澤東：“組織起來”（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37—938頁。

共產黨人在工作中有缺點錯誤，一經發覺，就會改正，他們應該不怕自我批評，有缺點就公開講出是缺點，有錯誤就公開講出是錯誤，一經糾正之後，缺點就不再是缺點，錯誤也就變成正確了。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1944年5月31日“解放日報”。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处，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处，我們就採用了。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1944年9月8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03頁。

在去年擁政愛民運動中，我們運用了自我批評的方法。我們有缺點互相批評。軍隊要有統一領導和紀律，才能戰勝敵人；正確的自我批評，對於領導和紀律，不但不會削弱它，而且只會增強它。當然，這種自我批評，只有在我們部隊里才有，在國民黨軍隊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的軍隊，是真正人民的軍隊。

毛澤東同志在留守兵團學習代表招待會上的講話，1944年9月23日“解放日報”。

我們工作作風中的一項極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員習慣於獨斷專行，而不善於啟發人們的批評討論，不善於運用民主作風。當然，這是拿我們解放區的這種作風與那種作風作比較，而不是拿我們解放區與國民黨區域作比較。我們解放區是民主的地方，國民黨那里是封建的地方，這兩個地方是原則上區別的。但是，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人尚未學會運用民主作風，舊社會傳染來的官僚主義作風，依然存在。別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見，提了就不高興。只愛聽恭維話，不愛聽批評話。為怕碰釘子，受打擊，遭報復，人們不敢大膽提意見。這是一種很不好的作風，這種作風阻塞着我們事業的進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員的進步。我提議各地對此點進行教育，在黨內，在黨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風。不論什麼人，只要不是敵對分子，不是惡意攻擊，允許大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緊。各級領導人員，有責任聽別人的話。實行兩條原則：(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如果沒有“言者無罪”一條，並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

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自从整风以来，我们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称赞的，这是很光荣的。但是我们仍有严重缺点，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自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5日），1944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

4. 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相结合；深入重点、取得经验，推动全般；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苦战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前冬；有节奏的生产；等等。这些都是在新形势下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重要形式。

为了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一个生气勃勃的整风运动。这就是在城市和农村中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重大政策、党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人民的生活福利等项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领导地自由地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用以正确地解决在人民内部实际存在而为当前所必需解决的各項矛盾问题。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凡是这样做了的地方，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增长，错误思想迅速澄清，工作中的缺点迅速克服，人民内部的团结迅速加强，劳动纪律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我们正在六亿人口中分期分批地推行这个人民自我教育运动，大概再有几个月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今后，我们准备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次整风运动，运动时间可以大为缩短，作为解决我国整个过渡时

期各項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方法。实行这个方法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必須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会站在我們方面的，是講道理的。这一点已为运动的全部經驗所証明。

我們根据列宁关于密切联系群众、承認群众的首創精神、实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原則，在多年的革命實踐中，得出了整风的方法，而目前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运动又一次說明了这个方法的正确性。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6日），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9頁。

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龔自珍詩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馬齐瘖”的沉悶空气冲破了。

毛泽东：“介紹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紅旗”1958年第1期，第4頁。

毛主席特別強調部署各項工作必須通过群众鳴放辯論，他說，計劃、指标不經過群众辯論，主意是你們的，辯論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

“毛主席觀察山东农村”，1963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反对自私自利的資本主义的自发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为一切言論行动的标准的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經濟逐步地过渡到大規模合作化經濟的思想和政治的保証。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須根据农民的生活經驗，很具体地很細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簡單的方法。它是要結合着經濟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这种工作，在全国範圍內，我們已經有了相当丰富的經驗。本書所載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表現了这一个特点。

毛泽东：““严重的教訓”一文接語”（196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124頁。

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業，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靜的情况下出現的，它要求我們共产党人向着背上揹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們理解的宣傳教育工作。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做这种工作，出現了很多善于做宣傳的农村工作同志。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賬”，就是向农民說明两种制度誰好誰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毛泽东：“‘一个整社的好經驗’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6頁。

有些同志認為合作化很困难，一定要出很多毛病，因此畏縮不前，不敢推广合作化，只是因为他們脫离了浙江邓家乡的这样一种領導路綫。而浙江邓家乡的路綫(深入一点，取得經驗，推动全般)，同河北遵化县第十区、安徽凤阳县城西乡的路綫一样，不是別的，就是我党在全国一切群众工作中早已行之有效的一条著名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

毛泽东：“‘合作化模范邓家乡’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8頁。

要有全面的规划，还要加强領導。

要有全国的、全省的、全專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全乡的关于合作化分期实行的规划。并且要根据实际工作的发展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规划。省、專、县、区、乡各級的党和青年团的組織，都要严重地注意农村問題，切实地改善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領導。各級地方党委和团委的主要負責同志都要抓紧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变成內行。总而言之，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領導，不要放棄領導。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21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4頁。

很高兴地看完了这一篇好文章。有了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整个华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上流失問題的地方，都可以照样去解决自己

的問題了。并且不要很多的时间，三年，五年，七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問題是要全面规划，要加强领导。我們要求每个县委书记都学阳高县委书记那样，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經驗，加以总结，使之推广。

毛泽东：“‘看，大泉山变了样子！’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7頁。

作者以很大的热情研究了这个问题，所述农民的意见也确是农民自己的语言，似乎作者是到了这个乡同群众一道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我們希望全国二百几十个地委的書記，每人都下乡去研究一个至几个合作社，每人写出一兩篇文章来。

毛泽东：“‘襄阳县伙牌乡襄鄆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41頁。

重要的是做出榜样給农民看。当着农民看见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比办小型社和低級社更为有利的时候，他們就会要求并社和升級了。

毛泽东：“‘瓊山县第一区紅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6頁。

这个合作社看来是一个很大的社，可是“县区党委放松领导，支部也沒有加以过問”，致使不純分子混入社內，貧农和中农的关系也不正常。只是在县区党委注意了领导，并且依靠支部去发动群众，才把問題解决了。

毛泽东：“‘民和县第五区官亭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解决組織不純的問題的’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74頁。

这是一个十三年的長远計劃，可以作为各地的参考。这种計劃的用处，是有一个長远的目标，使人們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这种計劃只是一个大的方向，还要用每一个五年計劃和每一年的年度計劃去加以具体化。

毛泽东：“‘貴安地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远景规划’一文接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1頁。

我国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积累和消費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对的統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說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統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統一成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頁。

張国藩校長彙报說：現在同學們搞技術革命的勁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节献礼，晝夜突击，說服他們也說服不了。主席很关切地說：連夜搞是否搞瘦了呢？还是注意有节奏的生产，有节奏的休息和劳动。

“毛主席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頁。

有无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別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們曾經說过，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滿了灰尘；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應該打扫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对于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无則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們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見、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嗎？难道我們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

物来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7--1098頁。

附 錄

大家知道，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前夕，當着全國興修水利的高潮正在展開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根據當時形勢，及時地提出了“苦戰三年”、“三年看頭年，頭年看前冬”的有名的口號，作為促進大躍進的領導方法。

“學會兩手抓”（1960年3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